

文件由 心無極 免费分享! 版权归属原作者!
切勿用于商业用途! 不得倒卖文件!

特异功能与战争

〔美〕 罗纳德姆·麦克罗尹 著

刘子文 董成玺 译

刘益悟 校



文件由 心無極 免费分享! 版权归属原作者!
切勿用于商业用途! 不得倒卖文件!

特异功能与战争

——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

059460



女子学院 0018537

文件由 心無極 免费分享! 版权归属原作者!
切勿用于商业用途! 不得倒卖文件!

**Mind Wars; The true Story of
government reseach into the mili-
tary Potential of psychic weapons**

Ronald M Mcrae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4

特异功能与战争

——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

〔美〕罗纳德姆·麦克罗尹著

刘子文 董成望 译

刘益悟 校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16000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8911—24,000 册

ISBN 7-5008-0038-X/I·11 定价: 2.20 元

文件由 心無極 免费分享! 版权归属原作者!
切勿用于商业用途! 不得倒卖文件!



责任编辑 王一泉
封面设计 郑绍敏

工人出版社

文件由 心無極 免费分享! 版权归属原作者!
切勿用于商业用途! 不得倒卖文件!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介绍美国政府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应用于战争的研究进展情况的纪实文学作品。美国军方是怎样运用此功能对付苏联的核武器、导弹、潜艇、刺探苏方情报的? 美国警方是如何运用此功能侦破各种案件的? 遥视实验计划——斯卡奈特计划是怎么一回事? 未来的陆军雏形——特殊综合地面大队是什么样的武装? 两个超级大国又是如何争先恐后地力图掌握诸如超感觉力、精神感应、遥视能力和精神发生学的? 这将对未来的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以严肃的态度、确凿的材料、形象而生动的文笔，一一作了描述。

ISBN 7 - 5008 - 0038 - X / I · 11

定价：2.20 元



目 录

1	前言 (玛塞罗·特鲁兹)
13	序言 (杰克·安德森)
20	美国军方和警方对特异功能的兴趣
50	特异功能军事应用古今谈
91	是特异功能军备竞赛吗?
126	魔术师与科学家
158	遥视试验计划——斯卡奈特计划
196	未来陆军的雏形——特殊综合地面大队
225	狂言不可信, 研究仍要搞
237	作者的话
251	译者的话

前 言

罗·麦克罗尹所著《特异功能与战争》一书中揭示出的许多东西，对有些读者来说，可能认为是荒诞可笑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认为是不可信的，但却是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人都是正确的。我们中有些人面对着那些真情报和假情报就象拜占庭的迷宫一样，他们总是要想弄清楚政府对心灵学的兴趣以及参与此项研究的情况，而有些机构却故意提供一些假情报来迷惑人们，进而掩盖事实的真

相。仅有几件事看来是确凿无疑的。据我们所知，美国和苏联（最近还有中国政府）已经对心灵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正象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本书所提到的大多数内容，有些国家一直在秘密进行研究，并且与军事和情报机构有关。我们确信，美国政府的一些最高层官员，包括以前的总统，也一直在关注着本书所讲的内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猜测、传闻和混乱。大多数科学家，包括心灵学家，对此也知之甚少。作为一名调查记者，罗·麦克罗尹，发现了这些事情的某些细节情况，并已搜寻到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其中有许多东西甚至使得那些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也感到意外和震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政府曾雇佣了一些间谍，他们熟知那段秘密活动的历史，并以他们的惊人而又娴熟的间谍手段名扬天下。他们当中某些人曾潜心于这些“秘术”（occult）。例如，英国曾利用一位占星学家来预计德国占星学家会给希特勒提出什么样的忠告，据说，里根总统偶而对占星术亦极感兴趣（白宫否认这一说法），看来苏联人似乎也在尽量搜集那些被雇佣

的本国占星学家们提出的忠告。政府插手这类神秘的事情，可能纯属一种实用主义的象征，恐怕不会有什么更深的含义。曾经有一些人讥讽地说，美国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参与“普西”（ ψ ）^①的研究工作。显而易见，这是造谣，目的在于使宣传机构误入歧途，以便共产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的计划上浪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的观点，他们宣称，苏联在“精神空间”

（inner space）方面的竞赛中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并且这种努力会构成一种明显危及美国的生死攸关的防务和军事能力。很大程度上，真相可能就隐藏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

在我们查阅那些对我们有用的文献，特别是那些通过新闻自由法对我们有用的大量已审查过的文件，以及那些插在报纸最后版面上偶尔出现的新闻特写时，假如我们拿对付才子佳人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常常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例如，罗·麦克罗尹泄露的一项计划提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携带新型特异功能电子（psycho-tronic）装置的核导弹，这种装置可以把这类威

① 普西（Psi）——希腊文的第23个字母 ψ ，读音“普西”。在心理学中系指超心理现象或特异功能现象。——译注。

胁人类的武器投掷到未来一百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时间里，当我们的技术发展到可以对这类威胁武器解除武装的水平时，我们就能以适当的办法对付它，否则就在我们能够解除它的武装以前，随着时间的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向前推移。象这样类似科学神话的计划究竟是属于才气横溢还是属于荒诞无稽？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这种特异功能电子装置是否存在以及是否真正具备这样的能力之前，我们又怎能给这个疯狂的想法作出定论呢？

对于大多数怀疑论者来说，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无异于狂吠，随即就得出伪科学或巴克·罗杰斯神话的结论。然而，最近的调查表明，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而是极为复杂的。在正常情况下，科学家们认为需要避免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误差。第一种被统计学家称为“第一类误差”，这种误差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即当你误以为有什么特殊的事件要发生时，然而，事实上这时除了正常的事情在进行以外，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件。例如，如果你想一种治疗某种疾病的新药，但实际上这种药物并没有产生你需要的特定效果，相反，是靠你自身的机能使病症消失

了，这时你就是犯了“第一类误差”的错误。第二种错误被称为“第二类误差”，这种错误通常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即当你误以为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要发生时，然而，事实上则恰恰有某一特殊事件正在发生。这就好象是，如果你断定这种药丸对治疗没有什么作用，但事实上却正是它很有疗效。这时，“第二类误差”的错误就发生了。

在典型情况下，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在有一张附有这种药品作用的说明书时，不致于产生“第二类误差”。

大多数科学家（也包括心灵学家）都承认，关于“超心理现象”（普西）的证据在科学上还未达到令人心悦诚服的地步，而且确实存在的真正的非视觉透视与遥视^①、预知^②和意念致动^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然而，假设将来有一天这

059460

-
- ① 非视觉透视与遥视 (clairvoyance) —— 人体特异功能的一种。指无需通过正常的感知或推理渠道，便能获得常人得不到的信息的能力。有人称“超凡视力”“神通眼”或“千里眼”等。——译注。
- ② 预知 (precognition) —— 人体特异功能的一种。指超过常人能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有人称“早知”。——译注。
- ③ 意念致动 (psychokinesis 缩写为 PK) —— 人体特异功能的一种。指通过直接意志活动或心灵努力使自然物体移动或改变状态的能力。——译注。

些东西变成了现实，那么它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态势肯定会产生极端重要的影响。在纯科学领域里，在心灵学尚没有在其科学家中间（包括怀疑论者在内）得到更大的信赖之前，我们可能会对心灵学视如敝屣，甚至对其主张怀有敌意。然而，现在我们并不探讨纯科学领域的问题。我们的政府有责任要保卫国家安全和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否则我们潜在的敌人就会取得优势。这样，即使关于超心理现象研究所产生的实际成果的概率很小，我们政府中的管理者们也不应忽视这些事情，特别是当别人正在这条路上奋力追赶的时候。远程射击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原子弹过去也曾被认为是一种“疯狂的理想”。可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先获得成功，那么我们还会说什么？

我们撇开这一切不谈，难道政府在常规武器上可以不惜耗费天文数字的美元，那么在这类远程炮弹上花一个零头的数目就不值得吗？有朝一日，某种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大概会简单地规避它在这件事上下的赌注。然而，罗·麦克罗尹似乎还没有发现，在军方也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并在积极促进对超

心理现象的研究。这些支持者们看来希望心灵感应和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技术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我们军事技术的一部分。这类鼓吹者们所谈论的无非是诸如“特异功能暗杀”(psychic assassins)以及用于遥视侦察的奇特新技术之类的玩意儿。难道就是这些“新时代”的白痴掌管着美国政府吗?他们知道关于这方面的神秘的突破吗?我们中有些人尚昏昏然地蒙在鼓里吗?对于那些处于安全防护系统之外的人来说,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简直是不可能的。关于“普西”研究的流传已经很广了。一些人提出了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密谋性的推论,把什么苏联克格勃和我们自己的中央情报局都与新宗教运动联系起来,甚至与不明飞行物(或叫“飞碟”UFO)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则抱怨说,他们认为一个严肃的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对心灵学感兴趣。一些人发牢骚说,政府在伪科学上浪费钱财。还有人则埋怨,我们大概已经被苏联在这方面的突破所超过了。本书对上述种种指责一概未予答复,然而,麦克罗尹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给这个到目前仍一直处于迷雾中的学科带来了光明。对这个难题他为我们展示了足够清晰的描述,以致于现

在我们至少能看到在这个领域的某些方面足以做出初步评价；并且认识到，政府在“普西”研究上的努力是公众远远估计不到的。

心灵学家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促使人们接受超心理现象。第一是通过实验，根据需要，实验能够产生超心理现象，特别是在怀疑论者的监督下进行的实验。尽管这样的实验目前还不存在，然而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今天的心灵学家们对某些技术已能给出50%以上的肯定的重复率，其中有些技术已经应用于远距离观察（遥视）和甘茨费尔德实验^①。第二条途径主要在于使超心理现象在科学上被承认，即要形成一种被人们接受的适用于“普西”现象的理论。由于在最新的量子物理学中若干观点可以解释某些现象（如时间反向——backward in time），而以前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又一次表明，事情有了进展。使人们接受超心理现象的第三条途径是，可以找一些实际运用的材料，无论这些“运用”是否完全为

① 甘茨费尔德（Ganzfeld）研究是指这样一些实验，即在该实验中，物体被屏蔽起来不受感觉器官的作用，有时甚至放置于完全遮蔽的隔音室内。——原注。

人们所相信，亦或是否充分为人们所理解。很显然，这种途径主要要依靠政府里对超心理现象研究的支持者。这些决策人似乎确信，关于超心理现象的研究有可能在某些潜在的实际应用上获得成功。如果你确信有关超心理现象的一些“运用”，但人们未必就能讲清其道理。

从表面上看，这种实用主义的途径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如果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间谍确实搞到了准确的情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具有这种能力的他或她呢？而困难恰恰在于，一旦这类利用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就会陷入保密的罗网中，要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往往就不可能了。那些为这类计划工作的人们，可能有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且这个计划处于秘密状态中还可以避开外界的批评。在正常情况下，当政府的科学研究在秘密状况下进行，则怀疑论者所倡导的、那种正常的自动调节机制、制约与平衡兴许会完全被排除。这就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那些同伙都有了庇护所。这就是为什么象麦克罗尹这样的调查记者可能会提供重要信息的原因所在。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众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对科学研究保持一定的制约力。这个调

查报告里有关下面这个老问题的解答不免有偏袒之处，谁愿意保护我们来防止我们的保卫者。如果我国政府关于超心理现象的研究确实是假科学，（并且也被认为是假情报），那么，纳税者的金钱就白白地浪费了。然而，如果对超心理现象的研究有确凿的理由，那么，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与其用于中止对我们的防备，倒不如把它们作为新式而又可怕的工具用于进行隐蔽的侵略和增强对国内的控制。除了这两个作用以外，它们对我们大家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有权了解比我们做的更多的情况。这里，使我们联想起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和心灵学的评论者所说的，那里在冒烟，但可能没有火，而仅仅是烟。麦克罗尹已经发现了一种极端异常的大量的烟，不管是否有火，看来我们都应该更多地了解它的起源。

玛塞罗·特鲁兹

附：特鲁兹教授现任美国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

(位于密执安州的安阿伯城)主任。这个中心从事着独特的科学研究,承担着根据要求进行验证的使命,并且认识到,为与特殊的要求相适应就需要特殊的验证方法。与这个中心有联系的数以百计的人和科学家以及顾问都坚信:

“我们认识到,科学异常现象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手段和推动力。”特鲁兹说:

“历史清楚地证明,明天的科学看来会包括若干我们想象不到的奇迹,明天的理论可能会解释我们今天看来在激烈争论的某些异常现象。”

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目前正从事着四项计划:

(1) 特异功能侦探计划:调查研究把宣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用于执法机构的情况。

(2) 异常现象计划:探讨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观测飞碟的途径。

(3) 对中国关于心灵学研究的监视计划:促进美国心灵学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僚们之间的交流。

(4) 苏美关于军事超心理现象研究的监视计划: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这个中心乐于为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个人提供

资料，并出版有一个刊物，名为《学者探讨》
(Zetetic Scholar)。

序 言

作 为一名公认的丑闻内幕的揭发者，我生活在没有安全的夹缝中。对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总是要避开我。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他们就要赶紧关上门、锁上文件柜。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的密室里私下接触过一些最敏感的情报。我经常接触那些被列为机密的文件，而这些密级的印记正是他们自己盖上的。

1981年初，我和我的合伙人罗·麦克罗尹泄露了五角大楼的

一项秘密，正是这个秘密曾使得举国上下大吃一惊，对于那些怀疑论者，他们写什么，无关重要。但我们绝没有服用幻觉剂。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的确确参与了这些所谓妖术。

他们确实都在认真地努力发展这种建立在特殊感应机能（ESP）基础上的武器。假如这项研究获得成功，那么下一次战争的胜利者，大概将属于拥有诸如“超空间核榴弹炮”（hyperspatial nuclear howitzer）之类武器的一方。据推测，这种武器能够将内华达沙漠的一次核爆炸以人的思维的速度^①瞬息之间传送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或者使用“光子势垒调制器”，它就象具有心灵感应机能的伏都教的女巫一样，能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致人死命或传播疾病。

按五角大楼的标准，在特异功能战的研究上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绝密的特异功能特种部队的头头们视察了这项研究后认为，在特异功能战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更大的投资。

① 人的思维的速度（speed of thought），指远远大于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达到每秒以光年计的速度。——译注。

国会议员查理·罗斯，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是国会里有名的连任6届的元老，并且是议会特别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十分担心苏联人的研究可能会拉开“特异功能军备差距”。据情报机构估计，苏联在这项研究上每年投资约3千万美元。

罗斯断言：“相比之下，它们可能会使其它武器成为过时的废物。”

国会议员说得非常正确。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下去的话，巴克·罗杰斯的武器肯定将会使那些普通的老式核武器过时。这种武器可以作为一种反导弹系统，它能将时间弯曲（time warp）掷过北极，这样，苏联发射的导弹将飞入这个时间弯曲的空间，从而使导弹推回到过去若干年代的时间内爆炸，这种爆炸就不会带来任何危害；如果这种时间弯曲机能调节到某一真正的高频上，则导弹可能仅会杀伤几只恐龙。

如果将这种设想完全看作是滑稽喜剧的体裁，那将是莫大的错误。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犯过那样的错误，他说：“原子弹是我们至今所做的最蠢的一件事……，作为一名爆破专家，我敢断言，原子弹永远不会

爆炸。”

我不能做一名爆破专家、量子力学专家、控制论专家、或其它什么技术专家来批评心灵学的研究。但其中有些研究可能会有助于重要科学的发展。

然而，我是作为一名专门报道五角大楼里的内幕的行家里手发表看法的。没有一位记者愿意与合法的军事研究发生冲突。在北极上空的反导时间弯曲空间就跟滑稽喜剧书的设想一样，但有些实验室已经发现了有关人类智能的某些秘密。这就象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发现原子裂变那样，这些发现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毁灭人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秘密公诸于世的原因。很明显，记者不是防务专家，公开发表军事秘密经常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名记者按什么标准来评论军事研究是否是在浪费钱财，还是科学上的突破？当然，我没有能力洞察参谋长联席会议内的事情。我无法确切地说，一项军事冒险是否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我个人的学识而言，我不能说特异功能者就不能象装备声纳设备的舰艇和飞机那样标出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活动的

苏联导弹核潜艇的位置。即使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也并不认为试图用信息传感术来摧毁苏联的卫星就肯定是浪费钱财。由于我与一些军事专家以及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出谋划策的科学家有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常常能为人们提供某些事情的官方的观点，提供有关对手的真实材料，以便通过这种方法来判断统治者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观点是否是真理。我可以冒昧地说，我认为我作为那种代言人所做的记述证明是很有必要的。

情报就是实力。华盛顿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都乐于把这种实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事了34年的记者生涯告诉我，我们的领导者无时不在渴望从情报的奴隶变成情报的主人，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情报，不论是关于能源保护计划投资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在特异功能研究上的突破的情报，都会使这些官僚们束手无策，他们并不比对这种秘密情报毫无所知的人强多少。

由于五角大楼象往常那样不肯与我合作，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特异功能特种部队。海军最初否认利用特异功能装置跟踪苏联潜艇一事，并拒绝

对纽约电视屏幕上出现一艘猎潜舰艇追逐偶像一事作出评论。特异功能特种部队的头头、陆军主管情报的付参谋长汤普森少将当初曾答应谈谈此事，随后又借口拒绝了。最后，他通过一名代言人声明说，他与巫术战研究毫无关系。他的同僚们也被要求对此事要保持沉默。

我已经说过，对特异功能研究的投资，按五角大楼的标准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的专栏著作以及本书中揭示的一些新发现，都要求有更大的投资。如果特异功能研究获得成功的话，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物理定律就可能会被推翻，那么谁将掌握这门新的知识呢？有关特异功能的发现的应用问题是交给公众讨论，还是在情报机构的密室里作出决断呢？苏联的特异功能者已经渗透到美国的防务部门了吗？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会进入一个如国会议员罗斯所说的“没有秘密”的时代吗？如果“光子势垒调制器”和“超空间核榴弹炮”真的变成现实，他们将会象疯子那样嚎叫吗？这些规划所指的就是那些接近国防建设上层而又监督这些规划的官员们吗？只要记者们有毅力并且有办法揭开官方秘密的帘幕，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但是，强迫一个调查记者一定要回答这些问题，通常这就违反了获取新闻的正常规律。同按官方旨意行事的记者相比，调查记者应该更加努力工作、更深地挖掘、更仔细地核实事实。有时候，有些资料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有时候，有些支离破碎的情报又不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景象，而那些遗漏的部分却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了。调查记者们是在缺乏权力后盾的情况下工作的，既缺乏财力，又缺乏人力。而政府部门则不然，他们拥有这些东西，并以此来反对调查记者的工作。尽管如此，调查记者只要努力工作，再加上一点运气，他们仍能获得成功。

麦克罗尹对调查记者这一行了如指掌。有好几年，我经常依靠他在政府里搞一些“不公开的文件资料”。1979年，他摆脱了孤立，以一名实习生的名义加入我的工作班子。自那时起，他就成了一名最优秀的、称职的调查记者。

杰克·安德森

美国军方和警方对 特异功能的兴趣

在一幢朴素的沿街店铺门前挂
在 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

“仙师佐迪克夫人，看手相、算命。”佐迪克夫人在首都华盛顿的营业室每天11点开门，她的大部分顾客都是利用午餐休息时间，花上10美元到这里来看手相和算命的。

从1979年到1980年有11个月的时间，佐迪克夫人的营业室在每个月第三周的星期二，很早就开门迎接一名特殊顾客。9点钟刚过，一位海军军官来了，他身

着得体的便服，手里拿着公文包，随即他就被引进了这间私人营业室。夫人为他沏茶，这位军官把算命晶球和占卜卡推在一边，然后把一些像片和海图放在桌子上。

军官摸出一支烟。那年6月，他的吸烟量已经减少到每天只吸半包，但还未戒掉。夫人预言说：“今年年底你准能戒烟。”

预言证明是准确的。这位海军军官现在每天跑6英里，并打算参加下一届海军陆战队的马拉松比赛。但他并没有每月付给佐迪克夫人400美元现钞，以帮助他改掉这个吸食尼古丁的坏习惯。

佐迪克夫人的来访者都是一些官员，钱由海军情报局支付。桌子上的像片和海图是苏联潜艇和估计它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可能航迹。佐迪克夫人的任务是：运用她的特异功能来完成海军舰艇和飞机有时不能做的工作——跟踪苏联潜艇，预计它们的活动。

佐迪克夫人是一个假名字，自从她和海军签订合同以后，此名便写入了一份秘密协议中。海军至少雇佣了34名特异功能者来追踪苏联的舰船和潜艇。其中有一个人同意公布她的名字，她就

是肖恩·罗宾斯，一位职业特异功能者。她曾被《国家探索者》杂志评为“十佳”之一。她曾预言：“在得知苏联计划用特异功能武器对付美国之后，政府将会拿出数百万美元花在特异功能的研究上。”她还预言说，妖魔鬼怪将大闹白宫，到时有的装饰品会被砸碎并产生强烈的噪音。

1973年，罗宾斯是纽约有声望的梅莫尼迪斯医疗中心内特异功能研究计划的受试人员。在一次典型的试验中，一部分受试人员看了带有刺激性的或色情电影，而另外一些受试者则试图用信息传感特异功能得知电影的内容。放过电影后，他们都睡着了。这时，试验人员监测受试者的脑电流活动情况，以便探测他们在梦境中的快速眼动的周期。然后把他们叫醒，问他们做了什么梦。在比较了看过电影者和接收到信息传感的信息者两方面的回答后，我们发现，罗宾斯梦到的电影内容与实际看的电影内容完全一样。研究小组说，这真是非凡的特异功能。

在医院试验结束后不久，一个男人与罗宾斯进行了接触。她以前就认识他，知道他是资助此项研究工作的一个私人基金会的负责人。这次他却自我介绍说，他是海军情报局的军官。他告诉

罗宾斯，海军对她的特异功能很感兴趣，想请她以苏联海军目标为对象进行一些试验。罗宾斯答应了。象佐迪克夫人一样，这位军官给了她一些海图和苏联舰艇的像片，要求她确定这些舰艇的位置并预报其航向。

罗宾斯曾宣扬说：“他说我干得很漂亮，并想让我做更多的试验。”因为罗宾斯在这之前已经和别人约好要去希腊赚大钱，所以，她谢绝了做进一步的试验。

7年以后，这位海军军官再次要求罗宾斯参加佐迪克夫人的计划，并让她再次进行了试验。尽管她的成绩优秀，但由于国会削减了里根的财政预算，使她被排斥在这项计划之外。

在梅莫尼迪斯医疗中心的试验结束之后8年，研究人员斯坦利·克里普诺才得知，资助他工作的“私人”基金会实际上是代表中央情报局的。

五角大楼称佐迪克夫人的计划是“中等技术风险”计划。它绝不是一项保守的计划，只是不如别的计划那样雄心勃勃而已。

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心灵

学的认真研究。当时的很多计划都是关于动物特异功能的，目的在于解决那个时候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小型计划，曾试图训练或用特异功能指挥海鸥来辨别德国潜艇的潜望镜。杜克大学的盖瑟·普拉特博士进行了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研究，希望发现信鸽的超乎寻常的导航机制，以应用到潜艇上而使其无需浮出水面，一直潜航；或者用在轰炸机上使其能够在夜间确定德国的目标，以减少德国战斗机对它们的威胁。直到60年代，海军一直为杜克大学的特异功能研究提供经费。

政府部门的科学家至今仍对动物特异功能感兴趣。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曾雇佣志愿人员观察动物的活动，以获取地震的早期迹象。这项研究计划的科学家们推理分析，认为在地震前几天，岩石在压力作用下会放出正离子，它对人和动物都有激励作用。每当刮圣安娜风中充满正离子时，加利福尼亚州的犯罪率就上升。科学家们希望最终会证明，观察动物会比用仪器监测更可靠。中国一直宣称它是唯一成功地预报了地震的国家，它已对动物观察了好几年，认为这项计划拯救了十万人的生命。

目前，由政府机构资助的最神秘的项目是

“多谱段图像分析仪监测站”。它是海军1977年从弗吉尼亚海滩的特异功能按摩师查尔斯·怀特豪斯那里买来的。怀特豪斯是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USPA——U. S. Psychotronic Association, Inc.）的一名理事。这个组织生产的设备据说可以通过电子装置放大特异功能的能量。怀特豪斯向海军从事摄影研究和发展的单位的头头罗伯特·斯克林上尉（已退休）保证说，只要把苏联潜艇的像片放到这台机器里面，就能很容易地确定出潜艇的位置。

斯克林坚持说：“用这种方法是有可能发现潜艇的。”怀特豪斯曾为斯克林的单位和中央情报局训练了几名人员来操作这部机器。海军花了5111美元买到这个小小的黑盒子。斯克林说：

“怀特豪斯所做的工作是可信的，他确实找到了潜艇活动的区域，我们回来后就这部不可思议的小机器买下了。他为我们训练的几个人以前都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怀特豪斯仍然非常自豪地向别人展示他为“多谱段图像分析仪监测站”开的收据存根。他还在他的按摩诊所用这部机器为癌症患者治病，

即通过在病人身上照射各种有色光合成的光线，以矫正患者辉光（不可见的心灵光环）中的“空洞”和“不平衡”，达到治疗目的。怀特豪斯说，适当地合成各种光线可治疗任何疾病；并且在分析人员的技术手册里甚至有用此治疗“原子弹、氢弹”的辐射病的内容。但这种机器应该用支座垫高，至少要离开地面3英尺，“以避免宇宙射线的极化影响”，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就不行。

民防部门和空军对所谓治疗原子弹辐射病的机器不感兴趣。弗吉尼亚医疗伦理委员会也是这样。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谴责医生用这种机器来欺骗患者。怀特豪斯现已移居泰国，他希望在那里“生活得更轻松一些”，并且也可避免被起诉。

看来，购买多谱段图像分析仪为所有特异功能的研究投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反潜作战确实是用常规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而非常规的方法则收效要大得多。当然，反潜作战的新方法并不全是指特异功能的方法。海军就正在试验软式飞艇。一些工程师认为，由于软式飞艇速度小、噪音低、续航力长，很适合投放声纳长时间地监听

潜艇活动。软式飞艇使航空母舰的司令们很吃惊，但由于它很便宜，尽管有人反对，研究工作仍在进行。

关于反潜的特殊感应机能（ESP）也有它的热情倡导者。华盛顿的海军电子系统司令部前负责人乔尔·劳森博士承认，20年来他一直认为“特殊感应机能是对付潜艇的一种办法。”特异功能的研究费用甚至比软式飞艇还要少，而且看来也经得起批评。

由于反对意见的影响，五角大楼改变了它正在从事的特异功能研究计划的名称，以便掩饰这些研究可能出现的失误。1978年中央情报局花了10万美元对苏联特殊感应机能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但从未提到特异功能一词，而是使用了假的技术术语，称之为“新颖的生物信息传输系统”，避免提及特殊感应机能。海军公共事务局断然否认它曾经“让特异功能者跟踪潜艇”，但却批准了技术风险非常小的特异功能反潜研究计划，如海军电子系统司令部与著名的斯坦福研究所于1976年签订的一项8万7千美元的合同，关于1978年完成。该合同是“研究一些人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接收远方微弱电磁激励的能力。”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一些人”可以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接收“远方微弱的电磁激励”,即指从试验房间或水下潜艇发动机发出来的闪光,这实际上就是研究特异功能现象。但在该计划冗长的报告中,从未提及“特异功能”的字眼,尽管该计划的研究人员普瑟大和塔格在特异功能研究方面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物理学家,而上面所说的“某些人”就是指职业的特异功能者。

这些是真的吗?五角大楼真的相信看手相的人能跟踪潜艇吗?特异功能者能使美国的将军们着迷吗?一些人持有不同意见。亚历山大中校说,有人认为他在《军事评论》上发表的关于特异功能战场的报道是荒诞无稽的,“因为它不符合人们对现实的看法,所以有的人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无此怪事。”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比起把苏联导弹抛回到恐龙时代的反导弹时间弯曲武器来说,用特异功能跟踪潜艇的办法实在是太保守了。

一些身居高位的国防部官员确实是非常严肃地看待特异功能战的。如劳森博士,他一直就认为有必要对特异功能进行研究,尽管他并未大肆声张,并且直到现在仍受到非官方的指责。到目前为止,这些积极的倡导者还未能说服五角大楼

拿出较多的钱来研究特异功能。

目前，特异功能研究费用每年大约有 6 百万美元，或许还要少一些，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这类研究费用隐藏在秘密情报预算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不保密的计划，也用诸如“新颖的生物信息传输”之类的题目而掩盖起来了。然而，对特异功能研究的预算可能并不反应它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很象对激光即“死光”武器的研究。一些人认为，把激光武器部署在地球轨道上，能在洲际导弹重返大气层之前把它们击毁。1982年，激光武器的研究预算不到 5 千万美元，对五角大楼来说这只是个零头。买一架现代化的飞机要 2 亿 5 千万美元，一艘现代化的军舰则需 15 亿美元，象 MX 导弹这样重要的武器计划要花 660 亿美元。

毫无疑问，在激光武器或在特异功能战方面的技术突破，都会使冷战失去平衡。尽管前空军情报局长乔治·基根将军对这种状态不无怨言，他也象特异功能战的倡导者那样，认为苏联在激光武器的研究方面已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但很多工程师却不这么看，和特异功能武器一样，认为激光武器在技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远比一

些外行人看了“星际旅行”电视连续剧后就认为真有此事要不知大多少倍。

迄今为止，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激光的研究者们至少还知道他们应当干什么。把铅笔粗细的激光束对准几千英里以外的超音速飞行的导弹，在工程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原理在高中物理课本里就有了。特异功能的研究者不仅没有教科书，甚至连证明特异功能现象的存在都不能令人满意。

批评者们一直对那些试图用心灵学来解决诸如跟踪潜艇等实际问题的计划加以攻击。他们认为，一门科学在其理论基础没有奠定之前，是谈不上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除非特异功能确实存在，否则你就不能使用心灵学。应用假科学比单纯的假科学还要坏，因为这犹如卖狗皮膏药，纯属骗人。然而，特异功能倡导者的说法，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佐迪克夫人真的发现了苏联潜艇，那又做何解释呢？

社会学家玛赛罗·特鲁兹建议，象区别实验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那样，把“实验心灵学”和“临床心灵学”加以区别。评价临床效果的标准要比通过实验方法所确定的纯科学的标准粗略得

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好的临床方法，理论正确与否那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在于病人是否好转或者潜艇是不是能被发现。

特鲁兹警告说：“如果敌人能够用特异功能来突破我国的安全防御，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即使这种功能确实存在的机率很小，“它也是十分重要的，绝不容忽视”。

很多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结果证明都是假的，再加上情报机关研究的秘密性以及官方不愿承认涉足此种妖术，这就使得证实佐迪克夫人的说法和其他已披露的军事计划变得十分困难。然而，我们还是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公开记录，这可能为证实特异功能者的说法增加了一线希望。这个记录来自公共警察部门。

特鲁兹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雇佣特异功能者进行犯罪侦查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个计划分几个阶段，我们现在还处在第一阶段。”他说，“但是，我们已经发现，使用特异功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对它的了解。”

警察部门使用特异功能进行犯罪侦查和在军事上的使用非常相似。警察需要寻找失踪的人和

证据，而情报机关则是要寻找隐藏的特务及其活动地点。中央情报局和洛杉矶警察局都希望能了解提供消息者和嫌疑犯的心理。如果警察局发现特异功能有用，那么，对五角大楼来说也可能是有用的。在这里，是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在结果后面还有什么理论的。

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乡警察局长知道特异功能是怎么回事。迪克斯·费策尔局长说：“坦率地说，我过去曾认为他们都是骗人的。”费策尔是一个见了工作就拼命的人，他对布里奇沃特乡历史上大多数凶杀案的侦破都结了案，而在这项工作中，彼得·赫库斯对他提供了帮助。赫库斯是具有“雷达般头脑的荷兰谋士”，传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用他的特异功能帮助清除了地下纳粹分子。

现在，费策尔的看法和过去不同了。他说：“赫库斯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线索，这是用常规侦查技术所无法获得的。”赫库斯曾预言，凶手所用的枪可能藏在谋杀现场附近的一堵墙里。警察把墙拆了，没有发现这件武器。但一年以后，枪在另一座建筑物的墙里找到了。费策尔局长

说，赫库斯干得甚至比这还要漂亮，“运用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功能，使我们能根据名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来甄别罪犯。”两年后，一名同案犯坦白了，赫库斯所怀疑的人被押上了法庭。

“我将毫无保留地推荐赫库斯。”费策尔局长说。

尽管有这样强烈的赞同声，但埃利奥特·内斯仍继续供职，而佐迪克夫人却被排斥在外。警官们对特异功能侦探缺乏热情，甚至在布里奇沃特也只是费策尔局长谈及了上述记录。负责侦破谋杀黑人儿童凶手的亚特兰大特别行动小组收到了想要成为特异功能侦探的1300多封信件。对此，他们感到恼火。但是，处于危急情况下的人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亚特兰大特别行动小组终于也向特异功能者多罗西·阿里森请教了。阿里森后来坚持认为，她的特异功能感觉是准确的；但亚特兰大的警官们却认为她提供的线索“太模糊”，“与事无补”。然而，其它警察局对阿里森的印象十分良好。

在侦查案件中，使用特异功能目前尚不普遍。但是，他们正在改变着联邦、州和地方司法部门对他们的看法。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甚至颁布了

“使用特异功能侦查案件”的标准工作程序。

这个程序说：“看来特异功能者确实对加强法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一个有才干的特异功能者可以帮助侦察人员：

- 确定失踪人员的地理位置，
- 缩小线索，使之越来越集中，
- 提醒注意那些被忽略的重要信息，或者
- 向侦查人员提供那些以前鲜为人知的情报。”

加利福尼亚的程序提醒说：“即使是有才干的特异功能者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特异功能代替不了警察的有效工作，但他们可以起到“侦破工具的作用。”

其它一些研究成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发表在《警察局长》杂志（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机关刊物）上一篇题为《犯罪侦查中的特异功能管理》的文章说：“真正有特异功能的人能提供独一无二的、非常有价值的侦破技能。”1982年，斯坦福研究所发表了第一份科学的、非常有益的关于特异功能侦探的研究报告。另外，两名有经验的犯

罪学家惠特尼·S·休伯德和雷蒙德·W·沃林，也发表了值得称赞的研究著作：《特异功能犯罪学：犯罪侦查中使用特异功能的工作手册》。

尽管许多警官不愿意谈论特异功能侦探的事情，但特异功能者不仅时时被请教，有时甚至成了一些警察机构的职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克拉里萨·伯恩哈特就是圣何塞搜索救援小组的一名官员。她是一名特异功能者，由于她预报了地震，人们称她为“地震女士”。该小组负责人乔治·安德鲁斯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们有了她，感到非常高兴。她的特异功能至少为我们解决了两个案子。”她或许还能解决第三个问题，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拒绝派潜水员去搜寻一架失踪的飞机，而伯恩哈特感觉到这架飞机是坠毁在一个湖里。这架飞机至今仍未找到。

应官方邀请，伯恩哈特已经开始教授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搜索救援小组如何使用“预感因素”（hunch factor）去确定失踪人员的位置。她说：“我的兴趣在于使心灵学在这个领域更受到重视，但人们常常愿意使用别的方法。”

特异功能侦查人员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宇

航天员埃德加·米切尔成立了一个“特异功能民团”，试图寻找被所谓“共生解放军”绑架的女继承人帕特里夏·赫斯特。在圣路易斯，警方去年曾要求美国特异功能侦缉队（它完全是一个私人组织，与联邦政府没有联系。）帮助寻找一位有7个孩子的父亲，他是在参加国际象棋锦标赛期间失踪的。警方只找到了他的车子和眼镜。

特异功能侦缉队经常在他们的领导人贝弗利·耶格斯家里开会。她是郊区的一名家庭妇女，有6个孩子。该侦缉队有一名律师、几名警察、一名退休的不动产经纪人和几名飞行员，共20人。耶格斯说，飞行员是最好的男性特异功能者，因为“无论他拥有多少仪器，但他们总是靠感官判断来驾驶飞机。”大多数特异功能侦探都是女性。

有两名圣路易斯的侦探对特异功能侦缉队的会议情况进行了录音，根据失踪者的一张像片，侦缉队员们报告了他们的印象，即：车的右轮毂和一个前灯丢失，一座荒凉的院落，附近公用电话亭里的电话已经坏了，还有一条带纽扣的大腰带。警方确认了这些细节。汽车是丢了一个右轮毂和一个前灯，失踪的人扎了一条带纽扣的大腰

带，一个荒凉的院落，汽车附近有一个电话亭。一名侦探把失踪的人和他妻子的一张合影像片撕成两半，然后脸朝下放在贝弗利·耶格斯的手里，失踪的人的那半张像片摸起来很凉。

美国特异功能侦辑队未能确定出尸体的确切位置，所以，此人仍列在失踪者的名单中。但是，圣路易斯警方称赞他们在别的案件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还有一个组织叫“特异功能侦查协会”，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为“全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法机构”服务。定期会刊向会员提供像片、事实和案件调查表。他们的回答被存入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也向特异功能者报告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

除了必要的开支外，这两个组织都没有由于他们提供了服务而收取报酬。加利福尼亚的标准工作程序警告说，有些特异功能者“对名誉和金钱更感兴趣，而对破案则兴趣不大。但大多数特异功能者主要是想利用他们的这种能力帮助别人，并不希望留名。”

有的私人特异功能组织对军事上使用心灵学要比对警方使用更为关心。一个总部设在费城的

叫“救世生存中心”的组织，已在全国各地组成了一个信息传感通信网来代替常规远程通信系统。在一场核战争中，常规通信系统很可能要遭到破坏。美苏两国政府都对用特异功能代替通信进行了正式研究。国防情报局说：“据报道，苏联正在训练宇航员使用信息传感术，以便在外层空间用此来代替他们的电子设备。人们已经知道，其中一项替代计划就是密码信息传感通信”，这可防止被美国情报机构截获。在阿波罗-14号登月飞行中，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曾试图给在达拉斯的信息传感接收者发送信息，未获成功。尽管米切尔失败了，但1976年，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灵学家查尔斯·塔特那里买了一台“特殊感应机能教学机”。塔特是著名的意识变态研究者。这一装置在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进行过试验。后来，根据海军的一项合同在斯坦福研究所又进行了试验，但未有结论性的结果。

法庭当然不会承认特异功能者的证词，警方必须用标准的侦查程序来证实他们的案件。很多警察仍对特异功能持怀疑态度。

洛杉矶警察局的行为科学处曾进行过两项研

究工作，它们都未能取得由特异功能侦探在其它研究中所获得的积极结果。在一次试验中，曾要求特异功能者通过死者的一绺头发或其它关键环节，确定一个案件的21个重要方面，诸如死者的姓名、年龄等。没有一个特异功能者能说对6项以上，有的只说对两、三项。

和军方的研究一样，警方对特异功能的兴趣也很广泛，可以说从一般事情到稀奇古怪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拿催眠术来说，它被广泛用于启发证人对往事的回忆。这是很普通的事，以致人们并不认为它是“特异功能”现象。但是，事实上，科学家们并不知道催眠术是怎么回事。对催眠术的初期研究大多是由心灵学研究者和唯灵论者进行的，他们认为精神恍惚的人特异功能会加强。由于它带有唯灵论的色彩，所以，一般的心理学家对催眠术的概念仍感到很不适应，因此不愿意研究它。但警方对此极感兴趣，尽管这样做可能是危险的。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家马丁·T·奥尔最近的研究表明，进入催眠状态的人，关键的判断能力可能会降低；并且，对催眠者所提供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暗示，他也会十分敏感。

奥内说：“如果催眠者认为证人或受害人看到过什么，或者罪犯可能是谁，那么，他会很容易把这些信念传送入敏感的、已进入催眠状态的受试者的记忆中。”同样，受试者自己关于犯罪情况的信念也可能变成“假记忆”。这样，证人会相信这些假记忆，并发誓说，这是真的。因此，法庭虽然允许警方讯问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但对这种做法实行了某些限制。

按着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说法，苏联人甚至更倾向于接受催眠术。“在苏联，催眠术就象X光透视那样是一种普通的工具，用于治疗疾病、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警方的侦查工作。“在美国，用信息传感方法给某人催眠可能会被看作是可怕、神秘甚至是邪恶的勾当，在苏联则不是这样。”

此外，远比军方和警方机构所进行的研究更为稀奇古怪的研究是“伯克斯特效应”——植物识别人的心理。克利夫·伯克斯特是一名测谎器操作员，他说他曾发现：把一颗植物放到测谎器上，如果有人有摘掉它一片叶子的意念，那这棵植物将“变蔫”；如果蔬菜不喜欢种菜人，它们将雕萎。很多业余园艺家一向怀疑此事，但伯克

斯特确实想通过“讯问”来证实这个问题。在纽约市警察局的合作下，曾把一株植物放在了谋杀现场，警察同意让20名嫌疑犯依次走过，但这个叶子证人未能指出哪个是犯罪分子。后来，中央情报局和海军对伯克斯特效应进行了研究，你可能会看到这一试验所具有的惊人效果：把一株有特异功能的喜林芋属植物（生于热带美洲的一种植物）偷偷放到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里，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核心机密。

特鲁兹把特异功能的常规利用和精神病医生的警方使用进行了比较，他说：“两者都是用来描绘嫌疑犯的形象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靠感觉行事的。”

但是，人们并不指望特异功能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很快证实罪犯交待的是否属实，或与精神病证人一起作证。无疑，特异功能者确实有“难以置信的能力”，用幸运的猜测或者可能仅仅是一般的常识向警方提供帮助。然而，即使是在布里奇沃特，人们对他们的作用也是有争议的。在那里，彼得·赫库斯根据姓名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确定的嫌疑犯曾被押上了法庭。也有由费策尔局长起诉的嫌疑犯，却被赫库斯确定而无罪释

放。费策尔局长曾指责说，这是“随心所欲的判决。”国防部门也认为证据太偶然，没有说服力。关于传说赫库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特异功能清除地下德国人的冒险行动，到头来仅仅是传说而已。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赫库斯，现在，全国的警察当局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都向特异功能者请教，这却是个事实。明天，有的人可能得到生存，有的人却可能死去，因为克拉里萨·伯恩哈特按照她的推测把圣何塞的搜索救援小组派到了北边，而不是东边。如果因此救了某人的性命，这对特异功能侦探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价值远远超过一个警察局为支持他们而提供的几千美元。对“临床心灵学”的开业者来说，却有很多推测需要证实，不能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否定一个推测而同意另一个推测。

有的警察局，尽管对特异功能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却公开宣传它。特鲁兹在调查中曾发现这样的例子，大肆宣扬特异功能侦探的到来，会使犯罪分子十分惊慌，有的甚至使相信特异功能的嫌疑犯自首。

同样,五角大楼也曾利用过敌人的迷信观念。50年代初,在共产党鼓动的菲律宾反政府武装叛乱中,中央情报局的一队特工人员散布了一个谣言,说有一个可怕的吸血鬼在共产党地区游荡。为了使谣言耸人听闻,他们伏击了叛乱分子的一支巡逻队,抓住了该队中的最后一个人,在他的颈静脉上扎了两个很象吸血鬼吸食血液的窟窿,然后把他倒挂起来,使血液流干,最后再把尸体放在一条小路上。因为这些共产党分子与大多数菲律宾人一样迷信,当他们发现尸体后便有数百人逃跑了。前不久,中央情报局曾考虑用特殊的烟火使古巴人相信,天宫大门已开,救世主正在驱赶不信神的共产党分子。

但是,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超过了想利用迷信的愿望了吗?五角大楼对特异功能是否也象圣何塞搜索救援小组或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那样认真看待呢?官方一再声明,佐迪克夫人、多谱段图像分析仪以及在诸如著名的斯坦福研究所做的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探测微弱电磁刺激的试验等,全都是一堆不可知的异常现象。我们能相信这些说法吗?

完全有理由相信,特异功能战的倡导者们对

五角大楼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除了中央情报局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有30年的历史外，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国家航空与宇航局、国防情报局、全国卫生研究院等，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实际上都曾研究过特异功能；更确信无疑的是，五角大楼在搜索救援队面临生死攸关的复杂情况时，肯定向特异功能请教过。

在越南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在顺化附近部署了一个排的“魔杖探测队”，这里是最危险的战斗地区。这个排曾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匡蒂科海军陆战队训练与发展司令部接受过训练，企图用Y型的金属探矿“魔杖”去探测隐蔽的坑道和武器贮藏地。5个月以后，这个排被撤回来了。据训练与发展司令部的司令的信件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实战中未获成功，而是因为成功地使用“魔杖”需要“特殊的技能，而普通海军陆战队员是不能学会的。”

最近，对心灵学又进行了一次实际试验，有好多情况同警方雇佣特异功能者是一样的，尽管警方一直用“魔杖”寻找证据，如在垃圾堆里去发现凶手的武器。国防部试图利用特异功能来寻找1982年1月被意大利红色旅绑架的多齐尔将

军。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曾五次把来自五角大楼的特异功能者的提示转达给意大利的反恐怖警察部队。一名巫师曾想象，在维罗纳附近有一座恬静的农舍，一条小河从旁边流过，并且甚至说出在哪间屋子里关押着多齐尔。意大利警察根据特异功能者的描述，袭击了那里的许多农舍，但只在一幢房子里碰到了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商人，他想与他的漂亮女友在这里过一个安静的周末。按照特异功能者的暗示所做的其它袭击同样没有成功。

多齐尔在他被处死前几小时，终于得救了。这应该归功于大量的侦查活动以及逮捕了几百名红色旅的同情者。是毒品贩子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他们想以提供红色旅顾客的情报来换取免于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对五角大楼来说，用意大利反恐怖侦辑队非常有限的情报来检查特异功能者的提示，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尽管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既不果断地肯定、也不否定特异功能战计划的存在，但那些倡导者们感到，自里根上台以来，谈论此事要比以前自由一些了。

据巴巴拉·霍尼格说，在里根政府的“科技

政策办公室、政策发展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级官员中”，都知道心灵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霍尼格和前任总统国内问题首席顾问马丁·安德森一起进入白宫，并在政策发展办公室工作了3年。

霍尼格在几家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她自己知道的关于心灵学的研究成果。她说，心灵学在政府的一项最有争议的防务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决定就是放弃卡特政府关于MX导弹的“迷惑式”部署方案。卡特建议，每枚MX导弹轮流在20个分散的掩体内存放。卡特希望这样做，会使苏联的计划者无法得知哪个掩体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从而使MX导弹能在苏联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

据霍尼格说：“政府找到了美国最杰出的特异功能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可以增强对机动式MX导弹位置的预测能力。”换句话说，美国的研究表明，苏联的特异功能者能够戳穿美国的迷惑部署，精确确定出MX导弹在那个掩体内。霍尼格甚至说，苏联的特异功能者在导弹移动前就能知道它们要去哪儿，“如果美国对MX导弹系统采用迷惑式部署方案，潜在的侵略

者只需利用预知战略，便可事先准确地确定导弹的未来位置。提前知道的时间正好是导弹离开原来掩体到达另一个新的掩体的时间。”

国会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高级成员查理·罗斯议员对霍尼格的担心有同感。他曾表示，苏联或许正在利用放置在卫星上的“魔杖”来侦测美国导弹的位置。

发表在1982年1月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杂志《信号》上的一篇文章，也注意到了心灵学的战略潜在能力。作者罗格·A·博蒙特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军史学家，他说：“近年来，对特异功能的军事应用潜力的兴趣正在增长。”

博蒙特承认，这种兴趣可能是一种计谋。

“参加裁军谈判的国家可以在严肃合理的建议中设下‘伏笔’或增加‘附文’，从而确信他们的对手不会接受这些建议。这样，在不明文字技巧的公众眼里，反对者便成了和平的敌人。这就是影子计划战略，即把对方的注意力引进死胡同。苏联制造假情报的目的就在于此。”

然而，我们知道，在苏联和美国，至少这方面的有些研究是真的，不是假情报。五角大楼肯定不会只是为了干扰苏联特异功能者提供的假暗

示来危及多齐尔将军。国防部的特异功能侦探至今仍然在寻找越南战争的失踪者，因为五角大楼有人热切地希望能看到他们活着回来。

约瑟夫·L·迪克海军上校领导着国防情报局的一个小组，负责搜集蛛丝马迹的证据，证明有少数几个战争失踪者可能还活着。他说，他们已经把飞机的碎片、衣物或其它东西都交给了特异功能者，以使他通过信息传感功能与战争失踪者建立联系。

迪克上校说：“他们提供的有些线索已经得到证实。他们能够想象出飞机的坠落情景，我们已经在他们指定的地区发现了飞机的碎片。”尽管有几个特异功能者说，他们已经与关在柬埔寨丛林中集中营里的失踪者建立起了心灵感应联系，但证据都没有说服力。

迪克上校还认为，特异功能者使用的意守与放松技术可以训练出优秀的、警觉性更高的士兵。迪克说：“在最高层官员中，很多人对这些放松技术也十分感兴趣。”

如果五角大楼想扩大它的特异功能侦探队伍的话，它会发现这要比招兵容易得多。1981年2月，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周围有好几百人要求自愿跟踪

苏联潜艇。使大使馆官员大为惊奇的是，他们发现一份英文小报转载了最近发表的关于佐迪克夫人的小说，并加了一些他们自己的情节，说什么五角大楼正在“请教英国最有名的特异功能者和唯灵论者，……显然是要敦促他们运用他们的功能去对付克里姆林宫。”

特异功能军事应用古今谈

据传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曾说过：“我宁愿相信先生们扯谎，也不相信石头会从天上掉下来。”就这样，早在美国空军终止蓝皮书计划^①的160多年以前，结束了政府第一次对不明飞行物的调查。

杰斐逊总统派去调查陨石的先生们回到了哈佛，陨石依旧静静地埋藏在弗蒙特的农场里。但是，政府、公众和其他科学家们

^① 蓝皮书计划系美国空军专门收集不明飞行物报道的计划，该计划从1948年开始，于1969年终止——译注

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对旧有意识进行挑战的证据呢？这仍然是个问题。看来，科学家和总统都与调查记者或公众一样，面对未知的事物同样感到困惑不解。

杰斐逊总统绝不是一个理智的保守主义者。他认为，定期改革可使政府保持诚实和公正。他说，如果在政府和报纸之间作一选择，他认为没有政府也可以，并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当事实与他自己固有的概念发生矛盾时，他却忽略了哪些事实是现实的、可能的，哪些不是这样。

杰斐逊总统的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物理学家在他们的正电子实验中，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忽略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原子粒子除了有一个正电荷而不是负电荷以外，酷似电子。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设想，正电荷必须由较重的粒子如质子等携带。同样，化学家们直至1962年才知道，氦、氩等气体也可以化合，尽管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花上3~4个小时便可以证实23年前所报道的实验是正确的。

按照科学史学家T·S·库恩的说法，用10年或23年来证实科学家的预想，时间并不算长。

一些重要的观念，如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疾病是由于空气中的“体液”，而不是由于细菌引起的等等，曾持续了几个世纪。只是在那些最后的顽固支持者们寿终正寝以后才逐渐消失。科学家们象其他人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

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决定了哪些研究是可以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哪些实验室将得到伽利略时代教皇的赞助或当今政府的支持；谁的著作可以发表，谁的不可以发表。心灵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不可以”的范畴。美国第一个心灵学组织——心灵学协会，是在经过一番“接纳”是否意味着“承认”的激烈辩论之后才于1968年被接纳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的。尽管有了这样的进展，心灵学仍然不能算是正规的理论，继续被很多科学机构视为异端。心灵学协会被美国科学促进会接纳为会员，但心灵学并未被普遍地列入大学课程。设在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就没有设心灵学课。该系系主任史蒂夫·格利克曼说：“对未知的事物确实存在有抵制心理。”

意识研究人员查尔斯·塔特说：“简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绝大多数会员对心灵学一无所

知。事实上，这对他们的传统信念体系是一个威胁。”持怀疑态度的会员甚至拒绝承认塔特的头衔。

在重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心灵学论文是微乎其微的。1982年2月份的电气和电子学工程师学会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了罗伯特·扬的一篇文章，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有名望的工程学院院长，他从工程师的角度调查了目前特异功能的研究情况。扬的论文是在该学会1967年会议论文集发表的唯一一篇有关心灵学的论文之后16年才发表的，前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千米之外传输信息的感知途径》。斯坦福研究所的物理学家普瑟夫和塔格在这篇论文中说，经过训练的特异功能者能“遥视”远方的地理区域，甚至能看到水星的表面！

“人们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有些人则怀有敌意，甚至有点感到震惊。”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在介绍扬的论文时警告说：“特异功能可能存在的种种迹象，要求我们在科学的实验性和知识的可靠性上，要象我们关注传统的和已接受的许多科学与技术分支一样，采取同样的客观研究的态度。”

科学杂志几乎都不愿意对心灵学文章采取客

观的研究态度。有影响的英国杂志《自然》1974年曾发表过普瑟夫和塔格关于遥视的研究论文。但在其编后记中却说，它这样做只是想给读者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看看心灵学家所写的科学论文有多么蹩脚！

尽管有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广大的科学界对心灵学的兴趣却在不断增长。普瑟夫说：“首先是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然后是心理学家和杂志编辑，都在改变态度。”而普瑟夫本人就是一个公认的激光物理学权威。这种兴趣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院长罗伯特·扬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

我承认，由于以往的不愉快的经验，我在谈论心灵学研究时真是提心吊胆。以前，我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文，试图让大学里的大多数同事来分享我在心灵学方面的一些体验。但这却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使我手足无措。一方面是不负责任毫无道理的指责；另一方面却简直把我当成救世主而大加赞扬。为了避免不再

招来如此巨大的感情冲击，我一直回避公开发表文章。

医学界对特异功能现象的兴趣也十分浓厚，尽管这种兴趣还没有反映到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去。美国社会精神学学会现任主席斯坦利·R·迪安对此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医生和一般公众对科学禁区的兴趣空前浓厚”，这包括意识变态、沉思、诈尸、巫术、安慰效应，以及“所谓超自然医疗的科学操作法。”迪安把这些称作“精神病玄学”（metapsychiatry），认为这是“精神病和特异功能现象的结合。”

迪安的调查发现，在医务界有58%的人认为，“对今后精神病系毕业生来说，了解特异功能现象是十分重要的。”有22%的人认为这并不重要。有50%以上的人希望这个领域应进行更多的研究。有30%的人认为，特异功能试验是一个有用的医疗手段。只有15%的人否认特异功能现象的存在。有21%的人相信，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特异功能。

在一般美国公众中甚至有更高百分比的人承认特异功能现象确实存在。根据盖洛民意测验最

近的一次调查，有51%的人相信特殊感应机能（ESP）存在，有37%的人相信预知（指具有看到未来的能力），有29%的人相信占星术。在美国，约有2万名职业占星术家，但只有2千名天文学家。

究竟什么是心灵学呢？持怀疑态度的人称之为胡说八道和迷信；但也或许是一种新的科学远景或巫师们的流行技术。

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扬把特异功能的研究领域比作“大雾笼罩下的沼泽地，”他说：

据说那里生活着很多希奇古怪的、有着迷人排列的大量生物，这些都与我们的正常感觉和分类无关。一些学者对这一模糊领域进行了探险，他们回来后断然宣布，所有这些生命只是幻觉——仅仅是水下的树桩以及漩涡在水下的阴影，完全是由于轻信造成的错觉以及提供消息者招致的误传。但是，那些深信不疑的人则详细描述了他们看到的各种各样令人生畏的区域和能力，它们异乎寻常地存在着。

人类的潜意识对奇异事物的专注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最早出现在大约公元前 2 万年的洞穴画中。从一开始，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就想把这种奇异的能力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有时候，结果是很不幸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古希腊时期吕底亚斯国王克罗伊斯，他想得到神谕的启示以决定是否渡过哈里斯河去攻打波斯人。当时有很多人可供他选择，包括各式各样的骗子、疯子以及公认的特异功能者（如德尔斐城的神示所等）。人们就国家大事向德尔斐城的神示所请教，传达神旨的人在吸了一口火山喷出的气之后，就会得到她的灵感，但吸进去的气应该是被赫尔克里士杀死的蛇精腐烂后发出的气味。克罗伊斯筹划了一次试验，其中只有德尔斐城的神示所的回答是正确的：“克罗伊斯正在一个有盖的铜锅里煮一只小羊羔和一个乌龟。”神示所告诉克罗伊斯，与波斯人进行战争将“毁灭一个伟大的帝国，”国王认为这是指的波斯帝国。事实上，进攻波斯是一场灾难，他自己的帝国垮台了。

一般来说，给从事神秘技能的人带来厄运要比至高无上的君主大得多。想得到装满金银财宝

百宝箱的炼丹师被活活烤死在铁椅上或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但古时的神谕者、炼丹师和术士并不是全都没有成功，至少有一个人流传至今，那就是英国炼丹师、特异功能者、间谍007号，他的声誉至今仍然很高。

历史上，真实的 007 号就是约翰·迪，他是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宫庭的炼丹师和占星术士。伊丽莎白对人的眼睛感到很神秘，他宠爱的仆人就象征眼睛的符号在给女王的信上签字。迪领导了英国的间谍网，他签字用

001

每一个 0 代表一只眼睛，7 是两只眼睛、其它 4 个器官以及神秘知识的总和。这些知识是从文艺 9 女神那里学到的。通过迪的算命晶球和“显像石”神可以显灵。迪认为，是文艺 9 女神和他的显像石揭露了西班牙人打算烧毁森林的阴谋，而这些森林的木材正是英国用来建造舰船的。不管这个情报来源如何，这项阴谋是确实存在的。如果这个阴谋得逞，西班牙的舰队将长驱直入。

基督教的作者和哲学家曾描述了很多特异功

能现象的例子，通常把它们归因于天赐或超凡力的体现。在这些作者看来，这类奇迹恰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特异功能现象需要从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予以重视。

16世纪，瑞士医师和炼丹师帕拉切尔苏斯写说：

“人心是宇宙心的微观对应物……一个人可以把他的思想传送给他所同情的另外一个人，不管距离有多么远。他也可以按照别人的思想来行动，就象别人以同样方式来影响他的行为一样。”

18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会授权普罗斯帕罗·兰伯蒂尼（后来做了第14世罗马教皇）调查特异功能现象。他的结论完全超越了当时的观念，即：

- （1）特异功能的灵性的感受不一定是神或超凡事物的作用，在“傻子、白痴、意志消沉者和动物”身上都可能有所表现；
- （2）预言多发生在睡眠时间，清醒时较少，且通常是象征性的；
- （3）对于一个预言家，很难区别开到底是他自己的思想还是特异功能信息。

1858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进化论对宗教神秘地解释世界的挑战恰恰与唯灵论的兴起发生在同一时期。唯灵论试图与死者通话，这一巧合促成了对特异功能现象的第一次科学研究。1848年，据说玛格丽特和凯瑟琳·福克斯两姐妹曾在纽约州的海德维尔她们双亲的房间里与死去的双亲“谈了话”。他们认为，这是神灵所致。此后降神会大兴，甚至在白宫，林肯总统的夫人玛丽·托德也曾试图与已故双亲进行联系，但未获成功。催眠状态好象是这些东西的一种媒介，当时曾广泛流传说，处于催眠状态的人有令人惊奇的功能。

19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和进化论者，很自然要试图证明这种现象可以用科学而不是用神鬼来解释。心灵学一词的字面含义是“超出心理学之外”，它是德国心理学家、秘术研究者马克思·德索瓦在19世纪80年代创造的。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开始了对唯灵论、催眠术和特异功能现象的第一次科学研究。特异功能研究学会1882年在伦敦成立。3年之后，美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今天，严肃的心灵学研究者十分讨厌唯灵论之类的词。心灵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在科

学上属于名声不好的那些学科之列。尽管仍有很多人阻碍对心灵学进行研究，但是，在美国至少有20所大学支持心灵学研究计划。加利福尼亚州奥林达的肯尼迪大学设置了关于心灵学的硕士研究科目。至少有8种英文杂志致力于心灵学的学术研究报告。

肯尼迪大学硕士研究科目中写道：把心灵学作为“特异功能现象的科学研究课题，那是因为它生物体与其周围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看来目前尚不能用自然界已知的法则来解释它们。”

特异功能是心灵学家们描述所有这类现象的术语。从大的方面来说，特异功能分两大类：特殊感应机能（亦称超感官知觉——ESP）和意念致动（PK）。意念致动就是“超自然动力”，即指能够不施加任何已知的自然力来移动或影响物体。尤里·盖勒显然就是用精神力弯曲了调羹和钥匙，从而使意念致动传播于世。

特殊感应机能尚未明确指的是什么，研究人员常常谈论一般的特殊感应机能（GESP），而不谈具体的信息传感（亦称传心术，即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通信）、透视（指看到隐蔽之物的能

力)、预知(指知道未来)或“体外感受”(OOBE——out-of-body experiences)。

心灵学家不大同意给一般的特殊感应机能确定一个范围，也不同意明确定义什么是特异功能。一个接一个的研究人员均为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异常现象打上了心灵学的标记。那些与通常承认的科学标准相矛盾的异常现象据报道有：促狭鬼(性喜捉弄人的鬼)、占星术、神秘动物(大脚兽、雪人、尼斯湖怪)、美国中西部农场牲畜的神秘的阉割、信仰疗法、超在禅定法、西藏天气模式(据说是由喇嘛们用意念致动力控制的)和飞碟。据首次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灵学研究哲学博士的杰弗里·米什洛夫说，在两派心灵学家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派主张把研究限制在争论较小的现象上；一派则主张采取客观的办法，并“把自我意识、对心灵学的评论历史进一步扩展到早期科学文化传统中去，如萨满教、瑜伽术、泛神论神秘主义和神秘教义等。”

大多数心灵学研究人员在他们的领域中，均感到似应包括促狭鬼，虽然，没有什么人用“遥远自发意念致动现象”(RSPK——remote spontaneous psychokinetic)这个词，而这个

词要比起促狭鬼来不带有秘术的味道。促狭鬼现象是实验室最好的研究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在房间里持续几周或几个月,深更半夜玻璃被打碎,门窗大开,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出现这种现象的屋子里,经常是有一个烦躁不安的十几岁的少年。心灵学家们认为,遥远自发意念致动现象可能是儿童烦躁的特异功能表现。

大多数心灵学家均感到占星术似乎不应包括在这个领域,尽管在异常科学现象研究的意义上,它引起的争论最大,而且最近在研究体育比赛的胜利与运动员出生时火星位置之间的关系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进展。“火星效应”研究是米切尔和弗朗科斯·加库林的一篇文章中报道的,该文发表在1980年欧洲科学杂志上。目前他们经受了各种攻击,并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批评。除非有人进行相反的研究或者发现加库林的工作是错误的,否则这种异常现象仍将成立。

据我推测,对不明飞行物(或称飞碟)是否属于这个研究领域,心灵学家们的态度大约是各占一半。确实有些人对心灵学感兴趣,同时也对飞碟感兴趣。例如,海军情报局摄影科的一些人参与了很多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军事研究,同

时也正式或业余地对飞碟进行了研究。很多著名的飞碟研究人员认为，飞碟从起源上来说是具有特异功能，而不是天外来客。一些有名的特异功能者，包括尤里·盖勒在内，都认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飞碟中的天外来客。但一些人则否认飞碟与特殊感应机能之间有任何联系；或者是对一方感兴趣，对另一方不感兴趣。

目前，对一般的特殊感应机能研究，大多都涉及了体外感受，特别是遥视，或者叫作脱离人的自然身躯并看到远方地理区域的能力。尽管术语都已现代化了，但400年前的炼丹师帕拉切尔苏斯就曾描述过这些现象：

“人们也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使用它，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和他们周围的环境，虽然这些人可能离他有1000英里远。”

一些遥视试验使用斯坦福研究所普瑟夫和塔格设计的两种方法中的一个即可。一种方法是只给特异功能受试人员简单的地理座标，如经度、纬度等，然后让他描述该地点的情况。另一种方

法是研究人员可实际去察看目标地点，特异功能者通常则被隔离起来，因此不可能与在目标地的人联系，然后让他描述或画出他的印象。

普瑟夫和塔格报道说：“很显然，每个人都可以体验遥视。”事实上，一般人与职业特异功能者表演得同样好，只是无经验的受试者所得结果不象职业特异功能者“那样可靠”。

普瑟夫和塔格说，有才能的受试者所得之结果“更为可靠”，看起来确实如此。一个受试者曾准确地描述了3000英里之外一个加锁的档案室的情况。看到更远的一个遥视者说，木星和它的近邻土星一样，有着模糊不清的光环。天文学家们嘲笑了这种说法，卡尔·萨根说，这是“荒谬”的。但9年以后“旅行者-1号”飞船发回了木星光环的像片。

亚历山大中校在《军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特异功能战的文章，该文强调指出：“一般认为，苏联和它的盟国在心灵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0年来很多大众读物支持这一看法。”按照亚历山大的说法，心灵学蔑视了美国科学法规的传统观念，因此，得不到什么经费和鼓励。相反，苏联的研究人员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

……并且发展了一套理论来解释和研究这些现象。苏联人已经进一步开发了一些技术来控制 and 积极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心灵学知识。”

亚历山大认为，由于美国持怀疑态度，苏联已在特异功能军备竞赛中占了上风。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亚历山大援引了国防情报局和军医局局长提供的情报报告。有一份报告说：

苏联在心灵学方面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这项工作中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有着军事上的潜力，特别是在心理控制方面。……看来，苏联正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更加危险的方面。苏联研究人员没有必要“告诉美国人的特异功能潜力必须充分利用。”

甚至，美国一家大的传播媒介也很快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推测。《全国广播公司杂志》在对苏联的心灵学研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后认为：“看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俄国人至少相信心灵学是存在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很难想象，苏联心灵学

家是如何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神秘主义”的概念的，而这些却一直使西方的研究人员退避三舍。在苏联的科学研究，不仅要符合传统的科学观念，还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那些对科学和教育都有影响的官员的任命，如教育部长、农业部长、苏联科学院院长、各大学的校长等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学校教科书的发行，甚至个人学位的授予都要按正统的意识形态来办。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的存在决定了历史。任何超自然、神或其它非物质的干预都是统治阶级虚构的，目的是要欺骗被压迫阶级以使他们相信，他们的贫困境遇是命中注定的，而不是统治阶级贪婪的结果。马克思把宗教称作是“群众的鸦片”。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反应。物质存在决定了意识。官方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精神力是不存在的：“思想既不能在现代化的显微镜下看到，也没有重量或能用尺子去度量。意识不具备自然的性质。”

虽然，俄国的科学家在共产党革命前后都研究过信息传感（传心术）问题，但记录表明，心灵

学在苏联科学界引起的争论甚至比西方还要大。斯大林认为，象信息传感这种非物质的意识能够产生有形的影响，这种思想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按照共产党批准的大百科全书的说法，信息传感（传心术）“即指人具有超自然能力，使之能脱离时间和地点感知的现象。这是反科学的，是唯心主义的伪造。”

对苏联研究者来说，斯大林轻率否定心灵学研究的指示，要比美国研究者遇到的怀疑和资金不足厉害得多。苏联持不同意见者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枪毙，所以，这类研究工作在1938年就停止了。在美国，只有很少的研究人员愿意冒被科学界排斥的风险去研究特异功能。我们相信，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也不会有人愿意冒被枪毙的危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苏联怕美国在特异功能武器方面领先，所以又重新开始研究。1960年，法国《科学与生命》杂志报道说，美国海军用核潜艇“鳐鱼号”成功地进行了信息传感试验。文章的标题十分引人注目，是《美国海军在核潜艇上运用特殊感应机能（ESP）！》“信息传感是新的秘密武器吗？特殊感应机能是未来战争的决

定因素吗？美国军方掌握了特异功能实力的秘密了吗？”

法国的报道虽然遭到美国政府愤怒地否认，但却象一枚深水炸弹在列昂尼德·L·华西列夫^①的心里爆炸了。尽管斯大林禁止，华西列夫却一直在秘密地对信息传感进行研究。斯大林死后7年，1960年4月华西列夫在苏联科学家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就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而且，至今对这些研究的结果仍保密！今天，美国海军正在它的核潜艇上试验信息传感。苏联科学家在25年前就多次成功地进行了信息传感试验。目前，当务之急是我们应当抛弃偏见，应当对这一重要的领域重新进行研究。”

尽管法国的报道很快就被揭露出来是个骗局，但苏联的报纸和科学界的官员却不断放风

^① 列昂尼德·L·华西列夫，苏联医科院通讯院士，列宁格勒大学心理学教授，列宁奖金获得者。——译注。

说,“鲳鱼号”试验证明了苏联与美国在特异功能武器方面存在着差距。苏联重要的特异功能研究杂志《生物无线电通信》于1962年出版,该杂志添油加醋地报道了“鲳鱼号”的传闻,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了这一试验,威斯汀豪斯公司和兰德公司参与了这项研究,美国空军和海军给他们经费。

没过多久,情况完全不同了,那些关于苏联在特异功能研究上取得了惊人进展的十分可疑的报道,出现在了美国的报纸上。苏联研究人员帕维尔·诺莫夫公然宣称,有关“鲳鱼号”的报道不管是不是骗局都无关紧要,“如果美国海军没有进行‘鲳鱼号’试验,那么,苏联科学家就是世界上首先从一艘潜艇上进行特殊感应机能试验的人。”

诺莫夫说,苏联科学家把一些幼兔放在潜艇上,“他们把母兔留在岸上的实验室里,并在母兔的头部插入电极。当潜艇潜入海面以下一定深度时,助手们把幼兔一个一个杀死。

“母兔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即使它知道是在做试验,也无法知道它的小兔是什么时候死的。然而,在每只幼兔死的同时,母兔的脑子都有反应,这说明存在信息联系。”

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思·施罗德写了一本书，名叫《铁幕后的特异功能》。据他们推测，“苏联已拥有总数达2 百万受过训练的特异功能者”组成的一支部队，在为克里姆林宫征服世界服务。

有关苏联在心灵学方面进展的报告给美国五角大楼和一些国会议员敲了警钟，他们要求美国应竭尽全力缩小与苏联的“特异功能差距”。这些报道反过来又惊动苏联正统的理论家，1973年有一篇题为《心灵学——事实还是伪造？》的文章提醒苏联研究人员注意，背离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是不允许的，文章说：

在谈到出版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些在心灵学问题上的政治投机。我们首先想到了S·奥斯特兰德和L·施罗德那本叫作《铁幕后的特异功能》的书，……作者不是科学家，作品水平很低，只是为了耸人听闻。此外，心灵学是为反苏宣传服务的，而反苏也为宣传心灵学服务。整个过程到头来只是在最高阶层内的一笔交易。大约在两年左

右的时间里，该书再版了5次。由于作者的专业水平太低，书中到处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差错和错误以及直言不讳的反苏攻击。该书对本国心灵学家所取得的“成绩”大加吹捧。在西方报刊上，特别是在有关心灵学研究的报刊和普通报刊上也经常有类似的吹嘘（但一般没有公开的反苏言论）。文章经常论述的内容都是关于心灵学与国防、心理战、情报搜集等方面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心灵学研究争取更多的资金。

当美国之音播送《铁幕后的特异功能》一书的节选时，苏联立即取消了外国人与苏联心灵学研究者的联系。该书作者重要素材的提供者之一诺莫夫被逮捕，并充军到西伯利亚做苦役，他的实验室被关闭，同事被解雇。

我国的怀疑论者也发起了攻势。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目前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流行病，需要制止。”他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是由纽约州立大学

教授保罗·库尔茨创立的。库尔茨说，委员会的目的“只是为了与胡言乱语作斗争。”除了萨根和库尔茨外，该委员会的成员还有行为主义者B·F·斯金纳、魔术师詹姆斯·兰迪、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和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很多心灵学家认为，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是一个唯理智论的自警式组织，它准备成立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对任何轻率声称成功地进行了特异功能试验的研究人员将处以私刑。另外一些人则欢迎它仔细审查。总之，心灵学家和持怀疑态度的人之间的关系倒很象是一场游击战争，而不是科学对话。如果可能的话，胜利者真会把失败者流放到西伯利亚。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有幸参与了这场众所周知的战斗。美国空军利用麦克唐纳公司的实验室研究特异功能保护核武器安全的问题。非营利性的麦克唐纳基金会慷慨地向全国各地的私人研究组织提供经费。然而，最大的一个项目要算是1979年在圣路易斯开办的麦克唐纳特异功能实验室。它每年要为两名研究人员彼得·菲利普斯和迈克·沙弗提供50万美元。

从表面上看，菲利普斯和沙弗正在研究意念致动来弯曲金属，即在基本不用或根本不用物体接触的情况下，用特异功能使小的金属制品，如调羹、钥匙等弯曲或变形。但研究的最终目标更为雄心勃勃——已故的麦克唐纳（1981年去世）希望和死去的试飞员进行联系。他认为，弯曲金属可以确定并训练有希望的特异功能者。

麦克唐纳是相信秘术的，所以他的公司制造的飞机有的叫“鬼怪式”，有的叫“魔术师”。他是一个工业巨头，并曾不停地向国会游说，以增加政府对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

在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记忆中，麦克唐纳是“有洞察力、向前看和爱国的”；并且公开表明，他有可能是正确的。特纳说：“20年后，我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当时对研究特异功能现象的证据如此消极，但那时我可能又会象现在一样。”

麦克唐纳在1920年对死人的兴趣不是绝无仅有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告诉《科学美国人》杂志说：“一个时期以来，他一直想发明一部由死人操作的机器或装置。他们以其它形式存在或在别的星球上。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特异功能研

究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们必须使用科学仪器和科学的方法。”位于新泽西州西奥林奇的爱迪生国家历史遗址纪念馆的官员们认为，爱迪生的说法只是开句玩笑而已。但《科学美国人》则很认真。爱迪生希望在记者采访后的几个月内“利用活塞原理”制造一部仪器，放大来世的信息。

不久以后，严肃的心灵学家就不再研究来世事物了。他们不希望被魔术大师霍迪尼惩罚骗子的剑插在自己身上，骗子是用骗人的降神会来剥削死者家属的。多年来，心灵学研究者一直避免从事任何与唯灵论有关的事。但近来，死后生存又成了心灵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持怀疑态度的人一如既往仍讥讽它纯属“秘术”理论。但是，罗伯特·扬却把“弗吉尼亚大学的系统而慎重的再生术研究”列入了令人信服的特异功能现象研究项目之中。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名叫“天国联合公司”声称能给死者送信，每百字60美元、“优先投递”要200美元。当然，寄给阴间和死去爱畜的信件是不会被收到的。另外还有一家公司，专门出售与天国相通的闭路电视，生意十分兴隆。

中央情报局对此也感兴趣。前特工人员维克

托·马凯蒂说，在50年代，中央情报局曾试图与死去的苏联特工人员进行联系，希望他们能够从留在坟墓的思想中认识到共产党唯物主义的错误，并投奔西方。

菲利普斯和沙弗生性谨慎，并不打算与死人进行接触。但他们说用两个叫M·E和S·S（他们的真正名字叫米查尔·爱德华兹和斯蒂夫·肖）的人成功地弯曲了金属制品。这两个人都是20出头，1979年麦克唐纳特异功能研究室开业时从事全国报纸的广告业务。他们声称能够用手轻轻抚摸调羹、钥匙之类的小的金属物品，同时集中特异功能使他们弯曲。以色列特异功能者尤里·盖勒也能这样做。

菲利普斯和沙弗说，他们的受试者的能力已在严格的科学监督下进行了试验，其中包括录像，以便发现和录下欺骗行为。据说，这个录像带要在1981年8月的心灵学协会会议上放映。

菲利普斯和沙弗在这次大会上作的简要介绍说，他们确定的研究目标是“探索这两名受试者的能力的范围，揭示有助于出现此种能力的条件，获取关于巨大的意念致动力的最佳控制证据，录制令人信服的弯曲金属物品的录像带。”

多年来，这两个受试者都说可以成功地弯曲金属。一个人是使用从军事技艺学来的显形技术；另一个人是“使思想入静，这样他的潜意识便可工作。”菲利普斯和沙弗说，受试者“证明很适应试验要求，尽管他们周围有电子设备感到不舒服。”

心灵学协会至今也未收到这个录像带，有的人怀疑所谓 M·E 和 S·S 是詹姆斯·兰迪有意安插的魔术师，兰迪本人是一个著名魔术师、脱身术者和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打手。另一些人则认为，兰迪可能已和研究人员串通一气，由于大会同意要他们的录像带而给会议造成难堪局面。

面对怀疑者的责难，菲利普斯和沙弗仍然坚持说，他们的试验程序预先排除了欺骗的可能。麦克唐纳基金会与它的研究人员一样仍满怀信心，甚至使霍夫曼-拉罗奇医药公司相信，特异功能或许有朝一日能应用于遗传工程，这比用常规技术进行基因移植便宜得多。

对菲利普斯和沙弗来说，心灵学协会中的怀疑者不幸而言中。1983年3月，兰迪在报纸的头版上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一骗局。菲利普斯和沙弗

不得不承认他们一直在欺骗。

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兰迪是菲利普斯和沙弗的忠实“顾问”，他通过第三者不知不觉地告诉他们，受试者如何行骗，怎样才能防止骗局被揭露。兰迪在心灵学协会的一封公开信中，甚至把M·E和S·S也说成是骗子，但未公开承认认识他们。

兰迪在揭露他的骗局以前曾吹嘘说：“我希望，首先是麦克唐纳，然后是其他所谓有声望的心灵学实验室将承认M·E和S·S是名符其实的。”以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心灵学研究搞臭。”

实际上，对这个骗局的最终结果可做多种解释。兰迪过早披露他的圈套是为了使他可以先上电视。事实上，这实在是太早了，连菲利普斯和沙弗都没有正式公布他们的试验。尽管他们向心灵学协会说过，但按照科学上的规定，研究人员在公布他的研究成果之前等于什么也没说。根据这一标准，兰迪并没有抓住菲利普斯和沙弗或其他任何人的把柄。然而，这却提出了严肃的道德问题，尽管菲利普斯说它是“值得花精力去研究的。”此外，兰迪的合作者也是为了讨好麦克唐

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暗示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特异功能为一名研究人员的女儿治病，她当时正患严重的眼疾。

当菲利普斯和沙弗感到懊伤的时候，魔术师已有很多办法能弯曲金属物品。尤里·盖勒有时就用一把小巧的老虎钳，把它藏在腰带里，表演时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开，再将钥匙弄弯；或者是把已弯曲的部分用手遮起来，这样在盖勒摩擦它们时，把已经弯曲的钥匙慢慢地露出来，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是轻轻地把钥匙弄弯了而不是原来就弯的。

魔术师对这种复杂巧妙的技艺是保密的，这样，即使是很简单的骗术也可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个星期天，我告诉我所喜欢的墨西哥餐厅的一个女侍者说，我也是一名新学的能用特异功能弯曲金属的人。我让她拿来两个完全一样的餐叉，一个交给我弄弯，一个留做比较。我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特异功能者，所以有时很难看出弯曲来。”

由于我预料有可能被说成是冒充的特异功能者，所以有点慌张。我让女侍者把我要弯曲的餐叉挑出来拿在她的手里，闭上眼睛，心里想着

“向上”。她闭上了眼睛，我就把用来比较的餐叉在桌边上把它往下弯。当比较两个餐叉时，她手里的那一只比我已经弯曲了的“正常”餐叉就显得往上翘了。

她轻信了这个骗局。但不要以为只有这个女侍者是如此幼稚，尤里·盖勒用同样的手法愚弄了《时代》杂志的全国科学记者约翰·威廉。

对冒充的特异功能现象的信仰是很容易形成的，而且不易动摇。最好的证明是受过很好教育、有好奇心的人也愿意相信。1980年，长滩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巴里·辛格和维克托·A·贝纳希，曾在一篇文章中报道了人们轻信特异功能哗众取宠的表演这一情况，题目是《自始至终愚弄人》。辛格和贝纳希把表演者克雷格·雷诺兹介绍给他所负责的班级中的四个班。雷诺兹身着紫色唱诗班长袍，穿便鞋，带着金星大奖章。辛格和贝纳希把他介绍给其中的两个班时，说他是一个“对异常心理学或特异功能感兴趣的毕业生”。介绍人告戒说，他们“本人不相信”雷诺兹或其他任何人的特异功能。在另外两个班，把雷诺兹说成是魔术师，并告诉学生们雷诺兹表演的技艺都是很“简单的业余戏法，

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表演，甚至在儿童魔术书中都有说明。”

在每个班里，雷诺兹蒙着眼睛读10个3位数，把烟灰撒在一个学生的手背上，然后再把烟灰放在她的手心里，最后他用手指轻轻地敲击一根铁棒，学生们不断说着“弯、弯、弯”，铁棒终于被弯曲了。

试验的结果使任何一个打算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感到为难。不仅在介绍雷诺兹是特异功能者的两个班里有3/4的人轻信了这个事实，而且在介绍他是魔术师的那两个班里也有2/3的学生相信他确实是个特异功能者。学生们用护符把他们的论文盖起来以防恶魔。18%的学生报告说，“感到恐惧，情绪受到了很大刺激。”

辛格和贝纳希观看了雷诺兹的两次表演。他们说，在表演中间，“学生们不断地说着‘弯、弯、弯’，整个班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学生们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直到看到铁棒弯曲后他们才吁了一口气，噉噉喳喳地议论着。下课后，他们仍旧呆滞地坐在座位上，有的连连摇头，有的兴冲冲地跑到雷诺兹那里，问他为什么他们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辛格和贝纳希说，试验的结果是“异乎寻常的”，认为“如果人们知道的越多，他们就越可能相信一些人有特异功能。……我们真的这样傻吗？是的。”

五角大楼在某种程度上对心灵学家和怀疑论者之间的相互攻击比较超脱，五角大楼在调查所有新技术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使我们对他人的进展不至感到太突然而无所措手足。当初，很少有人认为原子弹可以造出来，即使制造它的科学家们对第一次试验的威力也估计不足。

据说，心灵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过重要作用。在战争期间，特异功能致胜的传说以及缴获的纳粹在集中营进行心灵学试验的记录引起了美国研究人员的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可能已接近于发现实用特异功能武器的奥秘。

很多关于这次战争的传说都是假的，包括具有“雷达般头脑的人”彼得·赫库斯的功绩也是假的，后来他曾被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警察局雇用。在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的协助下，荷兰记者皮埃特·海因·霍本斯对赫库斯在二次大战中的表现和他的传记作者进行了彻底调查。

赫库斯1941年从梯子上掉下来以后，据他自己说，他就获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才能，当时荷兰正在纳粹占领之下。他在自传中说，他参加了“由赫特·古曾斯所领导”的地下组织，“此人是秘密抵抗战士中最勇敢的人之一。”

据赫库斯自己说，他最勇敢的业绩是营救雅普·明德蒙，后者是一名荷兰抵抗战士，被德国人逮捕，关押在佛特镇的一个临时战俘营里。赫库斯偷了一身德国军官服装，然后打扮成“国防军上尉罗伯特·费施纳”，用“流利的德语”告诉战俘营指挥官说，司令部要审讯明德蒙。德国人真的相信了他，把他带到了明德蒙的单人牢房里。

当赫库斯走进牢房时，特异功能使他意识到明德蒙已认为他投降了德国人，“我马上感到他要呼喊，并且会向德国人告发我。”赫库斯没有别的选择，他连打带骂，甚至打得明德蒙失去知觉，然后用战俘营指挥官借给“费施纳上尉”的汽车把他带到了安全地点。

传记说，占领结束后，由于他“保卫祖国的英雄行为”，威廉明娜女王给赫库斯授了勋章。

自传是这么说的，但在战争档案里“没有任何关于赫库斯从事地下活动的记载，”而且根本没有谈到据说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赫特·古曾斯。女王从来没有给赫库斯授勋，并且佛特战俘营的文件也没有谈到对明德蒙的营救。荷兰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传说看来是想象出来的。”然而，至少在两本英文版传记著作中详细记述了赫库斯战时的英雄行为；另有更多的书籍和杂志说，他在佛特的营救工作确有其事。对于粗心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他不懂荷兰语，也未接触过战争档案，特异功能营救雅普·明德蒙看来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一些纳粹分子有理由相信赫库斯的传说，尽管无记录可寻。有的德国高层人物认为，英国情报工作难以置信的成功只能归功于信息传感和遥视功能。即使有人怀疑，但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真的——盟国已破译了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无法破译的”密码。

英国故意宣染它的情报机构的神秘形象。特工人员伊恩·弗莱明接过伊丽莎白女王 007 号约翰·迪的形象，塑造了詹姆斯·邦德的形象，他利用修改后的算命天宫图使希特勒的副手鲁道

夫·赫斯相信，司命星在1941年5月10日赞成秘密和平的倡议。因此，赫斯在那一天空降在苏格兰并被英国俘获。

盟国对心灵学的兴趣并不都是假的。特异功能者埃德加·1·凯斯是约翰·潘兴将军的顾问，并陪他在欧洲执行任务。乔治·佩顿将军在北非使用过探水魔杖。当他的魔杖表明找不到一颗合适的柳树砍下柳枝时，他便从佑治亚空运来了一棵树苗。

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特异功能超级武器的神话，大多始于私人的兴趣，这些人恰好在军界服务，不是身居高位就是属于秘密机构。

众所周知的“菲拉德尔菲亚试验”是典型的神话。1956年，作者莫里斯·杰塞普把他的一本新著《飞碟种种》寄给了海军研究局，并随书寄去了读者卡洛斯·阿伦德的信件。阿伦德说，飞碟是根据爱因斯坦统一场论制造出来的超级武器，并在菲拉德尔菲亚海军造船厂进行了首次试验。按照阿伦德的说法，海军使用远距传物的方法把S·S·安德鲁·法恩塞斯号驱逐舰从船坞送到了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然后再返回，总共只

用了5分钟时间。有一半船员失踪了，其余的包括阿伦德在内经历了可怕的体验，一些人象“疯子一样”，另一些人则冻结在舰位上或不停地打着闪光信号。有两个人粘连在一起，“很可能是因为在一个人身上有一块金属物”，他们开始燃烧，阿伦德说“两个人一共烧了18天。”

这本书引起了海军研究局几个人的兴趣，他们全部自费复制了几本这本书，并将一本带批注的复印本寄给了杰塞普。此后，一些杂志的文章和书籍坚持认为，海军的兴趣肯定是代表官方的。甚至在阿伦德坦白说这些信是骗局后，也未降低秘密武器迷们的热情。他们认为阿伦德受到了海军的压力，因而保持沉默。杰塞普死于1959年，显然是自杀，他们却说是被谋害的，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人担心纳粹发展了类似飞碟的秘密武器，这很可能就是根据他们对特异功能和秘术的研究推测出来的。在战争的最后的几个月，当德国人第一次使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有制导的防空导弹时，很多小火球开始出现在盟国飞机的周围。这些火球俗称“多余拳击手”或“德国佬球”，它们大小不一，小的象高

尔夫球，大的象水皮球；并且灼热，发红光、白光或黄光。当时没有人能解释这神秘的“德国蟋球”，但它们却是有记载的最好的飞碟现象之一，数百名飞行员报告了这种现象，有的还拍了照。盟军渡过莱茵河后这些火球消失了，据说是因为纳粹关闭了秘密试验室。

纳粹充分地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假的特异功能。埃里克·扬·汉努森是一个活跃的舞台演员，也是一个从个人财产情况到占星术无所不能的特异功能顾问，自称是“第三帝国的先知”。汉努森出版一本流行的占星术杂志《汉努森预言周刊》，强调“纳粹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为了讨好纳粹要人，他慷慨贷款。1931年，汉努森的朋友们曾安排希特勒接见了。希特勒答应成立一个“秘术研究院”，由汉努森负责。可惜这个预言家只在他预言的千年帝国里活了两个月。

1933年2月26日，汉努森在他刚刚启用的“秘术宫”里举行了一次豪华的招待会，秘术宫是观赏金色黄道带的地方，温室里面长满了外国植物，还有毒蛇和蝾螈，有集中控制的灯光效果，并把话筒藏在里面，汉努森用此偷听有权势的客人议论。午夜零点，灯光变暗，“第三

帝国的先知”出现在一个闪闪发光的玻璃圈内。他的眼睛用黑色面具遮起来，他的声音充满了不祥之兆。汉努森警告说，希特勒在未来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可能会受到威胁，他说：

“我看到了火，很大的火……一场可怕的大火已经爆发了，罪犯正在放火。

“他们想把德国搞得混乱不堪，破坏选举的胜利。他们正在一座大公共建筑物上放火。我们必须消灭这些歹徒，他们想抵制希特勒的胜利。觉醒的德国人只有采取暴力才能制止混乱和内战危险。”

第二天上午9点半，国会大厦失火，给了纳粹分子取消选举的口实。他们预计在这次选举中可能会失利。

两个月以后，汉努森由于过高估计了自己而导致失败。他试图收回他个人借给重要纳粹分子的钱，因此，“以用假文件欺骗纳粹党的罪名而被捕”。10天以后，在柏林郊外的一片林地里发

现了他已经腐烂了的尸体。据警方说，死者是“下层社会的人”，不久前汉努森和他有联系。

很多人说，希特勒本人是相信秘术的，尽管研究希特勒的最优秀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然而，汉努森作为一个有才能的魔术师，可能深深地打动了元首。但并不是每一个纳粹分子都相信秘术，戈培尔利用特异功能和占星术来进行宣传，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怀疑论者，并十分仇视汉努森。

姑且不谈戈培尔的怀疑，纳粹研究心灵学和秘术并非都是假的。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臭名昭著的试验中就包括：试验信息传感功能在严刑拷打下会不会增强；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浸泡在盛着冰水的大桶里直至死亡，以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在冰冷的英吉利海峡里能活多长时间。

毫无疑问，这些被缴获的试验记录使美国的情报机关非常感兴趣。美国研究人员设想，苏联也会有同样的兴趣（有人认为，苏联今天仍在试验严刑对信息传感功能的作用）。在朝鲜战争中，关于美国战俘屈服于共产党的“洗脑”的报道，则更加深了这些怀疑。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部门

在1952年开始了对“纳粹所作所为”的有组织的调查。纳粹对火箭的研究引起了战争的革命。一位负责人说，中央情报局有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确保苏联不是达豪集中营试验的唯一研究者。这些试验记录至今仍是绝密文件。

是特异功能军备竞赛吗？

如果美国在与苏联的特异功能军备竞赛中输了，是会有人责怪查理·罗斯议员的。他早就说过：“俄国人已经干得很欢了，我们不应当落在后面。”

罗斯当然知道一些内情，这不仅因为他是众院特别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而且还亲自对特异功能武器进行过调查。

罗斯议员具有南方人的形象，是一个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当过县检察官，曾是烟草院外集团的活跃分子。他还是众院公认

的计算机专家，国会未来学情报交流所的创始人，这是一个私人资助的非正式组织。

《未来的冲击》一书的作者，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国会应当从立法观点考虑未来技术的影响，他说服了罗斯创立了未来学情报交流所。在该所的业务通信上曾发表过太空殖民地、基因操作、“软”能源及其它有关新时代问题的文章。

罗斯认为，美国目前并不需要在特异功能武器上花大量的金钱。因为“我们还不知如何制造这些武器。”他说，一旦所需要的技术获得突破，我们就可能需要制订一个“特异功能曼哈顿计划。”

作为议员的个人经历使他相信，这种突破的曙光就在前面。他观看了中央情报局安排的保密遥视表演。罗斯说：“我看到了一些难以令人置信的遥视例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密切注意这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应当注意苏联人在做些什么。如果苏联人拥有使人们通过精神的作用看到我国的秘密中心的能力，那么，我们将面临着无密可保的局面。”

罗斯认为，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中的怀疑

论者阻碍了对遥视的研究，并对他们的动机公开表示惊讶。他警告说：“我们或许将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我和一些情报人员进行了交谈，他们也知道遥视是可行的，但不同意做进一步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如卫星摄影精确，”罗斯说：“但是，在我看来，它将是极好的廉价雷达系统。如果俄国人没有，我们没有，那我们将会碰到严重的麻烦。我们这个国家过去对陌生的激光和半导体物理学并没有感到胆怯，我想它对特异功能研究也不致于害怕。”

罗斯本人并不惧怕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甚至试验过特异功能武器的样机。有一次，他同意在他自己身上试验，另一次是在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身上试验，但议长本人并不知道。

早在1981年，一个投资小组曾要求议员们帮助，以促使五角大楼对一部电子妄想狂诱发器进行拨款。天文电子仪器公司想制造一部“特异功能神经细胞分裂器”。按照发明者的说法，它可以干扰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诱发暂时性的妄想狂。他们说，它的生理作用“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之类的致幻剂一样，不同的只是用电子方法

传导。”目前这一装置的使用范围恐怕要受到限制，但可以用于军事上。罗斯提出由他自己用这部机器进行试验，他认为这部机器是可行的，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制造超空间核榴弹炮，但我们知道如何去干扰神经系统神经元突触之间的联系，这值得花钱研究。”虽然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而且五角大楼对此也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但最终还是未签订合同。第二年这个公司就倒闭了。

在朱迪斯·斯库奇的帮助下，罗斯还进行了信息传感催眠术试验。斯库奇是一位纽约非常富有的特异功能研究支持者，在陆军大学授课，讲授“奇异现象的发展”。试验时，罗斯站在她的身边，斯库奇加上与陆军大学合作的其他几个特异功能者一起在众议院的走廊里通过心灵作用向议长奥尼尔发射“爱的信息”，指挥这位不知真情的多数党领袖左、右摇头；然后，据一位参加者说，指令他同意在这个议员选区内的一项公共工程项目。斯库奇说，对苏联的领导人同样可以这样做。著名心理学家巴巴拉·马克思·哈巴德（陆军经常就特异功能的发展问题向他请教）希望“用爱而不是用导弹来攻击克里姆林宫。”罗

斯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

很多议员同意罗斯的看法，认为美国和苏联“在特异功能上存在着差距”，尽管他们显得更为谨慎一些。1970年，一本轰动一时的科普著作《铁幕后的特异功能》出版后，国会对国防部的压力大增，要求它拨款研究特异功能。克劳德·佩帕议员宣称，这本“令人惊讶、给人深刻印象的”书，谈到了“一些使人震惊的技术发现”，对此，“我们不应无动于衷。”该书披露的情况确实令人吃惊。它说，苏联的巫师们告诉英国的同行说，苏联正在组建一支2百万受过特异功能训练的军队用于征服世界。但罗斯仍然坚持说，苏联“有一个全国性的筛选计划，以便在学校儿童中发现有数学、艺术或特异功能才能的人。”

《铁幕后的特异功能》一书还提出，苏联的心灵学研究和飞碟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除了特异功能军备竞赛以外，又提出了飞碟竞赛的可能性。书中说：“苏联的心灵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和飞碟专家同时出席莫斯科的研讨会，绝非巧合。”

西北大学天文系主任、美国著名的飞碟专家艾伦·海尼克博士在《花花公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他最担心的是，有朝一日他会在报纸上看到“俄国人解开了飞碟之谜。”苏联人用特殊感应机能来训练宇航员，以便有可能与外星人进行联系。海尼克肯定地说，这一成就“对美国的震动将不会亚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其重要性同俄国人宣布小麦特大丰收一样。”

更令人震惊的，是1972年国防情报局研究报告所得出的结论。这个报告原来是绝密文件，1978年公布。国防情报局预计，“苏联人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迟早会使他们做到以下几点：

1. 知晓美国绝密文件的内容、军队和舰艇的部署、军事设施的位置和性质。
2. 在一定距离内影响美国军队和文职关键性领导人的思想。
3. 在一定距离内使美国的任何官员立即死亡。
4. 在一定距离内使所有类型的美国

军事设备，包括太空飞行器失去战斗力。

这些难以令人置信的、启示录式的预言，不断地出现在今天的情报估价中。1975年，国防情报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也于1978年公开）中说，苏联的特异功能电子武器“将对敌人的军队、使馆或安全机构构成严重的威胁。”

至今还是保密的1975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估价报告说：“苏联在实用心灵学研究方面可能领先于美国。”分析人员估计：“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军方和克格勃就在秘密地执行一项实用心灵学研究计划。”并指出：“几个独立的美国实验室最近都证实了异常现象的存在。这类现象可以用于情报搜集工作。”

1976年，中央情报局与国外专家签订了关于广泛调查苏联心灵学研究情况的合同。特异功能者J·W·伊尔肯斯博士曾帮助撰写了这个研究报告，他认为：“苏联实际上正在制造特异功能战的装备样机。”

关于苏联特异功能秘密的惊人说法，大多来自退役的陆军中校托马斯·比尔登，他原是陆军

的一名情报分析人员。比尔登说，苏联拥有超空间核榴弹炮，它“只要发射一发便可使自由世界失去战略能力”，因为它可以把这发榴弹炮弹的核爆炸同时传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罗斯说，这一概念“确实有一些可信之处。”

约翰·亚历山大发表在《军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信息传感催眠术的使用方面，还有很大潜力。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特工人员安插得很深，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他们与满洲里的特工候补人员进行联系，甚至连电话也不需要打。”国防情报局也表示，信息传感催眠术“可以针对美国或盟国核导弹地下井中的人员使用。”1981年，空军曾认真地考虑过要为导弹发射人员购买“特异功能防护服”。这种防护服是由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成员查尔斯·怀特豪斯制造的。他的多谱段图像分析仪则卖给了海军。全国著名的大脑研究中心兰利·波特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艾伦·格温斯以半价向空军提供了“晶体管大蒜仪”（transistorized cloves of garlic）。

据国防情报局说，最令人咋舌的威胁是摄调（apport）技术，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投掷方式，

即指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可以把他自己的‘能体’传到远方某一地点，使一个物体非物质化；然后再把这个物体传送回来，并使之物质化。”目前，还没有报道说苏联打算用这种方法偷盗美国的装备，但是，国防情报局称：“缺乏苏联对这种技术感兴趣的情报，……这是一个重大的情报差距。”

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说：“世界上有些最著名的科学家观看并证实了摄调现象的存在，自然物体穿墙而过”。“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1832~1919）就是这些科学家中的一个。他说：

我曾不只一次地看到过，首先是一个物体移动，然后在它周围出现了发光的云，最后云凝聚成形并变成了一只完整的手……。但也并不总是一种形状，有时栩栩如生，十分优美，手指动作自如，皮肤红润，完全同在房间里的任何人的手一样。手腕和手臂部分变得模糊不清，并逐渐成了光云。摸摸这只手，有时显得冰冷象死人一样；有时则十分

温暖象活人一样，就象老朋友见面一样
紧紧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

情报局的报告说：“苏联人非常认真地看待这种
发光体的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很显然，苏联可能正在考虑利用这
样一只无所不在的手，它能“具有老朋
友见面时紧紧有力”握住东西的能力，
这可能使其拥有第一流的军事实力。最
近对控制摄调技术进行了一些讨论，目
的在于要使人们能够控制“这些发光
云”……它可以造成军事和文职官员立
即死亡。人们甚至进一步猜测说，这些
人可以使军事设备或通信网失效。

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认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
就是“潜意识的心灵的力量要比意识的力量不知
要优越多少倍。”

摄调技术可能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詹姆
斯·兰迪说：“五角大楼正在研究的一项工作是
交感魔法（sympathetic magic）。他们试图

利用意念来显现出苏联军事设施的高分辨率影像，并想着烧掉这些影像，这样，卫星和导弹将会被摧毁。我知道这是相当困难的，但它却是五角大楼的大麻香烟。”比尔登中校说，苏联已经有了一种叫作“光子势垒调制器”的武器，并用它击毁了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1963年，“长尾鲨号”神秘地沉入海底，全体乘员遇难。

“政府对特异功能的兴趣与保护核武器的安全有关。”罗恩·罗伯逊曾这样说过。他是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利弗莫尔研究所的安全官员。该所从事核弹头的设计工作。如果尤里·盖勒可以用意念致动能力弯曲调羹和钥匙等金属物品，并且他能在利弗莫尔表演使罗伯特信服的话，那么，他同样可以引爆一枚核弹。“干这种事只需要把1/8盎司的东西移动1/4英寸的力量。”罗伯逊估计，五角大楼资助了30~40个特异功能研究项目。

查尔斯·T·塔特的一份调查材料表明，除了政府以外，严肃的研究人员对心灵学可能用于军事“最近也都十分关注”。美国14个知名的心灵学实验室中有13个回答了塔特的询问。他们都认为，假如继续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类

应用研究，特异功能用于谍报工作是可能的。其中有 4 个实验室认为，特殊感应机能是可能有的；有五个认为，似乎有；其余 4 个认为，确实存在。同样比例的研究人员相信，特异功能的力量可以使人受伤、生病或死亡；也可以用于干扰物质设备的工作，如电子计算机的运行等。罗伯特·扬发表在 1982 年 2 月份电气与电子学工程师学会会议录上的一篇文章中说，遥视已明显“引起情报机构、司法机关以及其它一切依靠监视的机构的兴趣。”

在塔特进行调查的实验室中，美国政府就心灵学情报资料问题同其中的五个有来往。

特异功能在军事上的潜在用处，并不取决于摄调技术、信息传感催眠术或弯曲钥匙等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它存在，那是很容易被相信的；但这些惊人效果除了在电影院还从未有人见过。由于特异功能者，如尤里·盖勒、M·E 和 S·S 等接二连三地被揭露是个骗局，很多研究人员十分沮丧，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有壮观效果的试验，而把精力集中在低能意念致动的试验上，称之为微意念致动。最典型的就是特异功能受试者试图影响简单的机械或电子设

备，诸如灵敏度极高的温度计或电子计算机的微型集成电路片，这些东西只要用很小的能量就可以使其受到影响。罗伯特·扬等研究人员说，这类试验不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乍一看，特异功能者能够影响受千分之几伏电压控制的电路，这好象与军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知道，下一次大战可能要使用核武器，每一枚核武器的爆炸相当两千万吨梯恩梯炸药。但氢弹是在收到电子计算机的指令后才爆炸的。这些计算机发出点火的密码指令，并把这些指令传给导弹发射人员，他们在导弹地下井中的保险匣子中解读这些点火指令；计算机还引导导弹在太空飞行并打开弹头的保险。每一台计算机都是由很小的电子线路控制的，而千分之几的电压就可以把这些线路破坏。事实上，几乎每一种现代化武器装备，如雷达、灵巧炸弹、飞机的导航系统，甚至坦克瞄准具等，都完全依赖于计算机。特异功能对计算机的控制确实无异于掌握了核垄断，这个事实是不可能不被五角大楼关注的。

特异功能者干扰计算机的能力及其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心灵学界有些人头脑发热。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位特异功能试验人员英戈·斯旺说，公

布这些研究成果有可能招致他被暗杀。研究人员杰弗里·米希洛夫认为，任何具有干扰计算机能力的人“将有可能被消灭”，但他又补充说：“如果这种假设的特异功能确实存在，死亡将对他无可奈何。”

全国著名的心灵学家之一罗伯特·范·戴卡斯尔回忆了两名中央情报局研究人员对他的访问。他说：“他们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盖勒是否能干扰计算机。”

罗伯特·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是否会由于人的意识的有意或无意干扰来扰乱微电子元件的基本程序……特别是在心理上受到高度压抑的情况下。”越南战争期间，海军曾怀疑，由于特异功能者的错误处理，使活动在东京湾的航空母舰上发生了神秘的炸弹爆炸事件。处在兴奋状态下的导弹地下井中的发射控制官员会不会无意识地扰乱导航计算机，从而替莫斯科来毁灭华盛顿？导弹地下井中的工作人员需要特异功能防护服吗？或者正如怀疑论者所声称的，要用“晶体管大蒜仪”来消除迷信的心灵学者的恐惧吗？五角大楼确实很想知道这些事，但

是由于伦理上的原因，扬和他的合作者拒绝接受五角大楼的“黑钱”。他们说，他们的经费全部来源于“私人方面”。除非扬对他的礼物过分地吹毛求疵、刨根问底，否则他不可能知道他得到的美元究竟是不是黑的（但我没有了解到这个钱是黑的）。中央情报局定期通过私人方面提供研究资金。因此，研究人员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资金的真实来源。扬自己也承认，“在我国由于这项研究工作是保密的，所以，它具有相当的冒险性，对此，我不能作出权威性的评论。”

1978年公开发表的中央情报局1952年备忘录透露，该局曾决定“尽可能深、尽可能快地”按着军事和情报的“实用要求，促进特异功能的研究，”而且，“整个工作采取了周密的掩护措施，进行得非常慎重。支持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经费未列入项目，这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据在70年代末负责心灵学秘密研究经费调拨的官员说，这种隐秘的政策一直没变。他说：“中央情报局在很多情况下不想引起什么难堪的局面，但也有其它方面的考虑。”1975年，斯坦利·克里普纳在与肖恩·罗宾斯和其他人员进行有关试验时，他并不知道占其经费一半的私人部分是来自中央情

报局（另一半是由全国卫生研究院提供），直到7年以后“我才从一篇杂志的文章中得知。”

掩盖特异功能研究的经费来源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如果特异功能者都是名符其实的，则中央情报局会有理由认为，他们可以用信息传感功能通过中间人了解实情，或者感知由中央情报局总部准备的文件上留下的“特异功能指纹”来了解实情。另一方面，如果特异功能者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可能不是真正的特异功能者，那么，这个项目就等于白花钱。中央情报局在特异功能研究拨款上采用两个中间人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其中一个中间人知道中央情报局的目的，另一个则相信所编造的情况。这种“双蒙蔽”的安全措施是经常采用的，甚至在最危险的海外反间谍活动中也采用过。

在我国，没有几项不保密的研究项目象扬的工作那样引起军方如此明显的兴趣。大多数研究者都在试图证明特异功能的存在；并且他们所用的试验方法可以由那些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重复进行和验证。目前，这些最有希望的尝试包括随机数字发生器。它是由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

近的心理科学基金会的赫姆特·施米特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心理物理学研究所的查尔斯·霍诺顿率先搞出来的。

随机数字发生器类似拱型视频游艺机，有闪光和声响。声、光显示均由某种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控制。没有任何过程比放射性更富随机性。科学家们大体上可以计算出在给定的一段时间内有多少原子发射出辐射，但不能精确计算出什么时间将发射出辐射。从理论上讲，特异功能受试者若无法控制放射性衰变，就不能控制表演。除非有微小的意念致动力存在，否则这一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要想对象盖勒这样的受试者进行测验，这些试验有很多优点。首先，魔术或任何其它现代科学的已知方法都不能影响放射性衰变，因此，这个机器是无法哄骗别人的。第二，如果特异功能是人类本身的机能的一部分，那么受试者有无这种能力应当象原子一样可以测量。第三，在这台机器上试验的结果可用数量和表格表示，便于用成熟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判断结果是否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则肯定存在某种未知的因素，即特异功能一定在起作用。

霍诺顿把他的机器称之为“特异功能牛车”，它设计得无论是外观还是感觉上都象是游艺机，以使试验更有趣。显示屏分成4个区。受试者把他的射线枪瞄准一个区，并试验猜想敌人的飞碟。如果猜对了，飞碟就爆炸，闪出桔红色和兰色的光，机器显示出“击中”的信号。这部机器对青年受试者来说，要比试验室更有吸引力。霍诺顿和其他心灵学家认为，在受试者放松或处于自然状况下时，特异功能就越明显。通过分析，如果受试者持怀疑态度，得分往往很低。心灵学家谈到了山羊和绵羊的测试效果，绵羊是相信者，成绩经常很好；而山羊是怀疑者，成绩不佳。

一些研究人员提出，这种效应可能就是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即使重复成功的特殊感应机能试验也总是失败的原因所在。

霍诺顿还介绍了另一种很有希望的称之为“干兹裴德”的特异功能试验方法，或者叫做感觉屏蔽技术。它能与随机数字发生器组合在一起进行试验。据称迄今为止，在美国和英国至少有8家实验室用它做了试验，所得结果比其它任何实验方法都好，而且一致性也很好。干兹裴德试

验能尽可能把受试者与许多令人心烦意乱的影响隔离开来，甚至在他们的眼睛上放半个乒乓球，以减少任何感觉“噪音”对超感觉信号的干扰。

对特异功能还有很多普通的分析方法，比起于兹裴德试验来依赖统计因素要少得多，但仍有顽固不化的怀疑论者。按兰迪的说法，对于随机数字发生器不能弄虚作假这一点并未得到证明，他就曾通过踩踏一根电线控制过一部机器。我请教了另一位魔术师，他不同意兰迪的看法，他说：“对我说来，这种看法很不得要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是放射性物质产生的随机数字，而不是用电子方法产生的。”他说，兰迪简直是“乱放炮”。有时他能打中要害，有时却是放空炮。

斯坦福大学的统计学家珀西·戴康尼斯对最近的试验进行了猛烈攻击。戴康尼斯是著名的统计学家，也是著名的魔术师。他从未公开表演过，也未向其他魔术师表演过，但他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魔术师之一。

戴康尼斯批评了随机数字发生器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对过去15年来心灵学研究者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进行了更全面的批评。

早期最普通的特殊感应机能试验是猜“禅宗纸牌”。这是一付有25张牌的纸牌，其中5张画着四方形，5张画着三角形，5张画着圆形，5张画着波状横线，5张画着十字线。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只能猜对5个，如果连续猜对5个以上，就表明有某种信息传感机能存在。过去15年中，心灵学杂志发表的数以百计的试验报告，都是采取这种普通方法进行的。著名的研究人员罗伯特·莫里斯希望，更好的试验设备“会比老一套的试验方法得出更能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的特殊感应机能试验纸牌，一般来说在25次猜试中只能猜对5.75次。

遗憾的是，这种普通办法是行不通的。在戴康尼斯调查的5百多篇文章中，没有一篇统计结果是可靠的。这种“老一套”的特殊感应机能试验的证据根本就不是什么证据。戴康尼斯的调查表明，猜中次数太高了。据说，有5百多次试验表现出了特殊感应机能，事实上它们的结果纯属偶然。由于统计误差对于任何一个认真玩纸牌的人来说都是显著的，因此，一部巨著以及为此所花的数千小时的精力就会白白浪费了。

戴康尼斯计算的结果表明，在禅宗纸牌的试

验中，由于试验情况的不同，预计猜中的次数也不同。如果受试者猜第一张牌是画圆的牌，然后告诉他说：“你猜对了！是一张圆牌。”他便知道在剩下的牌中只有4张圆牌了，但其它花式的牌则有5张。第二张牌是圆形牌的机会是 $4/24$ ；而其它牌的机会比这稍多，是 $5/24$ 。每猜一次，受试者的底数就越多。这样，一个聪明的玩牌者可猜对7~8次。

如果只告诉受试者他猜的对还是不对，并不告诉他是什么花式的牌，那么，猜各种牌的机会就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他猜第一张牌是圆形的，但是猜错了，那么，最好的策略是第二还还猜圆形的。因为他知道在剩下的牌中有5张是圆形的，其它花式可能只有4张。在各种情况下，怎样才能猜对更多，其数学计算方法长达20多页。

一些心灵学家说，戴康尼斯没有研究最近的试验数据。而他却反驳说，他查阅了“心灵学杂志上发表的所有试验。”

戴康尼斯说：“要进行一次富有成效的科学对话十分困难，特别是你想成为一个有创见性的批评者就更难。绝大多数心灵学家缺乏统计学知

识，不能从统计学的角度解释他们所做的试验，而有些人又不愿接受外界的帮助。上述这些人在其它领域可以称作是科学家。”

用统计方法解释禅宗纸牌试验是复杂的，但解释随机数字发生器试验则是困难的，因为这些试验的数字可以修改。这就涉及了统计理论的基本问题，按罗伯特·扬的说法，就是“容易受印象主义的偏见和争议的影响。”

很自然，统计学家并不能明确说，随机数字发生器试验就证明了特异功能的存在，但也提不出另外的可供选择的说明。数学只是向目前所知的心灵学知识提出了挑战。因此，这样说是公平的，即随机数字和干兹裴德试验确实提出了“用已知的科学方法目前尚不能说明的”一些问题。扬警告说，他们提出了问题，并不算是证实了特异功能的存在。他说：“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知名调查研究人员说，特异功能试验是符合科学的重复性的，更不用说证实了。”

苏联人没有进行这类证实特异功能确实存在的试验，这种说法未免陈腐。

在中央情报局1976年的一份关于苏联特异功

能研究的评论中，科学家们避免使用“特异功能”一词，而是称做“新的生物信息传输”。该评论说：“苏联人没有进行从远方识别纸牌或其它简单的信息传感试验研究，以便搜集统计证据。他们设想，思想传输确实存在。他们的试验都是筹划怎样来解释这种新生物信息传输机制的物质基础。”

美国的心灵学研究集中于搜集统计材料来证明特异功能的存在上，因为这是克服美国科学界反对态度的最好办法，倒不是因为心灵学研究者自己认为这种试验最有价值。事实上，参加1981年心灵学协会会议的研究人员大多数都认为，比起旨在解释特异功能机制的苏联型试验来，美用统计试验没有多大意义。我国很少进行苏联型的试验，因为科学界对特异功能是否存在有着政治上的争论，所以，获得研究特异功能机制的经费是很困难的。

如果一些苏联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更喜欢美国式的试验，我对此不会感到惊奇。苏联的试验人员正在和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喜欢对新发现的神秘现象的存在做机械性的解释。这种倾向支配了他们不去进行统计试验，以

证实“中世纪迷信”的存在。这使苏联研究人员必须承认特异功能的存在，并断言西方科学家错误地解释了自然现象，而这是用官方的唯物主义哲学可以解释清楚的。在苏联，并不是对西方类型的试验不感兴趣，而是政治上不能接受。

试验途径上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只表现在字义上。美国的研究人员用“新的生物信息传输系统”或“非感知状态”等迂回的说法来避免神秘色彩；而苏联的研究人员则说“超物理学”或“生物等离子体”，而不说心灵学或不可见辉光。试验做法的某些差异反应了各自的文化倾向。纸牌游戏在苏联是不普遍的，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苏联的特异功能者常被要求在一定距离内把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开，而不要他猜禅宗纸牌。在美国和苏联的研究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差别。两国的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地追捕着一个难以捉摸的、神秘的、在政治上又有争议的猎物。

在我国，对心灵学顽固的保守信念妨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甚至在具体研究项目上争论到不能用“特异功能”这个词。1977年，负责研究和发展事务的海军部长助理塞谬尔·科斯洛夫得知

海军已经和斯坦福研究所签订了一项研究极低频无线电波与心理控制的合同。因为人脑以同样的频率产生电信号,所以,科学家们认为,用这种频率传播强信号会干扰目标区内人们大脑的自然活动,从而会引起高血压、甚至突然死亡。但“心理控制”这个词却使科斯洛夫大为恼火,他拒绝任何带有特异功能和秘术色彩的字眼。他命令海军拨款进行特异功能研究的项目全部停止。斯坦福研究所的合同被取消了,但别的项目未遭此厄运。目前,极低频对人脑影响的研究已获得充分的经费,并且是高度保密的。

尽管科斯洛夫之类的人拼命反对,美国的研究人员已赢得了政治上的必要支持,至少在名义上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1981年6月,众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同意了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该报告说:

相对来说,有关意识的物理过程的研究得到的拨款较少,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怀疑这种研究的可信性和潜在的价值,尽管现在持怀疑态度的人比过去要少一些。……如果这方面的知识有着巨

大的潜力和深远的影响，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苏联官方在大力支持这种研究，国会将对我国的研究工作做出认真的评价。

这个报告中提到，警方已经使用特异功能在犯罪现场跟踪“感情的痕迹”。尽管“目前所进行的探索性的基础研究究竟能得到什么结果尚不清楚，”但在国家防御领域，“认为人能够识别远方地点，能够影响灵敏的仪器和别人的心情，这些都是很有用的。”

然而，国会对心灵学研究的支持决不是一致的。据田纳西州议员罗宾·比尔德的前助手托姆·麦克纳马拉说：“这类性质的研究会使整个防务界视为滑稽可笑的事情。”当比尔德听说了佐迪克夫人和陆军大学特异功能的事情之后，这位海军陆战队上校、国会议员中唯一的现役军人说，他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五角大楼现在提出一个合理的提案，并证明它是符合道理的，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查。”麦克纳马拉告诉一位记者说：“但事情并不是如

想象的那么简单，老兄，佐迪克夫人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处理得了的。”

众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迪克·吉扎反驳说：“考虑到政府过去干的一些蠢事，比如在密尔沃基进行的种族划分研究，把钱花在这方面还不算什么坏事。”

科斯洛夫的态度得到了白宫前堵防漏密人员G·戈登·利迪的支持，他的职责曾一度涉及到开发非常规的情报手段和方法。他说：“俄国人花了大量的钱研究心灵学，五角大楼也有一个专门机构从事这项工作。我想这是胡说，但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那也无可非议，我只希望他们不要过分浪费纳税人的钱。”利迪并不认为心灵学研究除了纳税人以外，会危及任何人，他说：

“我认为未来的武器是高能激光、质子加速器及其它类似的武器，而不是特异功能。”

有一次，五角大楼确实核查了苏联的研究情况，并肯定地说，至少有一个研究项目是浪费了钱财。1975年，陆军与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的4名物理学家签订一项14万5千美元的合同，让他们调查科利安摄影术（这是苏联的一对夫妇发现后以其名字定名的），科利安像片是受试者在高压

电场下拍摄的，试图用生物周围的闪光色彩以显示运动的“辉光”。科利安夫妇说：“我们曾明显地看到非常活跃的生命活动，……通过闪光的明暗和颜色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人体组织内部的情况。”

科利安像片看来能反应受试人的感情状况，颜色变化反应生气、高兴以及健康情况的好坏。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像片好象还拍摄出了心灵，这很可能就是特异功能力量的来源。例如，有一张刚剪断的植物叶子的像片，但它却显现出了整个叶子的轮廓，包括被剪掉的那一半，无疑这是特异功能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脱离物质而存在。

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报告使这种希望成为了泡影。所谓“辉光”是电晕放电现象，这与北极光相类似，是由高压电场和受试者湿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报告的作者说：“既然我们的工作证实了科利安摄影的能量的主要来源是电晕放电，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技术叫做电晕放电摄影术。”

物理学家们提出，任何潮湿的物体都有科利安辉光，包括盛面条的碗以及预防剂。颜色确实

与受试人的感情状况有关，因为人的排汗量多少取决于紧张程度。测谎器也是测量一分钟内汗量变化情况的。至于那片剪断的叶子，德雷克塞尔大学的科学家们揭露说，电场实际上可以把任何被照物体的影像蚀刻在玻璃底板上，一旦一片完整的叶子被拍摄，它的影像将留在底板上，除非把它磨掉。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研究之前，五角大楼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不同的方面使用科利安摄影术。陆军器材司令部就曾研究把科利安像片作为疲劳指示物：

精神疲劳和物质疲劳都在研究之列。所用的精神疲劳的紧张刺激是工科毕业生在学校的演讲；物质疲劳的紧张刺激是炎热潮湿的条件下进行垒球赛。用于指示疲劳程度的像片参数是指尖电晕的直径。

自从德雷克塞尔大学研究证实科利安效应与汗有关系以来，陆军器材司令部发现，指尖电晕在施加物质刺激（如垒球赛）后会增大，在施加

精神刺激（如在有空调的屋子内演讲）后会减小。这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令人惊奇的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研究却没有给通俗的特异功能报刊留下什么印象。德雷克塞尔大学的科学家们不是怀疑论者。他们当中实际上有3个人正试图用激光证实远距意念致动现象。

比尔德议员从未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海军通知他的工作人员说，计算机调查表明，根本没有研究什么“特异功能”、“特殊感应机能”或“心灵学”。如果哪个议员要问什么“新生物信息传输系统”或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感知远方电磁波激励”等，计算机可以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所有这些——世界末日的情报估计、特异功能可以破坏计算机、使核弹头非物质化、从远方窥视秘密文件、国会公开支持联邦政府拨款进行特异功能研究等等——造成了特异功能军备竞赛吗？

显然，持怀疑态度的人说，没有造成这种竞赛，充其量只是互相欺骗而已。海军部长助理科斯洛夫曾试图取消特异功能研究，但未获成功。

他甚至讨厌提到所谓特异功能武器。他说：“这种说法将鼓励人们去做徒劳之举。如果苏联人确实是把钱花在了这种蠢事上，那是因为他们的报纸报道说，我们已经拉开了特异功能武器的差距。我可以给你们看看剪报。”

报纸对心灵学的报道至少说是太神经质了，在苏联也是这样。苏联的一位批评者抱怨说：“苏联和外国出版物的典型做法是互相夸大取得的成果。”他说：

从美国报纸的报道看，1966年苏联人就曾有组织地进行了远距离的信息传感通信试验，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并说取得了积极可靠的结果。这真是一派胡言。

反过来，苏联的《共青团真理报》则报道了这样的事，即在一次地球对阿波罗-14号飞船的信息传感试验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然而，这次试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埃德加·米切尔写道，结果是否定的，成功的次数远比人们按概率论预计的少得多。

美国很多流行的出版物转载了《共青团真理报》关于宇航员米切尔在登月飞行中进行特殊感应机能试验的错误报道。有关特异功能事件的耸人听闻和污七八糟的报道，从黄色小报到有名的大报刊，比比皆是。1977年12月13日的《全国探索者》杂志可能是为了赶上风行一时的电影“秘密的第三本能遭遇战”的时髦，也报道说，不明飞行物经常“出现在核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上空。”一年以后，《广场》杂志也登载了同样的报道，标题是《不明飞行物与美国空军：惊人的遭遇》。一个月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特写《这些神秘的飞行器是什么？》。9个月以后，《纽约时报杂志》在一篇题为《不明飞行物档案：从未透露过的真情》的文章中说：“尽管官方一直在说，他们对‘飞碟’问题并不认真看待。但目前解密的文件却表明，政府对这种现象十分关注。”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记者要搞得政府机构无能、腐败并错误地处理机密文件。人们不能相信他所读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的，不管它是否印着“消息完全属实”或“绝密”的字样。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显然错误地理解了他所看到的文

件。他们真正的“从未透露过的真情”就是人们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但人们却从未使政府信服，尽管他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不懈努力地研究。

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公众出版物还是情报机构本身，都对苏联在特异功能研究上“到底花了多少钱不十分清楚。”

“一种说法是至少在过去10年中花了1200万到2000万卢布（或美元），而且现在也经常这样估计。但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或者说，从没有人说过这个数目是从哪儿得到的。”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认为，如果有的话，这个估计也是被大大夸大了。

然而，基本的事实是，心灵学正在美国和苏联流行。苏联官方的大百科全书不再象斯大林时期那样，把心灵学说成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伪造。”最新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心灵学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主要研究：（1）作为一种信息的感受方式但不能用已知感觉器官的活动来解释的敏感的形式；（2）相应的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活动方式，它是由来自有机体以外的物理现象引起的，无需肌肉活动。”只要符合

“超物理学”和“生物场”的机械语言，苏联的研究者可以自由讨论超自然的治疗和特异功能植物。下面是苏联《劳动报》上的一段文字：

进一步揭示心理物理学和生物物理学中未知的事物，将使我们有可能解释宗教史上至今尚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我们已经知道，伤口的愈合不仅是“圣”水的作用，而且也是由生物场辐照过的水的作用。上面盖有教堂的小块土地就可能有同样的效果。

美国研究人员C·巴克斯特曾用植物做过各种试验，他说，它们能够领悟人的感情——悲哀、欢乐等。实际上，植物并不是对感情敏感，而是对生物场敏感。如果一个人十分痛苦，则他的生物场是“进攻性的”，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植物的生物场并被记录下来。绿色植物能“证明”犯罪活动，从而能给我们传递十分重要的信息。有经验的具有特殊感应能力的人是可以解读这种信息的。

苏美两国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相信，心灵学研究可能导致重大的新发现，这种观点是不能全盘否定的。五角大楼在调查心灵学研究的军事意义上，有着合法的兴趣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至少在防御体制的两个最高层次——白宫和国家安全局上看到他们军事上的目的所在是特异功能军备竞赛。

魔术师与科学家

据说是尤里·盖勒首先把心灵学连同美好的愿望引入了科学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说盖勒是真诚的。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对他倍加赞赏。甚至一位美国总统也接见了他，倾听他的意见——美国必须在特异功能武器方面和苏联竞争，否则将会失掉整个世界。

吉米·卡特总统在1976年欢迎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特略的宴会上见到了盖勒。他弯曲了罗莎琳·卡特夫人的餐叉，

因此，宴会结束后博得卡特总统邀请他私下会见的机会。

吉米·卡特很喜欢盖勒。他的成功表演为他争得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事实上，非难者经常惹得他生气、懊恼，使他的名声很坏）。盖勒当场表演了猜测这位当选总统的心思。

他告诉卡特把心里想到的一种东西的名称写在纸上。盖勒只能看到纸的外圈。通过观察手臂的动作，这位魔术师准确地说出了写的是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在这种职业上称之为“书写解读法”〔Pencil-reading〕的玩意儿，但仍有用）。卡特被征服了，相信盖勒是一位真正的特异功能者，并认真地听取了他关于苏联在特异功能军备竞赛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的忠告。卡特离开宴会后，决定更多注意研究不明飞行物以及特异功能对五角大楼的威胁。

姑且不谈盖勒的看法如何，卡特总统在1976年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至少是在认真地对待特异功能武器，恰好在卡特就职前，克格勃突然停止了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射的神秘的微波辐射。按美国的标准，这种辐射不会危及人们的健康，但是超过了较低

的苏联标准。

国务院坚持认为，说辐射有害于健康是“没有根据的”，但却允许有埋怨情绪的雇员以健康原因调动工作。国务院委托的一家私人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辐射波与使馆雇员癌症发病率异常升高有联系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认为，这种微波辐射是用来监听使馆内部谈话的。而《纽约时报》则报道说，苏联是想干扰美国的谍报装置，这些装置能窃听克里姆林宫与其官员通过轿车里的无线电话所进行的谈话。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给我所询问的情报专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据美国的行家讲，从技术上说，微波辐射既不能监听使馆内的谈话，也不能干扰电子设备。

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另外两种说法。一是苏联人试图蓄意危害使馆雇员的身体健康；另一种说法可能就更神乎其神了，说美国人可能成了电子心理控制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研究特异功能的记录使人们相信这些假设。在斯大林突然取缔“反唯物主义”的特异功能研究之前，列宁格勒大学心理学系主任莱昂尼德·华西列夫教授曾发

表了一篇题为《远距离影响的实验报告》的文章。这是一篇开拓性的文章，试图说明特殊感应机能的存在，并通过自然界电磁波这个媒体来起作用。这样，教条的唯物主义者是可以接受的。报告引起了心灵学者的兴趣自不待说，而华西列夫和他的同事们的文章却首先向人们表明，极低功率的辐射也能影响生物体，引起头晕、食欲减退、情绪波动以致幻觉。华西列夫还设想过，思想可以用同样方法移植到传播图像和声音的微波电视信号上，使之有可能进行远距离催眠或心理控制。

毫无疑问，卡特听取过莫斯科微波事件的简要汇报，但苏联那时的心灵学研究情况象微波辐射一样神秘。1975年，苏联人显然是被《铁幕后的特异功能》一书的“反苏主义”和《美国之音》广播了该书的节选所激怒，指控该书作者的最主要的苏联合作者诺莫夫未经允许就接受了演讲费，并判处他劳改两年。在审判期间，起诉书强调了诺莫夫与西方心灵学家的联系。此后，他的同事亦被解雇。自1961年松动了斯大林的限制以来，苏联公开可见的特异功能研究第一次销声匿迹了。

那么，特异功能研究是取消了呢？还是仅仅不再公开透露了呢？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卡特当选为总统。越来越多的苏联移民说，苏联有秘密的心灵学实验室为警方和军方服务。一位移民物理学家奥古斯特·斯特恩1977年说，60年代后期，他花了3年的时间力图发现特异功能能量的物理基础，苏联理论界称之为“特异功能（或普西）粒子”。这个实验室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内的一幢独立大楼内，人们叫它“第八特别处”，是自动化和电子测量研究所的一个分支机构。按斯特恩的说法，该实验室拥有60名科学家，资金充裕。他们做的试验包括电击新生的小猫，看三层楼下的母猫有什么反应；用电视监视人们，看他们能否感受远方的催眠；把细菌放在两块玻璃板中间，看疾病能否通过玻璃传播。这个科学城的实验室于1969年关闭，但斯特恩了解到，这些研究工作被转移到莫斯科的克格勃实验室去做了。

尼克拉·库克洛夫曾是克格勃的间谍，50年代被派往西德，身上携带着一支伪装得象香烟盒一样的手枪，奉命去刺杀一名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者。他没有奉命从事，反而叛逃到了西方。1976年，中央情报局要求库克洛夫提供一份关于苏联

秘密的心灵学研究中心的报告。库克洛夫说,至少有20个这样的中心,里面的“科学家和设备都是第一流的。”

一位移居以色列的物理学家列夫·图姆尔曼说,在他移居以色列的几年前,也就是1969年,苏联人给了他一千万卢布来资助特异功能心理控制的研究,并说:“你需要什么,人、钱、设备、办公楼,都不成问题。”

1977年,苏联的心灵学研究终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卡特政府却并未忽视它,不管一些官员持怎样的怀疑态度。当年6月11日,克格勃在莫斯科逮捕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罗伯特·C·托斯,指责他获取苏联国家“机密”文件。该文件披露了苏联有几个实验室正进行着心灵学研究。苏联通讯社塔斯社说,托斯是为“美国的特种机关”工作的。

那天夜里,托斯的联系人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的瓦列利·G·帕图科夫往他的旅馆打电话,要求在旅馆对面的大街拐角处立即与他会面。正当帕图科夫把一份20页关于“特异功能粒子”的文件交给托斯的时候,克格勃开来了一辆苏制菲

亚特小汽车，他俩双双被捕。据塔斯社说，托斯想利用帕图科夫为他“定期提供一个保密研究所的实验室的秘密材料。”

帕图科夫被拘留了4天，托斯在旅馆被软禁了几天，受审讯12个小时。在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后，托斯才得以回国。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维格尼耶夫·布热津斯基对此十分关注，说托斯的被捕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新闻的自由流通、自由接触和出版自由。”

苏联报纸对这个问题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看来问题很清楚，说这位新闻记者的活动是非法的，有着充分的证据。然而，美国报纸却把托斯说成是“非法迫害的无辜的牺牲品”，是“恐吓”的牺牲品。恰恰是他自己有过重要的暗示，他担心在莫斯科的前景。好一位“加利福尼亚的英雄”，“一位无畏无瑕的骑士”。他回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好象是从地下钻出来了个俄耳浦斯^①杰

① 俄耳浦斯，古希腊传说中具有超人的音乐天赋的英雄。——译注。

克·安德森对他的行为不遗余力地大加赞赏，把他说成是一项成就，众所周知（他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密切联系，理所当然，他不仅要袒护它们，还乐于抬高它们的身价）……一些身居高位的美国官员说，对他的虐待（纯属推测）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问题，诸如新闻的自由流通、自由接触（其来源）和出版自由等。

苏联人对毁谤他们的正义制度和出版自由的社会主义概念感到愤怒，这并不令人奇怪。使人惊奇的是，这篇文章首次承认了目前苏联官方对心灵学的军事潜力感到兴趣，文中说：

人们知道，托斯先生的朋友不仅仅是一个业余的心灵学研究者，他还负责某个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与他会面是经过密谋确定在僻静的角落里进行的，以防意外。托斯毫不掩饰地索取研究文件，并力图把他的朋友变成一个获取间谍情报的来源。他对某个研究所的活动特别感兴趣，而这个研究所的事只限于

少数人知道。

他的“来头”很清楚，托斯先生对有军事用途的科学部门十分偏爱。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确实在进行这种研究，但美国政府却从未加以承认。当政府根据新闻自由法公布了关于心灵学的军事应用研究时，它早已进行了10年之久。这种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任何人对它都没有真正的兴趣，更不用说间谍人员了。托斯事件显然不只是涉及了出版自由问题。

托斯被拘留期间，卡特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由于他没有象在竞选时保证的那样，公布政府没有发表过的飞碟档案，很使飞碟的热衷者失望。尤里·盖勒曾警告他说，苏联挑选有特异功能的儿童，并可能组成了一支特异功能部队。现在托斯又由于获取国家科学机密而被捕，但卡特的一些顾问却认为，这种科学并不存在。因此，卡特命令运用中央情报局一切可能的情报手段对苏联的特异功能研究和它的军事潜力重新进行明确的情报估价。这是在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最高级会议上所做的第一个

这种性质的报告。

看来，托斯可能是中了克格勃的圈套，被引诱到街上与一路人相遇，然后由事先埋伏好的克格勃特务逮捕的。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总认为：“有证据表明这是一个骗局。”但为什么要诬陷托斯是获取特异功能情报的间谍？看来没有人能知道这一点，甚至特纳也猜不出。以伪造的间谍罪逮捕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一事，肯定得到了克里姆林宫高层官员的同意，不可能是官僚机构中下层官员支持（或谴责）特异功能研究的派别活动。逮捕托斯的作用无疑是进一步确认苏联确实是在支持特异功能的研究，但克格勃的计划可能是一箭双雕：既诬陷了托斯，又使美国在它确实不感兴趣的心灵学方面相信苏联在支持心灵学研究。

卡特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担心苏联正在使用特异功能间谍，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所有的特异功能者都是假的。显然，尤里·盖勒能了解卡特的这种心情，他们的担心可能是正确的，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是克格勃安插的人，苏联希望他们新的国家里最终能取得重要地位。这些人不全是到了美国，以色列也是被选

中的目标，因为它能够接触到美国的最新技术，在那里很多苏联犹太移民已经取得了高位。

美、以两国都定期盘问有军事研究经历的移民。因此，一些情报官员，包括心灵学的怀疑者和相信者，都推断克格勃想利用心灵学作为敲门砖，打入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和军事研究领域。托斯的被捕增加了移民们所说的苏联科学经验的价值。他们猜想，克格勃可能认为这可以作为一种手段迅速接近西方的实验室和军事秘密，特别是以色列。这是因为神秘主义是犹太宗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对心灵学的兴趣要比美国科学界普遍得多。但是，由于这种兴趣可能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在美国可能会把移民排斥在有前途的岗位之外。

根据卡特的命令，情报机构提出了全面报告，但结论和托斯事件一样，可做多种解释。中央情报局1978年提出了一份报告，两年以后根据新闻自由法部分内容予以公布。该报告没有发现象盖勒所说的那样，苏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特异功能战”研究计划。实际上，报告却强调了苏联心灵学家面临着严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

报告中说:

共产党主张对历史做科学的了解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唯物主义不灵了,或表明有重大的例外,则共产党的基础和一党制政府就将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一点党的理论家是不会忽略的,至少从道理上可以推断,构成超物理学的现象可以理解为包含着非物质原因的存在,这距离被人诅咒的东西——超自然——只差一小步了。

苏联心灵学家坚持认为,这种现象是通过物质的机制发生的,以此来进行反驳。中央情报局指出:“在苏联心灵学家的著作中,经常发现有很多章节论述意识形态或引用列宁的话。”

中央情报局确实发现了苏联对一些技术感兴趣的例证,而这些,美国科学家会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特异功能,如:苏联人用魔杖探测石油和其它矿藏;苏联的心理学家在试验“远距离生理监测器”,这种仪器显然是在不用任何已知的通信

方式的情况下，测量千里以外人的心跳和呼吸速率。

中央情报局丝毫没有忽略苏联秘密的特异功能研究中那些最富启发性的论断，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认为，这些论断可能是真的，但证据不足，有时还互相矛盾。

对美国的特异功能研究也可以这样说。

尤里·盖勒对吉米·卡特有多大影响，人们只能猜测。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立即表示关注的是托斯本人被捕。情报机构说，苏联确实在秘密研究特异功能的报告可能未被注意。但是，盖勒对世界科学界的影响是明显而又巨大的。正是他，在70年代初挑起了人们对特异功能的极大兴趣。

英国著名学者布雷恩·约瑟夫森同意盖勒的看法，其他一些世界水平的物理学家，象尤金·威格纳和戴维·博姆也都同意。世界著名数学家约翰·G·泰勒说：“盖勒弯曲金属物品的功能显然不是欺骗。”（后来泰勒放弃了这一看法，谴责心灵学是迷信。）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发誓说，在他吃的冰激淋里，盖勒显形了一个领带扣，这个领带扣是一个射箭队给他的唯一的一个，而在

他会见盖勒前3年就已经丢了。米切尔说：“我知道这是偶然发生的事，但不可能是骗局。”

盖勒是1971年被医疗电子学专家安德里加·普哈里奇在以色列“发现的”普哈里奇懂点魔术，曾发明了齿状无线收发报机，魔术师用它发送或接收舞台助理的信号。他对特异功能战的兴趣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52年，他给五角大楼的秘密征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在心理战中可能使用特殊感应机能的估价》。一年以后，他给空军的研究人员讲授增强或降低信息传感功能的方法，并给陆军化学中心的参谋人员讲授“特殊感应机能的生物基础”。自那以后，他对特异功能者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了试验，力图发现一个救世主，以使科学界的怀疑论者信服。荷兰人彼得·赫库斯就是普哈里奇把他带到美国的。赫库斯在警察局的工作为他赢得了一些声誉，但科学家们并没有给什么赞扬。

普哈里奇说：“尤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答案，他就是我30年来所要寻找的人。”

尤里作为特异功能者的生涯始于1968年从以色列陆军退役以后。当时他在一家纺织厂工作，把英国、匈牙利和希腊的订货单进行分类，晚间

在月光下制做衬衣模型并表演儿时学到的“特异功能”技艺。很快，他的表演在一个晚上就能挣100以色列镑（大约38美元，比工厂一周的工资还多）。于是，盖勒离开了工厂，雇了一名经理，开始了他赚钱的表演生涯。他的名声很快引起了普哈里奇的注意。

盖勒告诉普哈里奇，他的力量是“文艺9女神”赐予的，她们掌管着外星球的文明，挑选盖勒作为她们驻地球的大使，9女神当中的一个（她们是历史上007号约翰·迪通过显像石进行对话的那9女神吗？）通过盒式录音机从别的星球上对普哈里奇和盖勒说话，录音机能自动打开，并发出“冰冷的机械声”；

我们将告诉你们为什么会产生战争心理，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很显然，如果没有宣传、没有威胁、没有互相竞争，战争心理就会消失。比如我们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生产了原子弹至今还没有使用？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与之相抗衡的反原子武器。假如没有原子武器，也会有其它的武器出现。

普哈里奇认为，地球上的人只是9女神的宠儿。和盖勒一起工作的大多数研究人员说，除了盖勒深更半夜拉着他们在荒凉的乡间小路上看飞碟着陆以外，他们没有为飞碟问题伤过什么脑筋。

最近，盖勒否认了9女神的存在。1982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飞碟问题“损害了我的声誉。”

盖勒在美国国家航宇局戈达德空间中心和劳伦斯·利弗莫尔核武器研究所进行过表演。埃尔登·伯德曾说过，他的工作是“预测未来战争是什么样的”，他在绝密的海军水面武器实验室对盖勒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尽管情报界的代表“谨慎地”出席观看，但主要领导人都坚持说他们的访问是非正式的。

斯坦福研究所的哈罗德·普瑟夫和拉塞尔·塔格也进行了广泛的试验。由于国会议员对美国与苏联特异功能的差距感到忧虑，在这种压力下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决定1972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对盖勒进行评价，以确定是否值得花钱做进一步试验。

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评价小组包括乔治·劳伦

斯（该局人力资源处副处长），心理学家雷·海曼和已故心灵学协会主席罗伯特·范·戴卡斯尔。劳伦斯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打算拨款”给盖勒试验。作为个人来说，他认为意念致动是“荒诞无稽的”，但并不否认有“传递某种信息”的可能性。他的上司空军上校奥斯汀·基布勒早些时候见到盖勒，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曼是一个怀疑论者，并不认识盖勒，是一名有经验的魔术师。

审查从一开始就进行得不顺利，俄勒冈州的尤金城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大雪封闭了机场。这样，海曼不得不乘凌晨3点的班车去波特兰赶飞机，然后再驱车去斯坦福研究所。他迟到了。

劳伦斯和戴卡斯尔在试验的前一天晚上在当地过夜，吃了一顿中国餐。第二天早晨，劳伦斯的肚子犯病，“一定是吃了黑蘑菇和海藻。”由于斯坦福研究所的经费取决于他的印象，联络人员只好把盖勒试验成功的消息告诉蹲在厕所里的劳伦斯。

由于盖勒几乎没有获得什么成功，故联络人员没有象劳伦斯那么忙。盖勒试图表演猜字骗术，

当鉴定人员在纸上写字时他用手蒙住了眼睛，但海曼发现他从手指缝里偷看。他使罗盘的指针偏转了5度，劳伦斯模仿他的动作使指针偏转了45度，包括脚踩地板的动作。他弯曲了指甲刀，海曼又把它弯了回去。

海曼最后建议派盖勒、普瑟夫和塔格去苏联旅行，希望他们叛逃过去。戴卡斯尔想在他自己的实验室试验盖勒，在那儿可以控制得更严一些。劳伦斯对盖勒持否定态度，甚至是刻薄的，但迫于国会的压力，他决定再试一试。

第二天，劳伦斯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格里·舒尔来到斯坦福研究所。舒尔和海曼一样，也是一个熟练的魔术师。但这次把情况告诉了盖勒。

舒尔与盖勒相对而坐，用魔术师的技能重复着盖勒的表演。盖勒说：“一些人不相信特异功能，一些人有能力但没有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只好谈论魔术、低级的纸牌骗术……。在特异功能研究方面，俄国人将会把美国打得大败，原因就在于此。”

舒尔认为，盖勒“欺骗了”普瑟夫和塔格；劳伦斯则认为，盖勒本来就是个骗子。

普瑟夫说：“斯坦福研究所认为，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灾难是它与盖勒进行的试验太草率，控制不严，从而使盖勒有机会进行欺骗。我们，普瑟夫和塔格都感到愤慨，这次‘试验’的问题要归咎于斯坦福研究所，但这已既成事实。”

在第一次灾难性的评价后过了5年，盖勒又回到了高级研究计划局，据那里的官员说，这次与上次一样，“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为研究提供经费。”

盖勒在五角大楼附近的弗吉尼亚汽车游客旅馆内的游泳池旁会见了海军情报局的官员。他让一名军官想他附近的任何一件东西。这位军官想到他身后的一盘葡萄，这样盖勒不可能看到他在看什么。盖勒在一张纸上写了些字并问那件东西的名称，然后把纸交给了那位军官，上面写着“一盘葡萄”。这位情报官员大为惊奇，建议要与斯坦福研究所签订几百万美元的合同。

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怀疑者，包括劳伦斯在内，都十分震惊，急忙派一个由四名魔术师组成的小组去揭穿盖勒。这四个人是：兰迪；统计学家和纸牌专家珀西·戴康尼斯；心理学家雷·海曼和社会学家马塞罗·特鲁兹。戴康尼斯后来回忆

说，他们的会见是不友好的，“他们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力图毁掉这一重要研究项目。”

这名军官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盖勒能猜出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两个原因，魔术师们不愿回答。首先，这一技巧是魔术师的秘密。第二，特鲁兹说，人们通常不相信解释，“即使你知道那是用电线搞的，他们也还会坚持说没有使用电线。”

这位情报官员倒是个例外，他记得盖勒是在把纸交给他之前问那个东西的名称的，而不是在这之后，他最初是这样回忆的。这个差别很重要。看来盖勒在纸上写时，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在那位军官说了“一盘葡萄”以后，盖勒迅速用“姆指笔”把它写在纸上。这是一种很小的笔，藏在姆指的指甲盖下面，魔术师和自称能看出别人思想的人对此都很熟悉。

那天访问结束时，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官员们在态度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戴康尼斯说：“他们都在问，是谁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馊主意。”

在兰迪揭露了尤里的骗术后，盖勒的声誉公开受到了损害，当然这丝毫无损于兰迪作为一个

魔术师和有脱身术的演员。兰迪不仅熟悉盖勒的骗术，并用暂留画面法揭露了他在电视上表演其所谓的“力量”时使用了魔术手法，而且还说服了盖勒的魔术教练去坦白真情。盖勒偏转了罗盘的指针，兰迪在使用同一个罗盘时发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浓密的头发中隐藏的磁铁。盖勒弯曲硬金属钥匙，兰迪使用暂留画面法和特写镜头清楚地表明了盖勒的大铜皮带扣里面藏着一把小虎钳。

尽管象多伦多大学 A·R·欧文博上那样的坚定支持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看来这完全是由一些职业魔术师鼓动起来的，”心灵学界的大多数人承认盖勒是个骗子。但仍有很多人认为，虽然已证明盖勒是个骗子，但他不可能时时处处都行骗。如果特异功能的能力存在的话，就没有理由把尤里·盖勒排除在外。虽然，从科学角度上来看，对他的试验是可以怀疑的。

由于盖勒的活动接二连三地被揭穿，使科学界对他的热情消失了。只是罗伯特·扬在1982年调查特异功能的一篇文章中再次提到了他。这篇文章发表在《电气与电子学工程师学会会议录》中。盖勒只在文中252个附注中的第135名被提

到。然而，盖勒在科学界点起的火花，今天比以往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连普瑟夫和塔格都抱怨说，报界对他们与盖勒的工作报道得太多了，妨碍了他们对遥视作出更有意义的研究。他们说，对写出别人心里在想些什么的试验，“主要目的”是要试验盖勒的透视能力：“虽然我们与盖勒的试验活动只做了总数的3%，但这却使我们承受了97%的声誉的影响。”他俩甚至建议让盖勒充当中央情报局或以色列情报机构的间谍，他的任务就是去试验他们的科学预案，以考验他是否是欺骗。

如果有人对著名科学家也会上魔术师的当感到惊奇，那么，魔术师詹姆斯·兰迪肯定不属此列。兰迪说：“科学家们不习惯与欺骗他们的人共事，他们自认为他们有能力鉴别骗局，但实际上并不能。他们是最早买布鲁克林桥牌的人。”

“当科学家来到剧场，看到魔术师在帽子里变出了一只兔子时，他们会耸耸肩说：‘那是骗人的。’”然而，象盖勒这样的人，来自遥远的以色列，为他们表演弯曲调羹时，他们则认为这是超自然力的作用。坦率地说，弯曲调羹的骗术要比变兔子容易很多，任何白痴都能做。

科学家都拒绝承认他们可能上当受骗，这看来是个令人不解的规律。杜克大学的电气工程师、特异功能研究者爱德华·K·凯利，在1972年与比尔·德尔莫尔做过一系列试验。德尔莫尔是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由于他很会猜牌，在当地小有名气。10年后，一伤心灵学家的调查报告把德尔莫尔的试验列为“整个心灵学文献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尽管人们看到了德尔莫尔使用的是珀西·戴康尼斯的熟练手法。戴康尼斯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好的玩纸牌的魔术师。

戴康尼斯观看了德尔莫尔在哈佛大学由凯利安排的表演。凯利说，这是为了要“取得今后正式进行研究的资金。”凯利顽固地拒绝承认德尔莫尔的魔术，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试图欺骗哈佛大学的霍奇森研究基金。这确实玷污了后来的试验，凯利说：

虽然，魔术师的技巧与登台表演时间长短和演出经验有很大关系，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我不同意戴康尼斯的说法，即魔术师在场是使试验数据完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不是必要条件，因

为设计试验条件使其不受任何受试者（包括魔术师）欺骗是完全可能的。同样，这也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如果得出了肯定的结果，也没有办法阻止顽固的怀疑论者说，这是由于试验条件不充分或受试的魔术师要比旁观的魔术师技艺高明。

在所调查的心灵学家当中，尚没有一个人对戴康尼斯的说法发表过什么评论。爱丁堡大学老资格的讲师约翰·贝洛夫为调查选择了几个“最有说服力”的试验证据，他说：“人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受试者的牌技多么高明，总有办法防止他进行欺骗。”

事实上，确实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一个不懂魔术的人知道，用熟练的技巧什么可以做得到，什么做不到。象爬绳这样简单的表演，几个世纪前魔术师就会了。但对一个陌生者来说，仍然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他有机会去抚摸这些道具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兰迪有句格言说：“当你需要一个医学专家时，你叫他医生而不叫工程师；当你需要一个骗子专家时，你叫他魔术师而不叫物理学家。”

1983年3月，揭开了兰迪充当“特异功能幕后人”长达三年的骗局，其中有两个魔术师愚弄了麦克唐纳实验室的心灵学研究人员，这引起了心灵学家的警惕。这个事件的主要受骗者物理学家彼得·菲利普斯却认为，这个骗局并未白费精力。但兰迪怀疑心灵学家是否会改邪归正。他策划的很多特异功能骗局揭露了，但并未能降低心灵学研究者的信心。兰迪说：“当事实与他们的理论发生矛盾时，他们宁可抛弃事实。”心灵学协会曾正式建议研究人员要征求魔术师的意见。

心灵学家们是会保持高度警惕的。兰迪把他的骗局叫作“ α 计划”，他透露说， β 计划已经开始了，“我要把计划按字母编成号，一个一个地干下去。”

苏联以同样理由批评了他们自己的科学家。《铁幕后的特异功能》一书说，苏联政府支持大规模的、秘密的特异功能研究。但该书出版后，苏联官方报纸进行了反击。

一名苏联评论员说：“心灵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揭露的历史，这当中往往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参加。象信仰宗教一样，对心灵学的信念比相信事实更有力。”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美国，心灵学确实不应该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众所周知，在一些重要的科学领域，象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等，都曾有过骗局、轻信和无知。伽利略就曾编造过假数据以掩盖根据他的理论所观察和预测到的天体运动的差异。

然而，科学家故意制造骗局相对来说可能是极少的，国家科学院主席 菲利普·汉德勒曾于1981年在国会的一个关于科学骗局的委员会上维护研究界的声誉。汉德勒坚持说，报界往往把问题夸大了，即使是科学上出现了骗局，它“也是在有效的、民主的和自我改正的气氛中”出现的。

即使是顽固的怀疑论者成了牺牲品，也很难把自我妄想的能力过分夸大。

心理学家雷·海曼曾建议，把盖勒从斯坦福研究所派到苏联去。他曾一度相信他自己能看手相。最初，部分是由于他的业余魔术技巧，看手相纯属一种娱乐。但前来看手相的人说，他表现了神秘的洞察力。最后，海曼相信顾客一定是对的。几百个人都成功地证明了他的特异功能不可能全部错了，这可能吗？

是的，他们可能全错了。海曼发现当他力图准确地向顾客讲解他在手相上看到了什么时，他的能力就是非凡的表演力而不是特异功能。不管他说了什么，顾客们总是深信不疑，他们坚持说，海曼有神秘的洞察力。

海曼自己认为，科学上的所谓“不正常”假设，包括心灵学，之所以得不到公正的发表意见的机会，是因为科学界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些说法。海曼在给美国科学促进会1980年年度会议的一份文件中，要求科学界考虑如何对待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建议：

一个能干而又受人尊敬的同事告诉你，他在家旦举行一次降神会。其间，在座的一位问巫师，是否可以使一颗向日葵显形。话音刚落，一颗6英尺高的向日葵落在了桌子上。你的同事展示了证人的书简，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高尚的人。他坚持说，在降神会以前对房间和巫师都进行了仔细检查，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上当受骗。他认为巫师多少接触了一种新的力，他称之为“特异功能

力”。

实际上，早在1869年，艾尔弗雷德·拉塞尔·沃利斯的同事们就经历过这种事。沃利斯与达尔文一起创立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他亲自参加了一次降神会，看到了足足有6英尺高的向日葵。沃利斯坚持说，他可以证明，无论魔术师的技艺有多高明，也不可能利用试验条件制造这样一个骗局。

在那之前，沃利斯的同事们一直认为，他信奉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哲学。他们对沃利斯的说法感到震惊，怀有敌意，做了种种曲解，并感到困惑不解。达尔文本人拒绝讨论沃利斯向唯灵论的转变。心理学家威廉·B·卡彭特仍然坚持今天一些怀疑论者信奉的说法，既然心灵学是不可能有的，那么任何所谓成功的试验不是有意欺骗便是自己欺骗自己。他说：

除了忠于已证明的自然法则外，我不支持任何其它“理论”。我的论点是，只要那里有人借助人类来明显地偏离这些法则，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样做不

是骗人就是无意识的自己欺骗自己，或者兼而有之。除非每一次值得信赖的试验证明这两种情况确实不存在，而这些试验应由具有远见卓识的持怀疑态度的专家进行设计才行。

卡彭特认为，特异功能的说法是一种“欺骗流行病”。象他那样勇于负责的科学家有责任消灭它。他说：

我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那些可能受到感染的人，摆脱这一新型“欺骗流行病”，并为那些想与之划清界限的人提供一些证据，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机。

当代的怀疑论者也提出了这种看法，据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创始人保罗·库尔茨说，异常现象获得广泛相信是“非理性流行病”的表现。库尔茨指出，吉姆·琼斯的自杀式人民圣殿就是相信异常现象导致法西斯的例证。

当然，沃利斯和卡彭特并不是在争论科学问

题。他们的分歧超出了信仰体系，超出了构成“自然法则”的东西。卡彭特的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信仰体系排斥了唯灵论。沃利斯的信仰体系则不然。同样，库尔茨和兰迪两人可能都不承认心灵学是个原则问题，尽管他们声称是坦率的。

信仰体系上的重大差别为心灵学研究埋下了相互指责、搞欺骗的种子。无论是对心灵学的攻击还是辩护，通常并不都是在力图证明说话人的基本信仰体系。

象海曼在论述沃利斯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应当讨论的东西是那些真实的说法。这就需要给心灵学家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其次的问题就是条件，即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必须做实际观察或拒绝与条件相抵触的提议。

有些重要科学领域就曾因为科学界拒绝观察而后来被证实为真实的现象，耽误了很多重要的发现。例如：来自天空的陨石，杰斐逊总统拒绝调查；塞麦尔维斯发现产褥热产生传染理论等。

体内平衡（由生物体内适当的化学平衡而产生的心理平衡状态）的发现者W·B·坎农曾报告说，他发现有人由于魔术的迷惑而行凶杀人。在生物学家发现由于恐惧使体内产生的化学物质

而导致实验老鼠丧生以前，科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这一报告。

心灵学家们需要满足的一个条件就是在他们设计试验时，要有训练有素的魔术师参加，或者至少应当象心灵学协会所建议的那样，听取他们的意见。除非心灵学界同意这样做，否则他们的很多证据将不会得到认真考虑。

反过来，持怀疑态度的人应当在讨论会上和杂志上认真听取心灵学家的意见。心灵学家们对科学界的反对意见，从科学目的直到所用方法，都要做出合理的答复。兰迪说，他将很高兴进行合作，“但在适当的监视下，肯定心灵学家将没有任何成功可言。”

当然，对科学界来讲，不受批评的影响，坚持某些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这样做也是必要的。由于经费来源有限，美国不可能花钱去调查大地是不是平的，尽管地平协会的成员对科学界的一致看法提出了挑战。创世主义（认为世上万物大约是在6千到1万年以前突然被创造出来的理论）也被否定了，尽管这一假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有36个州的立法机关收到了要求同时教授创世主义和进化论的法案，联合抵制的威

胁使出版商从很多课本中删掉了对进化论的引用。

在美国，和创世主义比较起来，可能有更多的人不愿意把研究资金投入到促狭鬼研究和转世术研究中去。创世主义至少伪装得象科学，说“科学的创世主义”要比说“科学的促狭鬼”、“科学的转世术”容易得多。困难的根源在于心灵学家们不愿意从超自然的形象中摆脱出来。

遥视试验计划——斯 卡奈特计划

对 特异功能进行试验应该是可能的。

不成功，便成仁——特异功能者要么能渗透到世界上防卫最森严的机密场所，要么不能。中央情报局同警察机构一样，需要的是值得信赖的结果，情报可靠、有价值。实际上，对它们说来，理论是无足轻重的：你怎么去做，也无关大局。关键是结果。

1973年5月，哈罗德·普瑟夫和拉塞尔·塔格就是用这样的

一次试验，向持怀疑态度的人发起挑战。一方是特异功能者，一方是中央情报局，特殊感应机能（ESP）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所掌握的最复杂的密码对抗，遥视与侦察卫星摄影及在铁幕后面活动的美国最优秀的间谍对抗。也就是说，所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联合起来也欺骗不了他们。

这次试验被称之为“斯卡奈特（Scanate）计划”，这是一次不可能有结果、不可思议的试验。

最后，普瑟夫、塔格和特异功能者获胜。

当哈罗德·普瑟夫放弃激光物理学而从事心灵学研究时，朋友们曾问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象你那样的人，就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吗？”普瑟夫在科学上的经历表明，并没有看出他对超自然现象有什么癖好。然而，在普瑟夫的黑发和富有朝气的面孔后面，潜伏着一种有心计而又泰然自若的气质。

哈罗德·普瑟夫生于1936年6月20日，曾获得佛罗里达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校中，他被誉为是“工程学的尖子学生”。后来，他又获得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海军服役，具体工作与国家安全局有关。

地点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

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分支，专门负责侦听和破译外国的通信及密码。这一机构的机密程度绝不亚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几乎从未发生过把它的未经认可的情报传到出版界，相反，中央情报局却经常大肆宣扬它的机密。国家安全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计算机设备，技术人员试图用这种设备来破译复杂的苏联密码。普瑟夫曾作为一名工程师参加了“闪光计划”的工作，这是一项把纤维光学及激光等深奥的技术应用于高速计算机上的绝密研究计划。安全局为了表彰他在这项研究中所做的杰出贡献，为此颁发了“荣誉证书”。

普瑟夫离开国家安全局以后，由于发明了可调谐红外激光器，奠定了他在物理学界的地位。1969年，他发表了《量子电子学基础》一书（有英、法、俄文等多种版本），现在该书被视为这一领域的标准教科书。为此，他榜列《美国科学名人录》和《西方名人录》等书。

相比之下，作为普瑟夫在斯卡奈特试验中的助手拉塞尔·塔格，在这方面就没有这样光辉的业绩。但是，他的有关气体激光器的论作，也有

着很好的声誉。塔格身材高大，金发生辉，性情急躁。他同他的内弟、前世界象棋冠军博比·费希尔一样，对新闻界没有什么好感。

斯坦福研究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在那里普瑟夫和塔格指导着斯卡奈特的试验。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原隶属于斯坦福大学。后来由于广大师生反对这个研究所过多地参与了军事研究，该研究所就于1970年从大学里独立出来。这个研究所的经费有75%来自于政府，其中的40%来自于五角大楼。

只要委托人是严肃的，研究课题不影响研究所昔日的声望，更重要的是费用合理，斯坦福研究所差不多都可以接受。在斯坦福研究所，第一流的科学家收费并不低廉，但他们更珍惜他们已经获得的声望。这个研究所设计过有趣的计算识读支票数字机，并将它转让给了迪斯尼大世界的奥兰多。研究所也参加了与理查德·尼克松有关的水门事件磁带上18分钟空白带的分析工作。斯坦福研究所在履行同军方签订的合同的同时，它的化学家研究出了象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致幻剂）之类的对神经起显著作用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可以作为化学战剂。这个研究所的生物

学家对海豹和海狮进行训练，希望能为海军找到水下通信的新手段。

普瑟夫在他的最初的实验中得到过私人的资助——斯坦福研究所的所有研究人员都是自筹资金——圣·安东尼奥的烤鸡大亨比尔·丘奇的资助，他的非限制科学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从太阳能计划到与外星人接触，什么都有。普瑟夫与研究所签订了一项特异功能研究的合同，并雇佣塔格为专职助手。

早在1972年，普瑟夫就建议斯坦福研究所研究特异功能现象，那时该研究所正在为他申请一项激光的专利。普瑟夫的这项建议书的副本传到了克利夫·巴克斯特手里，后者是一位测谎器的操作员。他声称，他能够测出植物的情绪。巴克斯特又把这份建议书给了他的一个助手英戈·斯旺看了。斯旺是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画家，他写信给普瑟夫表示愿意参加他的试验。

斯旺高高的身材，显得有点发胖，雪茄烟从不离手。现在他安静地居住在格林威治村，时常作作画，他不喜欢同那些声名狼籍的特异功能者组织发生联系。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一些不公开的试验研究活动。

1973年，当普瑟夫和塔格开始特异功能研究时，斯旺就是靠作为一名特异功能者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据普瑟夫说，斯旺建议的第一次试验竟然使那些专业人员“惊愕不已”。普瑟夫要求斯旺能够变更来自斯坦福研究所的磁强计的信号。这是一台用于测量磁力的敏感装置，从理论上说，它采取的屏蔽措施能排除任何影响它正常工作的可能性。这台装置被安置在一个8吨重的铁制拱室内，再用混凝土将其固定在地下室里；为了防止发生漏磁现象，在外面又包上一组铜线圈，其次又分别使用铝容器、铜容器罩在上面；最后，还加上了一组过冷线圈。从外表看，这一装置简直坚不可摧，根本不可能试验什么特异功能。

斯旺的“振扰状态促使它完全变成为意识状态”，试验获得成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在经5分钟的意念集中以后，这台装置上的油墨描绘线呈波浪形了。大吃一惊的观察者们要求斯旺完全停止油墨描绘，5秒钟后，油墨描绘迅速停止。

相比之下，斯旺的第二次试验比较一般，但普瑟夫却称之为“高级技术的技巧”。斯旺猜测的并不是某位实验人员是否去选择一张红卡片或一张绿卡片，这是一种标准的菜单卡，用于测试特

殊感应机能 (ESP); 相反, 他猜的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是否有一台氦氖激光器或一台氩激光器。

闪耀的激光器不能使斯旺长久保持兴奋, 他感到厌烦了。这种有无激光器的普通试验, 简直是对他的能力的极端轻蔑。

他建议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些令人兴奋的试验呢?”

据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协会的研究人员介绍, 斯旺曾参加了该协会在纽约举行的一次遥视试验, 那次试验取得了 “具有重要意义” 的结果。的确, 这次试验令人振奋。斯旺声称, 他能够把他的心灵传送到世界的任何角落, 甚至能传送到其它星球上去, 并描述那里的情况。斯旺所需要的一切, 只是诸如经纬度之类的坐标而已——“让我们就使用地理座标做一次试验吧!”

斯卡奈特 (Scanate) 一词即由此而来, 即 “按坐标进行扫描 (scan by coordinate)”。

据普瑟夫和塔格介绍, 一位政府官员 “听说我们正在进行特殊感应机能 (ESP) 的试验”, 并且是碰巧顺便访问斯坦福研究所。这位政府的访问者来自某个机构, 普瑟夫和塔格神秘地称他为 “东海岸的挑战者”。他没有留下名字, 我

们就叫他为一号访问者“V 1”。

他要求“看看有关特异功能试验的情况。”

人们完全有理由猜测，这次来访绝非如科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偶然。这位东海岸的挑战者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是被指派来监督特异功能研究的情报官员。

普瑟夫和塔格不愿谈论有关情报机构的情况；有时他们甚至装聋作哑，说与中央情报局毫无联系。

作为采访的条件，我不能透露一号访问者的名字。据说，科学家们不仅知道他的后台是谁，而且还渴望他的来访。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斯坦福研究所本身，都不愿意将此事公布于众，而普瑟夫和塔格更不希望政府对他们的工作过于感兴趣，特别是当这项研究还处于保密、有争议的阶段的时候。调查记者或偶然的读者如不具有特异功能的能力，是根本猜不出这位东海岸挑战者的身份的。

1973年，中央情报局曾指定了6名代理人，宣传心灵学实验室的某些新技术可应用于军事和情报部门。这时，尤里·盖勒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特殊注意，这些代理人十分谨慎地观看了他的表

演。他们认为，如果尤里·盖勒的特异功能能够折弯器皿并粉碎手表，那么他也一定能够对计算机施加影响，然而，今天许多情报业务都依赖于计算机。

与此相反，无论是普瑟夫或是塔格，还是斯坦福研究所的管理部门，都不知道政府对特异功能现象或尤里·盖勒这样感兴趣。象特异功能研究这样新的冒险事业，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许可，否则的话，这种事情一旦被泄露出来，可能会影响到斯坦福研究所昔日的声望。普瑟夫和塔格的研究得到政府的许可。但是人们怀疑，他们是否有希望继续得到烤鸡大亨比尔丘奇的资助。

目前，斯坦福研究所已经批准了这项研究计划，并得到了比尔·丘奇的非限制科学研究基金会初步的资助。为了进行更广泛的试验，塔格作了一次全国旅行以争取政府部门的资助。由于盖勒的推测能力已经引起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因此，普瑟夫和塔格又将其带到斯坦福研究所做进一步的试验。

人们可能要问：“塔格最希望得到哪些机构的资助呢？”普瑟夫、塔格以及斯坦福研究所的管理部门对此拒绝作任何特殊的说明。塔格说：“任

何机构的资助都欢迎。”

实际上，大多数资助单位是军事部门。斯坦福研究所最后得到海军和中央情报局的资助，美国航宇局和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局严格审查了该研究所的建议。最后，航宇局只资助了一个小型项目；然而，由于某些原因，高级研究计划局经过讨论决定取消对这项研究的资助。

事实证明，那位要求“看看有关特异功能试验情况”的一号访问者，对特异功能并非完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若干年前，他就是靠着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幸运；甚至也可以认为就是靠着一种精神上的直觉，保护了一位外国间谍，使其免遭不测。

那还是在50年代中期，一号访问者当时是中央情报局驻西德的一名有掩护身份的情报官员。他的任务是招募间谍，并与之保持秘密联络。最初，他在苏联和东欧集团的一些军事专家中进行活动，他们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才同意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

其中有一位间谍是驻西德的匈牙利将军，他购买了一辆默西迪丝牌小汽车，在此之前，他暴露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秘密警察正在边境上

等候他。一号访问者受命要将真相告诉这位将军。

美国驻西德的情报机构只知道，这位将军当天早些时候驾驶了他那辆新轿车去了西德的斯特拉斯堡城。并推测他到达边境以前，要在那里停留一夜。因此，一号访问者的任务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却相当棘手。因为他不能公开行动，他只能在不惊动任何西德官员的情况下寻找这位将军。凌晨 2 点，他来到斯特拉斯堡城。

在凌晨 2 点，到这座拥有一百万多人口的城市里，不通告当地任何官员，如何能找到一位没有登记真名实姓的一个人呢？一号访问者不会比你、我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当一号访问者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驶近这座城市时，他一眼便看到了一块默西迪丝牌汽车的广告牌高高地悬挂在一栋大楼上。没有别的办法，他便朝着这个广告牌的地方驶去。在广场上，他发现这是一座灰暗的办公楼。他感到有些失望了，他穿过街道朝他的停车地点走去。他突然停住脚步，他注意到一条小巷子里停放着一辆默西迪丝牌汽车，而且是崭新的。就在这辆车旁边，他看到了一个小客栈的大门。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那辆默西迪丝牌小

汽车就一定是这位将军的；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位将军一定就住在这个小客栈里；如果仅仅是靠运气，就更没有理由认为，这位将军非要在这个城市逗留一晚不可。将军的房间在小客栈的最顶层，他径直走到那间房间，敲了房门，开门的正是这位将军。

一号访问者将一切告诉了这位将军，并请他去美国政治避难。就这样，将军得救了。他感到非常惊奇，问道：“你是怎样找到我的。”当然，一号访问者并非不感到惊奇，但却泰然自若地回答说，对他进行着非常精心的保护，而这是将军所无法想象的。

在经历了这件怪事之后的20年后的今天，一号访问者仍然乐意保留这种灵学般的运气。但他对普瑟夫和塔格的试验仍抱怀疑态度。

正象普瑟夫和塔格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项新的研究计划中，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特殊感应机能的表演结果多么真实，观察者通常只认为是那天交了好运……一句话，唯一能使他们相信特异功能存在的方法就是叫他亲自体验一下。”

一号访问者同意在一次遥视试验中充当一名

遥视者。塔格和这位遥视者呆在一间舒适的休息室里，普瑟夫则去到由中间人随意选择的某一目标地点。在指定的时间内，一号访问者在盒式磁带录音机上，录下他对目标的印象。他描述了这一目标地点是：在下陷的地面上，架着一条带有扶手的木制人行小路。显然，这个描述与目标情况相符。确实，在伯吉斯公园里的一条小河上，架着一座人行小桥。

尽管这次表演令人难忘，但并未使一号访问者信服。他认为，大概是塔格给他提供了某些他没意识到的暗示。他要求自己单独同录音机在一起，坐在角落里，用手将眼睛和耳朵捂住。

尽管他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他在第二次试验中做得更出色。他准确地描述到，在一个小剧院旁边，有一座三角铁架，上面有一个屏蔽式电视发射塔。

信服吗？不，一号访问者仍有疑问。普瑟夫听完磁带后，又选择了一个相应的目标。在第三次试验中，一号访问者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闭上眼睛，遮住耳朵，并且他和试验场地上的人员同时录音并画草图。然后，在他们彼此没有谈论任何事情之前，相互交换录音磁带和草图。

这回一号访问者不得不承认：“噢！我的上帝！这一切是真的呀！”他的录音和画的草图明显与这个目标一样，即离斯坦福研究所4英里远的儿童玩耍的旋转木马场。

一号访问者之所以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可能是想证明他做的一切没有任何欺骗。普瑟夫和塔格非常公正地说，这次官方对一号访问者的试验，所采取的措施是斯卡奈特计划中最严格的，

“是历史上监视最严密的一次科学实验。”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专家们将要在世界各地选择一些有潜在意义的目标，包括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秘密基地。总部的另外一些专家将要在那些目标中随机选择一些用于试验的目标。他们起初对这些目标也一无所知。然后，国家安全局找出这些目标的坐标，并用密码传送给一号访问者以及在斯坦福研究所监视斯卡奈特试验的其它人员。中央情报局总部以外的人，包括一号访问者，对所选择的目标一概不知。

这样，纵使普瑟夫和塔格的特异功能者事先知道这些目标，也无法作弊。中央情报局选择在苏联和中国境内的目标地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决定，试验结束后，将安排间谍卫星对这

些目标监视两三个月。在卫星像片送来以前，在美国是不会有人知道那些地点的情况的。然而，对有些地方，间谍卫星也无能为力——诸如苏联军事基地建筑物内部的情况，任何间谍卫星也是无法拍摄到像片的。这样的地方，只好由美国间谍进行“实地核查”。后来，一号访问者建议将有关苏联和美国潜艇的像片出示给特异功能者看；并且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确地指出这些潜艇在那里。这种像片对于同一级别的三、四十艘战舰来说可能都是一样的，而且苏联人还可能随时改变舰艇侧面上的编号。因此，即使英戈·斯旺及其他参加试验的特异功能者预先掌握了苏联海军舰艇上的编号、名称、预定的航线；另外，从少数几张像片上还能看清舰体上的编号，那对他们说来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美国海军情报专家负责监督这一部分试验。

斯卡奈特计划始于1973年5月，试验曾延续了两年。

普瑟夫和塔格确认了一号访问者作为这些试验的身份，下一步他们打算选择更多的特异功能受试者参加这项试验。

这时，有许多志愿者热切希望能参加这项试

验，他们中有斯坦福研究所的年轻社会学家及未来学家（预测未来社会进化的型式）杜安·埃尔金，业余摄影师赫拉·哈密德，斯坦福研究所的两位工作人员马歇尔·皮斯和菲利斯·科尔，以及《约拿单·利文斯顿的海鸥》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巴赫等人。他们在1974年加入试验。同斯旺不一样，这些人以前在特异功能方面没有惊人的历史。

自从听说他们正在从事特殊感应机能(ESP)研究后，每个月都有许多人纷纷给普瑟夫和塔格打电话，声称自己具有特异功能的能力，就好象此事与中央情报局无关一样。普瑟夫和塔格尽量向毛遂自荐者解释，尽管人人都可能具有这种潜在的遥视能力，但斯坦福研究所不可对每个人都进行测验。

该试验小组挑选了一名毛遂自荐的人。那是1973年6月1日，一位名叫帕特·普赖斯的商人，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警察局的前任警官。他给普瑟夫打电话声称，他任警官时，就曾利用他的特异功能的技能“跟踪可疑的人。”

普瑟夫很受鼓舞，立即将中央情报局选定的最后一组目标的经纬度坐标交给了这位普赖斯，

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州境内、在华盛顿特区西南大约135英里的一个地区。3天后，普瑟夫收到了普赖斯寄来的有5页信笺的回信。普瑟夫说：“开头，他描述了从1500英尺高度看这个地区的情况；结尾，他叙述了关于建筑物内部的情况。他对建筑物里面设备、桌子主人的姓名做了全面描述；且他还特别指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许多文件夹上的标记。”

普赖斯说：他“就象将头插进”了文件柜里并且“感觉”到了这些标记：

Cue Ball
Four Ball
Eight Ball
Fourteen Ball
Rackup
Side Pocket

普赖斯说，这些赌注式台球的专用术语，就好象“地下仓库”似的迷宫建筑一样，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并指出建筑物里的通信设备及计算机设备由陆军通信部队的人员在操作。

普瑟夫将这封信交给了“东海岸的挑战者”，他看过信后，自信地说，对于一个肯定无疑的机密军事设施，做了如此详细的描述，这绝不可能是对的。

3个星期以后，他接到中央情报局的通知，证实普赖斯所描述的完全正确。

除普赖斯外，斯旺也曾完全准确地描述过人们先前不知道的苏联设施，并将这个设施里的建筑物和铁路画成草图，还注明说在里面的人员当中有一位“不同寻常的高个子女工”。3个月后，美国间谍卫星证实了斯旺的报告。

有一次曾将南纬49°20′、东经70°40′的坐标交给斯旺，并要求他在不看地图的情况下立刻说出这一地区的情况。斯旺回答说：

我的最初反应，那里是一个岛屿，
岛上有一座陡峭的高山被云笼罩着，地面多岩石……气候寒冷。岛上有一些建筑物，设计得井然有序。其中有一座是桔黄色的。还有两座白色的巨形圆罐……。

斯旺所描述的就是南极洲的克尔盖伦岛，苏联与法国在此岛上共同建立了气象研究站，连附属的小屋都说对了。

斯旺并不是对所有特定的目标的反应都如此详细，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中充满灵气。他精确地感应到北纬 45° 、西经 150° 的区域为“海洋”；南纬 2° 、东经 34° 的区域是非洲著名的维多利亚湖东岸，并感受到“湖水的流速在加快，土地在塌陷，湖的西端在升高。”尽管如此，斯旺有几次的反应都是模棱两可的，诸如“广阔的水域，北部是原始松林”等等。实际上这一地区是加拿大的赫德森海湾。在这个系列的10次试验中，有一次斯旺错了。给他提供的是鄂霍茨克海的坐标，可他却犹豫地回答说：“此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木，有零星的雪盖，好象一片沼泽？”

有些志愿者在看过没有任何标记的目标舰艇像片后，曾准确地预测出了苏联和美国的潜艇活动，他们还洞察到在中央情报局总部里举行的会议；并声称，铁幕后面也举行了与此类似的会议。

中央情报局请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情报顾问约瑟夫·A·鲍尔对斯卡奈特试验做出独立

的评价。鲍尔评论说：斯卡奈特试验“清晰、明确地解开了特殊感应机能（ESP）之谜，事实已经证明，经过慎重的考虑，是可以应用于实际事务的。”

鲍尔又提醒情报机构的官员们注意，遥视的“实际应用”，即特异功能间谍永远取代不了传统的情报技术。他说：

无论特异功能者所具备的能力有多么神奇，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利用超自然现象来获取情报，由于它往往是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因此决不是最好的方法，应该谨慎为妙。特殊感应机能得到的情报只应该作为正常情报的补充，或作为正常情报搜集的先导，绝不应该在情报工作占主导地位。

一年后，另一份咨询报告与鲍尔持相同观点，报告说：“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开始系统地研究这一领域，并给予支持是值得的。”中央情报局付给加利福尼亚州托伦斯的艾里希奇工业公司10万美元，作为这项调研计划的经费，并配备了一

个多学科的调研小组。这个小组由一名心理学家、一名物理学家、一名通信专家和一名测试仪器工程师组成。这项调研计划也包括苏联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活动。作者甚至仿效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惯用手段，他们喜欢用一些深奥、冗长的技术名词来代替诸如特殊感应机能（ESP）和特异功能之类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专有名词。无论是报告的题目，还是正文都使用了“新的生物信息传输机理”这一技术名词，相反根本没有使用特殊感应机能或特异功能等词。目的是为了 avoid 触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吝啬的美国官僚主义者的情感。有趣的是，调查人员在报告中说，苏联对遥视没有多大兴趣。

1976年，心灵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直接而积极的支持。研究人员是通过埃德加·米切尔接近布什的。米切尔与布什是多年的密友。以前米切尔同鲁瑟夫及塔格在斯坦福研究所共过事。为了加快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在旧金山成立了米切尔新科学协会。布什准许米切尔在中央情报局召集高级专家来讨论心灵学在情报部门中的使用问题。

除了这一支持外，心灵学研究并没有得到中

央情报局的认可。从此，高级官员对特异功能研究再不过问，一些分散的研究计划一直持续到现在。除了极个别的、不寻常的例子外，情报机构对有关心灵学的资料都不进行常规情报估价，这些资料仅仅被看作是咨询报告而已。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一种局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1977年中央情报局局长易人，卡特总统任命亚当·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取代布什。从此，便无人过问此事。

埃德加·米切尔斥责了这种官僚主义的惰性的弊病。他说：“我们连演员（指特异功能者）都得不到，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官僚主义在阻碍着我们。”

另外，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怀疑论者，他们反对给特异功能研究拨款，哪怕一点点也不给。米切尔除了咒骂这些人，还能做什么呢？“有人至今还不相信我登上了月球呢！可总有那样一些人相信这套鬼话。”

反对心灵学的实际应用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可靠性。同事们问一号访问者：“你真的要在这件事上冒风险吗？”甚至，连斯卡奈特试验中的主要执行者英戈·斯旺和帕特·普赖斯，也对他们

自身能力的可靠性提出过疑问。斯旺说：“在这项研究中要想有所突破，就应该排除遥视过程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他进一些解释，在他的灵感反应中，常常出现一些不精确的信号。他说：

在我根据自我意识试图观看远距离目标所累计的反应表明，经常我确实能够看见这些目标。然而，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目标又好象成了一名幕后的提词员，尽提供一些看上去似乎真实而实质则与之毫不相干的数据……看来我们有理由假设，我们涉及了某种形式的自动分析功能。如果真是如此，这些就是使信息模糊或产生错误信息的原因所在。

普赖斯这位老练的特异功能者，非常幽默地谈及他的局限性，他向秘书们问道：“如果我能窥视到宇宙的各个角落，为什么我还想与你们同室共浴呢？”

普瑟夫、塔格及一号访问者以斯卡奈特试验

报告为依据，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进行游说，希望得到除中央情报局以外的各部门的资助，以便作深入研究。

海军与他们签订了一项50703美元的合同，以确定特异功能是否能够探测到遥远的电磁源。如果特异功能者能感应到另一个房间内闪耀的灯光，那么，大概他们也能探测到来自水下潜水艇的微弱电磁波。

斯坦福研究所于1978年公布了有关这项合同的最后报告，声称斯旺、普赖斯、尤里·盖勒及其他特异功能者都探测到这种电磁波。然而，海军并未过分炫耀他们的成功。海军发言人在回答1982年国会议员对该项合同提出的质问时，拒绝承认是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而是称之为“某些特定的人在意识的非认知情况下，探测遥远电磁信号的明显能力的研究。”

塔格称这个研究合同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第一次具有了生理学上的脑电图与特异功能的行为之间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人们公开评论了这次实验认为，研究人员对“适可而止”的行为应负有责任，即他们在这项研究领先时，不该放弃研究活动。海军单独所作的估价虽没有

明确地指出这次试验的科学价值，但他们证实了，研究人员在试验中没有使用任何欺骗手段。

普瑟夫看过这些评论后反驳说：“这种‘适可而止’的批评不应该冲着这次实验，因为我们没有‘在领先时放弃研究’；最后一组试验完全偏离了方向，使得对实验结果很难以判明……公正地说，这并非‘适可而止’。”

1976年，海军曾同斯坦福研究所签订了另一项耗资2万6千美元的合同，查明特异功能者是否能够对磁强计施加影响。这个磁强计就是斯坦福研究所的采取了严格屏蔽措施的研究用磁强计。普瑟夫首先用这种磁强计测试了英戈·斯旺的能力。海军经常使用这种灵敏的仪器来探测海底物质的磁性。

乔尔·劳森博士说：“海军对任何能够影响这种仪器的事物都颇感兴趣。”当时，他是海军电子系统司令部的头头，该司令部曾主持了3项研究计划。在劳森离任以前，他是少数几位主张广泛讨论特异功能战的海军官员之一。他承认：“我完全确信，特殊感应机能是与潜艇作斗争的唯一途径。磁强计试验证实了这一说法。”

这个位于圣迭戈的海军电子研究机构同斯坦福福研究所也签订了一项合同，研究极低频电磁辐射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苏联研究人员在理论上认为，这些辐射就是传播特殊感应机能的媒介，并曾试图制造“远距离生理监测仪”，以用于测定在一定距离上人的生命活力的信号及心境。

海军之所以对极低频辐射感兴趣，那是因为它计划在威斯康辛州埋设一条数百英里长的地下电缆。这项计划现名叫“水手”计划（前称“血红”计划），它引起了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人们惧怕极低频辐射会损害人们的健康。海军坚持认为，极低频辐射不会危害人类。但从实用主义出发，却根本没有提及它自己的“极低频和心理控制”的研究。

除中央情报局和海军外，斯坦福研究所还曾与少数单位签订过这方面的合同。国家航宇局曾投资3万5千美元用于研制一台“特殊感应机能训练仪”，这台仪器是斯坦福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特异功能研究人员查理斯·塔特设计的。然而，当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普瑟夫和塔格的工作做出现场评价后，曾两次拒绝对此项研究的拨款。美国空军已经拨款用于它自己的独立的心

灵学研究，它对遥视研究毫无兴趣。

塔格指出，基本的事实是，在以往的10年中，政府一直支持斯坦福研究所的特异功能研究并将继续下去。塔格说：“很少有什么计划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普瑟夫和我之所以能得到支持，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产生了令人信服的结果。”

在试验中，我们的情报机构采取了最严格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欺骗行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普瑟夫和塔格的试验仍有人说它是骗人的把戏。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与其说是想在斯卡奈特试验报告中找毛病，倒不如说他们是企图劝阻那些潜在的支持者，不再对斯坦福研究所的这项研究投资。

与资金紧缺的那些日子相比，在1975年，情报机构还是积极投资于特异功能研究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上也承认，“自1975年以来，公众对特异功能现象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这时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是进行这类研究的好机会。为了满足国会的要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乔治·劳伦斯博士受命组织一次特异功能表演，以便议员们对苏联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做出评价。在国会议员中，除了象查理·罗斯少

数几位议员对这项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外，其余的人都是为了迎合选民的意愿。情报机构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阻止不了公众的强烈的呼声。由于所谓的欺骗证据不足，普瑟夫和塔格仍继续领导着那些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在1975年，传说普瑟夫和塔格参与了某个阴谋……这太不公平了。当然，那些谣传与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资格或进行实验的设计毫无关系。

据说这个阴谋与宗教——一种邪教有关。尽管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参与这一宗教的活动，但这项试验计划的主要成员普瑟夫、塔格、斯旺和普赖斯在过去曾经听过有关这一宗教的教旨讲道，这一宗教就是科学论教派。

科学论教派是由科幻小说家L·罗恩·哈巴德创立的。他在黄皮书《推智学：精神保健现代科学》的小册子里，介绍了一种保持精神和肉体健康的心理疗法。该书出版于50年代初期。科学论教派声称当今它拥有300多万教徒。

197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揭露了科学论教派的一起涉及面很广的阴谋。他们企图渗透、刺探以及干扰政府机构对他们活动的调查，并企图损

害某位自由撰稿人的名誉，由于他调查了他们的行踪。所以联邦调查局查抄了他们的老窝，发现了“嬉皮士和本队行动”的文件。

1975年，科学论教派刺探了联邦政府中的秘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那时，普瑟夫和塔格正在为特异功能研究筹集额外资金而四处奔波，可是谣传在这一教派的背后，至少有四名潜在的支持者。

普瑟夫说，他与这一教派的联系是十多年以前的偶然机会，况且塔格根本不是科学论教派的教徒。塔格愤怒地谴责了有关这一教派能够对他的研究施加影响的任何谣传。

科学记者约翰·威廉在1977年8月7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第一次暗示了科学论教派的间谍活动与斯卡奈特试验成功之间可能有联系。可在一年以前，他出版了《关于超人的调查》一书，威廉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出这个事实，他们能够确定那些有争议的特异功能研究计划，这些计划是过去几年中斯坦福研究所实施的。我的意图既非证明、也不是否定引起广泛争论的说法，而是对这类说法的明确含义来个刨根问底。”

威廉在普赖斯和斯旺的遥视试验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他向读者问道：“在人类进化阶梯的顶峰，智人可能还未发现这种感应的方式，难道试验如此荒谬吗？”不，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除了欺骗的行为外，我确信这种遥远视力是存在的。”

能防止欺骗的行为吗？威廉信任这些研究人员，他说：“普瑟夫和塔格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尽管有许多科学论教派教徒参加了斯坦福研究所的这项研究，然而我没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企图预谋毁掉或袒护他们的研究成果。”

威廉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发表之前，他开始有些怀虑。但在发表时，他耸人听闻地提出了斯坦福研究所的试验中的诡计。

在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想过，欺骗的证据已经足够了，无需花更多的时间调查这些事件。我本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写成《金钱万能：科学家注视着五角大楼的资金》，这是仿效普瑟夫和塔格的《精神万能：科学家注视着特异功能的技能》一书而得名。我过去这样想，现在仍这样认为，遥视这玩意儿，象斯旺和普赖斯描绘的那样精确，那他们简直就是神人了。或许是我错

了，然而有位读过斯坦福研究所报告的著名物理学家曾说过：“即使这是真的，我也不会相信这类事情。”就个人来说，我永远也不会接受遥视这一事实，无论有关它的证据多么充分。

持这种观点的人决不止我一个。正象威廉在《华盛顿邮报》上关于斯卡奈特试验的文章中曾暗示的那样，别人也在公开谈论着有关斯坦福研究所与航宇局之间的一项关于特殊感应机能训练仪的合同。我也相信这些传闻。然而，幸运的是，普瑟夫劝说我对此进行调查。我真的调查了，并且发现这些传闻并非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普瑟夫和塔格或受试者中的任何人在这项合同上作弊；相反，却证明有些反对普瑟夫和塔格的传闻是故意杜撰的，其目的就是要毁掉特异功能研究。尽管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航宇局官员认为这些试验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他们保证这是一次诚实的试验，没发现任何欺骗的行为。

对我来说，尽管还没有发现任何欺骗的证据，可我仍不能接受遥视这一事实。纵然有这样的证据，也不能说明，象科学论教派这样的宗教团体之所以要渗透到国家安全部门中去，就是为了使

斯卡奈特计划协议书无效，这简直就象在人类进化阶梯的顶峰还未发现这种感应方式那样，荒谬无比。

除去幻想，所剩的就是事实……而除了事实，一切又似幻想。

普瑟夫和塔格很不愿意直接了当地介绍遥视的军事应用问题。他们在《精神万能》一书中，不但回避了象“东海岸挑战者”或“政府访问者”之类受试者的问题，而且充满着矛盾。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

这个问题源出于人们对侦察与反侦察的幻想的流行病，毫无疑问，也是由于那些喜欢危言耸听的报刊的报道以及苏联人对远距离的心灵感应非常感兴趣。正象某家报刊报道的那样：“敌人能猜出总统的思想吗？”在近四分之一世纪里，科幻小说一直对神奇的万能者或敌对力量的脆弱性大加渲染。而在科幻小说中，许多难题都是通过特殊感应机能（ESP）而不是通过科学来解决的。这些小说易于理解，因为大多数

是虚构的、退化的，自然界中不存在的。

在那本主要论证特异功能间谍对中央情报局的有效性的书里，序言就用了这样抨击式的语言。而紧接着由理查德·贝奇写的前言里，关于这类神奇的万能者或敌对力量的脆弱性是这样说的：

当我开始认识到普瑟夫和塔格研究的含义时，我就为他们的生命担忧——这些都是公认的科学家，他们创立了一种没有秘密可言的原则。但现在要烧毁这些文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开了。

人们不应该从矛盾中得出结论，认为普瑟夫和塔格故意装糊涂。我对他们的经历了如指掌，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喜欢争论的雄性基质。因此，他们不会回避对那些似乎没有变更余地的矛盾作出陈述。通常，这种明显的对立是由于过分强调变化所造成的，为了证明这些事实，在某种场合

是正确的，而它在另一场合却有稍许差异，但仍是合理的。就象他们正在准备一篇律师的辩护词，他们不希望别人说三道四，更不希望别人妄加评论。

政府对斯卡奈特试验所作的有数的几次公开声明，也充满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发言人只简单地否认政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曾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感兴趣。可偶而他们又说：“政府所感兴趣的只限于了解苏联人在这一领域里在做些什么”。只有海军的劳森那样一个官员，将心灵学称为“极其重要的领域”。面对着这些合同书，海军竭力掩盖，谎称这是标准的操作手段。对此，这些年来我已习以为常。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是与新闻出版界合作的。

在同海军的交往中，约翰·威廉同我一样，也没有交上好运。他搞到了一份绝密的斯卡奈特试验报告，还包括这个绝密设施的坐标。据说，帕特·普赖斯曾读过有关它的文件。他驱车前往现场，“抱着一点点希望，来寻找一个外星侦察队的营地，至少也希望能发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指挥中心。”然而，他看到的一切，却令其大失所望——

在光秃秃的山坡上，有几个放牧的羊群和一些羊粪堆。与帕特·普赖斯所报道的正好相反，这里没有“地下仓库”，没有“计算机、通信设备”，甚至连“陆军通信部队”的人影都没有见到。唯一的密码文字就是这一地区的名字，布尔山。在这里，似乎应该将斯坦福研究所的“斯卡奈特计划”改成“布尔牧场计划”更确切些。

当我将这次远足的结果，告诉给负责斯坦福研究所试验的海军计划管理人詹姆斯·福特时，他大吃一惊地说：“斯卡奈特试验的报告中肯定有错误，可我们竟什么都没有发现……我悔之无及。”

几天以后，福特改变了上述说法。他和同事们进行了全面核对，结果他完全改变了观点，并说：“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正象调查人员所关心的那样，这是一次有根有据的试验。”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安全局或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会识读地图”，因而把坐标搞混了；（2）特异功能受

试者观察的目标被误认为在休格格罗夫空间通信中心附近，这一目标与所描述的目标大体相同，但它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是旅游者必经之地，因此并无秘密可言。这里是海军的地盘，并非陆军所有。（3）受试者读出了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的思想，而不是坐标。他对福特说：“可能有些夸张，但这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而绝非蓄意欺骗（《华盛顿邮报》1977．8．7．PBL）。

很显然，威廉要想从上述这种矛盾的证词中，是绝不可能得到什么正确的结论的，因为证据是假的、混乱的，而保存的记录又是零散的、草率的。

普瑟夫对这位作者说，他不知道文件上的标记“Four Ball”、“Rackup”等等是什么意思，然而，这些标记确实是绝密的密码文字。一号访问者和其他两位提供消息者也确认这些标记是密码。因此，普赖斯必然是转向了某些秘密的基地，他所描述的观测目标正好与国家安全局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总部相符。另外，

受试者要对准在数百公里外的坐标上，尽管他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然而，那里根本不是神秘的通信中心。由于记录的误差，这些成功的事例不可能全部写下来。这些试验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却证明了遥视的真实性。

据里根的前任白宫助理巴巴拉·霍尼格透露，国家安全局正在它的工作——破译密码上试验遥视的能力。为了破译苏联的非常复杂的密码，国家安全局用大量计算机进行上万亿次的并组，甚至也经常破译不出。如果特异功能能够将计算机的工作量哪怕是减少10%，即将万亿次变成千亿次，尽管数字仍然很大，但对高速计算机来说还是可以完成的。

目前，塔格已经离开了斯坦福研究所，独立地从事心灵学和用魔杖进行探矿的研究。据说，普瑟夫和斯旺仍在继续为海军和中央情报局研究“实用的遥视方法”。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对遥视的存在仍持怀疑态度。1977年在某次记者早餐会上，在谈论起中央情报局和帕特·普赖斯的试验时，特纳说，唯独中央情报局“有极个别人，能够画出某些国家街道的非常粗劣的风光草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去

过那些国家。有时这些草图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特纳认为，中央情报局非常担心苏联人在心灵学领域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5年，中央情报局终止了与帕特·普赖斯的试验。特纳毫无表情地说：“帕特死了，从此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了。”

未来陆军的雏形——特殊 综合地面大队

心 灵学家们都毫无例外地希望通过成功的试验，来换取科学界的承认。到目前为止，这条路收效甚微。即使有所成效，象斯卡奈特计划那样，也引起了激烈争论。

马塞罗·特鲁兹说：“心灵学要想挤身于科学之林，道路有三条。一条是通过严肃的、可重复的实验验证之路，但现在还无人通过这条路达到成功。

第二条道路是借助于某种传统科学，如物理学或心理学，来

寻找一种革命性的新理论，这种理论能证明特异功能现象的确实存在。例如，心灵学的预知试验——受试者能够准确的描述出某一预选的特定目标的情况——这是与现代物理学理论相抵触的。然而，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种新的预知理论可能会产生，甚至也可以说，我们需要这种理论，尽管现在世界上还没这样一种理论。

特鲁兹说：“通向科学之林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很流行的特异功能的实际应用。”心灵学家目前就是希望通过特异功能的实际应用，来获取科学界的事实上的承认，即将心灵学的实验从实验室转移到工业和政府部门中去，用事实证明特异功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加利福尼亚人认为，用于招待头面人物或举行关于“致幻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与创造力”讨论会的小城镇，现在成了把“实用的特异功能”的新闻传递给工业、警察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媒介。支持者宣称，实用的特异功能能够解决一些难题，尽管现在还无人能解开其中的奥秘。

1979年，陆军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情况是这样的，驻扎在欧洲的美国陆军负责操作和管理7千多件核武器的士兵，在当年举行的一次基本军

事技能的考核中，竟有90％的人不及格。数字之大，令人吃惊。可是还有比这更可怕的，这些年来，这支由志愿兵组成的陆军的素质在不断的下降。1979年的军队简直不能称其为军队，士兵们没有文化、训练极差、无知。据军队内部的秘密评价说，这样一支部队，“无论是我们的盟国，或是我们的敌对国家，都是十分看不上眼的。”

两年后，军队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由于兵源不足，10个基本战斗师中有7个无法进入“战斗状态”。

据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们讲，现代美国军队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士兵有无素质，而是军队作用的问题。日益增加的军队未来主义者提出，解决军队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建立神奇小分队——特殊综合地面大队（First Earth Battalion）。

设想到1991年某一天，猛烈的炮战将破坏以色列与黎巴嫩3年联合政府之间的休战状态。苏美舰队在离岸边50英里的海面上进行对抗演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投票赞成，在敌对双方之间派遣一支3千人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但中

央情报局则预计，战争将爆发在和平部队到达之前。总统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武僧们部署到那里去。

来自新墨西哥州桑蒂菲的特殊综合地面大队训练基地的第一批20名武僧，穿过成群的记者，登上了正在待命起飞的运输机。这支小分队由10名平民、10名军人组成，其中男、女各半。最小的只有14岁，最老的将要在飞机上渡不过他75岁的生日；然而，他们现在都处于一种新的环境之中。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空降兵，拥有超级智能，并能在生死关头做出恰当的决策。

在24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使他们的大脑处于δ波状态，以保存能量。有少数几个人正在检验他们的特殊感应机能（ESP）的通信信道；有的正在欣赏着由标准的GI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出的摇滚乐曲。

这些武僧们携带着现代化技术制成的最好装备：轻型激光突击冲锋枪、致幻剂迫击炮、安排他明药片（一种解除疲劳的药）、夜明食品、针灸工具以及探测地雷和地道的魔杖。他们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支部队

是不堪一击的。最强大的是仁爱的力量。

他们人人都要发誓忠于“优秀突击队员的游击队员之神”的信条:

现在我有能力和责任将我本人的一切技能奉献给我的团体和我们的星球。

我个人的责任是拿出灵活机动的计谋，这是我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我愿意选择和创造适于搞计谋的省时、省力的机器，因为我知道它们的许多通信信道没有限制，很适用于我（如收音机、电视机和口头表达）。

我愿意建立一支独立的、优秀的突击队。为了人类和全球的利益，为了我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将采取并执行机动突击行动。

我愿意将这个概念告诉给那些有能

力进一步组织突击队的人。

我愿意等待时机，到那时，我的突击队能够自然地与那些具有较高意识和操作能力的人——自然卫士联合起来。

这些信条和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概念都是美国陆军中校吉姆·钱纳的智力产物。1979年，钱纳受命调查关于德尔塔特遣大队的人类的潜在活动，陆军的这一调查小组里，包括坦克部队的军官、未来主义者和心理学家，他们试图研究若干新技术的潜在能力来解决陆军兵源不足的问题。钱纳走访了130多个加利福尼亚的团体，范围从读过乌拉尔图语的书的人直到空手道手和艾哈德再生训练者。

钱纳说：“由于人类的潜在活动，加利福尼亚人在意识里要比其它州先进10年。陆军需要的正是这一意识。1990年，如果我们还提不出一个有远见的政策，那时，我们就要受到国人的耻笑。”

钱纳的方法是建立特殊综合地面大队，这就是90年代的陆军雏型。钱纳说：“地面和大队完

美的结合，即自然与行动哲学的结合。”

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章程始创于德尔塔特遣大队的第二次季度会议。在利文沃思堡的陆军大学军官俱乐部里，与会人员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方桌的中央有一根蜡烛和一元纸币。钱纳做了一次针灸技术的表演，象征着他们与地面的结合，并许诺这有助于他们实现建立一支新时代陆军的目标。一位陆军上校表演了一套空手道。同时与会人员叨念着一条咒语，这个咒语好象是从较高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一个词或声音——在这样的意识状态下，“地面”（earth）的第一个字母“e”发长元音。开始时，爆发出一阵吃吃的笑声。

钱纳解释了一元纸币上面的巨大海豹图案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要信赖上帝所说的一切：上帝象征着光明、真理、博爱、进步。E·普乐伯斯·乌鲁姆说：这不是普通的一元纸币，它标志着“各民族的统一。”

钱纳说：“通灵的武僧们从历史上流通最广泛的印刷材料——一元纸币上认识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金字塔上有通灵眼睛，正在指导着时代的秩序……美国人的作用就是要把世界引导

到天堂。”

德尔塔特遣大队的心理学家巴巴拉·马克思·哈伯德提出，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应该用“特异功能的仁爱而不是用仇恨和怀疑去进攻苏联人。”德尔塔特遣大队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产生了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概念。

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概念引起了陆军中一些高级将领的好奇心。无论这一概念是否代表“官方”的意见，都应该公开解释这个问题。但钱纳本人则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不相信这个问题有如此重要。”钱纳的一位朋友约翰·亚历山大中校将官方对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态度称为“一个灰色的区域——问题在于谁将接受这种思想。”

陆军就官方对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态度的公众事务声明中，解释得比较含糊：“我们对此事没有很多了解。”据德尔塔特遣大队的副队长汤姆·克莱说：“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设想太荒谬了。两种意见无法统一。”

钱纳与其他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桑蒂菲联合创建了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基地，该基地完全归私人所有，不营利。“然而大多数基地工作人员

还是给议员们写了信，”希望得到政府的资助。若干名志愿人员与81名创始人成为“新世界学院”的全体学生和教师。他们还计划建立一个“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指挥中心”和“新世界城”。

官方认为，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在某些方面不仅仅是一种设想。无论是西点军校还是指挥与参谋学院，在它们的人类关系课程中都把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列为教学计划，西点军校把它录制在一盘20分钟的录像带上。钱纳宣称，大约有800多名军官通过军队指挥系统得到他们的材料。陆军已经将钱纳借给政府的其它机构，包括洛杉矶和西雅图的警察局，钱纳自称他是“出租的亚瑟王（传说中的预言家、魔术师）”，任务是要向这些单位解释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概念。钱纳已经得到官方的许可，可以身着军服在电视和全国无线电广播中发表讲话。在1980年以前，钱纳曾被派往西雅图附近的刘易斯堡，在那里，从事“高技术试验床”的研究，这种装置准备用于测试新设备和一些设想。其中也包括德尔塔特遣大队提出的一些设想。目前，他被任命为陆军大学的参谋。

为了对付恐怖主义和军队的兵员不足问题，钱纳认为，5年之内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将参加军事行动。考虑有些积极支持者的作用，这一愿望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陆军副参谋长、四星上将罗伯特·肖梅克称钱纳是“陆军未来主义者的带头人”，并认为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和武僧是未来陆军的雏型。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德尔塔特遣大队是一个官方机构。它的成员能通过陆军计算机网“德尔塔网”进行联络，后者是美国陆军部队计算机会议与电子邮政通信网的官方机构。它拥有1千多名成员，他们自称为“部落”。

当然，“部落”无权指挥任何人，在陆军部队里也是如此。

对于钱纳本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见无法统一。同事们一直在责难他“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加利福尼亚了”。钱纳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西点军校；钱纳也曾得到过一次进西点军校的机会，但英语考试不及格。后来他曾在肯塔基大学主修过“艺术和预备役军官训练课”。德国之游结束后，他又回到了美国，并结婚、成家。然后，他参加了越南战争。他越南战

场5个月以后，他是营里唯一幸存的排长，他说：“当我在同一天里，三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时，我才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我很幸运，我活过来了。”

在越南期间，他学的美术课有了用武之地。他为那些所谓的阉猪员和木材搬运工们设计绘制地图的坐标方格纸，因为这些人常常渗入到敌后，精确指明敌人的火力点。

钱纳在越南服役期满后，又回到了美国，继续攻读肯塔基大学的毕业课程。在学校里，他那些有关战争题材而又没有恐怖场面的油画，获得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格林·康莫德奖”。今天，他的油画还悬挂在5所博物馆里。从他的作品里，人们就会看到有关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软战术原则”。

钱纳研究过电视新闻学和系统分析学。他坚信，新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方式。他坚定地说：“我们之所以在越南战争中一败涂地，那是因为我们用灵巧的炸弹取代了灵巧的士兵。靠火力在战争中是无法取胜的。”

按“软战术原则”的说法，火力在力量等级中是属于最薄弱的一环。比火力更强人的是意志

和力量的精神。然而，所有力量中最强大的则是仁爱：

钱纳说：“意志的确是持久的力量，北越人就是靠这样的意志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的战争概念是持久战。”

“精神是整个国家感情如何的公开标志，”钱纳还认为，电视对于传播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萨摩亚群岛的士兵枪击电视新闻记者时，结果，这一天很多国家竟无动于衷。历史上的那一时刻，不会有人为之翻案。”

伊朗革命的初期证明了另一种精神——一百多万伊朗人在街上载歌载舞，并且电视网报道了这一场面。钱纳认为，美国应该用最高级的力量——仁爱——来对付一切敌人。

“我们应该向伊朗人证明，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他们的思想也是正确的；那么，让我们张开双臂接受他们的思想，同时，也要求他们接受我们的思想。”钱纳说，尽管彼此可以接受对方的思想，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没有达到这种意识的水平。

钱纳理想中的武僧要成为精通各种力量的行家里手。在寺院里，从传授瑜伽修行法开始了全

天的计划。“使人清醒”的第一声尖叫将取代传统的军队起床号。武僧的早餐是比利时华夫饼（含蛋白质的面食能耐几小时的消耗）、人参茶（有利于情绪稳定）和安非他明药片（有利于增强活力）。

一旦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钱纳就要为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安排和平时期的工作。武僧们清理飞碟着陆场，并准备与外星人进行联络。引加拿大运河的水来灌溉美国西部的沙漠，并且这个大队将收割东南部的葛藤（一种日本藤，可用于编床、提取酒精、沤沼气），为军队储备充足的能源。

训练项目包括脑力作业、体力作业、精神作业、生物作业和特异功能作业。这五项作业象征着一个人将他的头部、双臂和双腿向外伸展成五角星状。

脑力作业是指提高队员在解决生命攸关问题时的意识。体力作业包括增强体力、苦修瑜伽功和格斗术。精神作业是指人们掌握不断增长的学识。生物作业就是利用大地资源。特异功能作业即发展和使用心灵学。

在钱纳曾经工作过的“高技术试验床”所在

地，陆军正在准备试验“新时代”体力作业中的一种。这就是钱纳介绍的概念：达拉斯牧童体力训练系统。在这个训练系统中，除了要创造非常严酷的环境以外，还要使足球运动员在剥夺感觉的游泳池里飘浮着，以锻炼他们的集中力。游泳池的水温与人体温度相同，在里面既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也看不见外面的光线。运动员应该只考虑足球，但是如果在里面呆得太久，就会产生幻觉。士兵们要考虑的是战斗，而不是足球。

格斗中，武僧应尽可能俘虏或争取敌人，而不是致敌于死地。钱纳更倾向于向武僧们传授合气道（日本的一种自卫角斗术），因为合气道强调转换与之抗衡的敌对者的力量。而空手道等格斗术则强调击毙对手。“格斗术训练的目标是要达到精神上的升华。身体的外表应给人一种既朴实、又不可怕的形象，这样就可以公开地同人们打交道了。但是一旦需要自卫，你马上可以反击。”合气道还可以促进敌我间的爱。“拿枪的人是不会对别人施以仁爱的，而合气道道师却可施以仁爱。”

特异功能作业依赖于节食和沉思。“目前，我们认为，队员应该只吃些诸如坚果、鱼子、水

果、蔬菜等食品，以利于排泄通畅并提高特异功能意识。偶然也吃些肉食，以保持人体内抗毒素的正常活动。

特殊综合地面大队将是一支非正式的队伍：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等级之分，集各种才能为一体。大队的成员将来自不同的种族，因为每一种族都具有“独特的才能”。“当然，每一种族都兼备多种才能。”钱纳说：“但我认为，黑种人是这些种族中最精明的；棕种人勇敢；红种人宽厚、仁慈；白种人富于幻想；黄种人镇静。”

除了男人，妇女也可以参加战斗。钱纳说：“任何美国人都无权说，妇女不能为国而战，”除此之外，妇女“更适合于情报预测。文明的环境改善了她们的直觉，所以她们能更好感应出哪里有敌人。”

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战斗信条是依靠安非他明和音乐来“激励部队的士气”，这样做可以让敌人轻而易举地知道与他们作战的是武僧。在“新时代坦克”里，耳机（无需无线电通信，因为武僧们利用特殊感应机能）即可播放出“一种类似由黑人高中生组成的乐队演奏的爵士音乐，并

且声音越来越高。”在外面，扬声器同步播出这些声音时，就如同岩石滚动的轰鸣声，“你简直无法想象，那些乌克兰小伙子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怎样倾听着这些由山谷里滚滚而来的50辆坦克里播出的好似魔鬼聚会的声音。”

其实，这种设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二次大战后的某次局部战争中，美国陆军在坦克正面画上老虎作为迷彩图，恐吓对方。迷彩图上的虎牙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据被俘的反坦克手说：“上面的虎牙看起来象枪炮一样。”

实际上，现代战斗条令非常强调隐蔽性。因为，对于新型精制导武器来说，目标只要被精确跟踪上，就意味着要被击中。钱纳根据陆军的指示，设计了一种新时代的长列式装甲车。车上包括洪达牌摩托车一辆，在车把手上备有激光器，车后的挡泥板上装有迫击炮一门；装甲车上还备有沙滩车一辆，沙滩车的辘杆上装有加特林机枪一挺。

钱纳认为，新时代装甲车有助于提高士气。他说：“士兵们已经掌握了驾驶沙滩车的技术，并且很喜欢这种大轮胎。”

特殊综合地面大队还要保留战争中的某些仪

式。“印第安人打仗前在身上涂抹颜料，插上羽毛，念着咒语，跳着舞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印第安勇士们的士气。”钱纳说，“陆军需要闪闪发光的制服和战斗中的呐喊。”

怎样终止这种不断升高的意识并恢复到实际士兵的样子呢？这支部队能在过河时飘浮起来吗？他们能用针灸术医治辐射病吗？

在新兵训练中心能否以原始的尖叫声作为每天起床号，至少不是由某位军官来发出这种尖叫声，对此我多少有些怀疑它的现实性。然而，一些权威人士则严肃地考虑过钱纳的建议。这些权威人士中有两位四星上将肖梅克和格伦·K·奥蒂斯，他们是德尔塔计算网的成员。另外，还有六位重要的上将，他们是萨姆·韦策尔，戴尔·维瑟，鲍勃·穆尔，杰克·梅里特，詹姆斯·艾利斯和鲍勃·埃尔顿；三位准将艾伦·奥马，哈登·奥尔森和里克·布朗；负责机会均等训练与安全保障的国防部长助理沙伦·洛德博士以及达拉斯牧童教练员鲍勃·沃德等人。

尽管每年在陆军大学召开的德尔塔特遣大队会议通常是“有权人操纵”（——军事俚语，即规定的官方操纵），然而，德尔塔特遣大队的成

员和通过德尔塔计算机网的互通信件都是非官方的。塔尔德特遣大队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训练指挥人员方面。肖梅克上将就任负责人事的付参谋长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一次德尔塔特遣大队会议，以“制定一项训练领导人的组织计划”并呈送参谋长。由这次会议通过的报告，号召陆军挑选一批“最优秀的士兵，即遇事沉着、头脑敏捷、临危不惧”。它的一项主要计划是2千年空地一体战，并强调“研究心灵活动和作用……士兵们反复演示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有关格斗技能的动作。”

看起来，特殊综合地面大队似乎有些古怪，其实，这就是传统的美国概念，它源于传统的自助组织。

美国人信仰自助，而自立的人则信仰正统宗教的实际作用——精神法。最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诺曼·文森特·皮尔写道：“学会正确地、科学地做祈祷。祷告时要谨小慎微。”

正确的思想能产生神话般的威力。皮尔曾断言：“某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将纽约城夷为平地，然而，物理学家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钱纳使皮尔的科学祷告者计算机化了，并暗

示他能将莫斯科变成一切砂砾。他说：“如果你要寻找自由世界优越于世界上无信仰者的明显事例，你会发现有两种资源对我们帮助最大，即上帝和微电子学。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能利用微电子学设计出人的精神……大脑的工作与微电子学的工作是一样的。因而出现了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的领域。”

美国人所信仰的那种自信思维的力量来源于对民主的信仰，这种信仰蕴藏在常人的潜意识中。如果需要，那种信仰事实上常常会抵制特殊的智慧或才华。常人只要能吃苦耐劳，而不是靠才能，就可以由乞丐变成富翁。诺曼·文森特·皮尔说：宗教信仰是“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简单、实用的技术”，并且“强调科学的精神准则，后者是经过人类经验的实验室所证明了的。”

在心灵学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出现了这一相同的论题：常人的力量与智人的危害。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部落元老”中有一位名叫麦克·马隆的上校，在陆军大学召开的1982年德尔塔特遣大队会议上作的正式报告中，又提到了这一论题：

我是部落元老中的一员……我的绰

号是“鲮鱼人”。我由于常常撒网捕鱼而闻名。我要告诉大家，撒网捕鱼的那些人中，大多数所关心是他们捕到鱼没有；但也有一些人更注意撒网，而对捕鱼则次之。捕鱼是我生活中的乐趣。鲮鱼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是一种“低级”的鱼类。它既单纯又诚实。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广，它毫无怨言地做着一切工作。但它也很高尚。在很多方面，它同我喜爱过、并试图训服的另一件高贵的东西很相象，即“兵虫”。

甚至连普瑟夫和塔格也赞成这种信仰的概念，他们一再强调，如果人们信仰信念的力量，他们就应该抛弃人类精神的分析能力，这样的人才具有遥视的能力。

普瑟夫和塔格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任何比较武断的人肯定都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功能，他们能掌握自己去做什么。根据我们的试验，我还没有发现，他们中的任何人会因距离遥远和视觉受阻，而感应不到城市的风光，其中包括建筑物、街道和行人。”

那些拥有信仰力量的人们必须要抵制智慧才能。普瑟夫和塔格说：“避免通过分析来得出结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那些特异功能研究机构外，还存在一些组织在致力于心灵学实际应用的研究。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就是这些组织中比较明显的“极端分子”。从本质上看，特异功能电子学就是指利用电子仪器来放大人体特异功能的能量。

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销售五花八门的特异功能电子仪器。大多数仪器的使用都要根据某种“标本”——一根头发、滴在纸上的一滴血、或一张全身的小像片，才能工作。据一本产品目录介绍，“重要的是，并非任何人都能处理好这样的标本，因为这样的标本是特定某人的化身……各人都拥有各自的一种独特的辐射图形，而这一图形仅存在于各人的体内。”

一种袖珍式身体极化仪只有钢笔式手电筒那样大，售价21美元。它需要一种标本。据说明书上介绍，“这种袖珍式身体极化仪的用途，是校正由于疲劳、虚弱、精力不集中、失眠、伴有疼痛的感觉等等所引起的辐射的极性失调。身上带上这种极化仪，这些症状马上就会消失。”男性应

将极化仪置于身体的左侧，女性则置于右侧。但是，一旦这种极化仪放在水里，它就会失去作用。一台“地面辐射中和器”即可抵制“负的地面辐射”，无需标本，售价50美元。一台“特异功能壁垒器”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特异功能能力的攻击，并且可免受负能和特异功能控制，售价325美元。

尽管这些仪器听起来十分古怪，但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却已经引起美国政府机构的注意。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海军曾购置了一台特异功能电子学的“多谱段图像分析仪”，它是由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的成员、按摩医生查理斯·怀特豪斯博士发明的。美国空军正在考虑在民兵导弹发射井中安装由该公司的另一名成员罗伯特·贝克设计的“特异功能壁垒器”，以保护工作人员免受特异功能能力的攻击。

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的著名人物、托马斯·E·比尔登中校，退役前是五角大楼里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人员。他谴责苏联人在瑞典南部进行的特异功能电子学实验过程中，利用空中的各种光线进行扫描辐射，导致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这是历史上，接触过飞碟波最强

的一次”；并导致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沉没和美国中西部牲畜莫名其妙的致残。

堪萨斯州有一匹无法医治的致残的幼马，据比尔登说，这意味着“在华沙条约集团的军队进行首次突击以前，苏联特异功能电子学的超级武器将首先进行攻击，这样，年轻的士兵们将要被阉割成为无用之物。”最悲惨的命运正在等待着我们，这种可怕的“致伤牲畜数量的不断上升，最后将可能使人类的女性受到这种超自然的伤害。”

苏联人并非蓄意地制造这些暴行。然而无意中，他们却可能使人类全部丧失了意识。比尔登将这种事件称为扎格（ZARG）。扎格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阉割牲畜；他的更大的能力有可能将“星球拉出运行轨道，瓦解地球或太阳系，让地球停止在运行轨道上，甚至还可以改变自然本身的基本规律。”由于扎格是无意识的，我们就称他为“沉睡”的大智人。苏联人可用第四代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激发他，使他苏醒过来，充满活力。比尔登说，他们已经部署了这些武器，

“可以用一发炮弹就能剥夺自由世界的战略能力——美国龙的牙齿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苏联特异

功能电子武器拔掉。”

比尔登在退役前就发表了他的理论。他的报告被收入国防文件中心。我接触过的几位官员们都认为，比尔登的狂热理论不但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反而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了人们对特异功能电子学的怀疑。尽管如此，支持者也大有人在。亚历山大中校就是支持者中的一位，他全盘接受了比尔登的理论。亚历山大中校甚至向1981年在俄亥俄州德顿召开的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的全国性会议递交了一篇论文。陆军把这篇论文的复制件呈送给了国会各办公室，但小心谨慎地加了说明，该论文的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并非官方的立场。著名物理学家、国防部以及普瑟夫与塔格在斯坦福研究所中的临时顾问伊丽莎白·劳舍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尽管批评家们可能会抱怨说，比尔登虽然退休了，但他仍会通过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和劳舍尔了解到五角大楼的情况。国防技术资料中心曾把由比尔登作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一些研究合同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陆军红石兵工厂的萨姆-D计划，即发展新型“爱国者”地对空防空导弹计划，该计划拨款给比尔登进行“光子壁垒调制器”的研

究。比尔登声称,是苏联人的特异功能电子武器引起了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超空间核榴弹炮”可以将炮弹发射到宇宙的各个角落;一种根据极地时间弯曲原理制成的反导系统,能够将苏联的导弹倒退到恐龙时代。陆军医学情报资料中心也曾单独投资于由德国研究人员研究超空间炮弹。有关他们的“超空间炮弹”的报告迄今没有公开,仅限于官方使用。

比尔登的有些研究合同是涉及特异感应机能(E S P)、不明飞行物和量子物理学之间的理论联系的。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计算机科学公司发表的一份技术报告的摘要中,比尔登说:

……这里介绍了精神、物质及其相互作用的一种纯推理的模型、它与物理学实验的基础是不矛盾的,而且所提出的机理适用于各种超自然现象,也包括不明飞行物的现象……由此就解决了心灵的本质问题,这是用作者本人第四逻辑学定律得出的;并且提出了一种生物圈的7维超空间物理学模型。根据这一理论模型,就能发展出包含所有生命形

式的整个物质世界的一种无限维的当代超空间理论模型。无意识的等级——包括所有人种的无意识——自然就作为超精神状态之间的一种复印型式呈现出来……在所有人种处于无意识的情况下，意念致动就完全能够使象征性的思想形式物质化，并可大量地产生出足够强度的刺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冷战对人类是一种主要的强力刺激。作者指出，文学上已经精确地描绘了飞碟波的形状。

比尔登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系统发展公司发表的一篇相似报告中，解释了“一个人类的麻烦问题……及它与不明飞行物现象的关系。”

实际上，比尔登的某些理论在军队的上层已经得到了认可。在绝密的定期文献《1981年火力支援任务的地区分析》中，就透露了正规陆军的作战纲要，并指出，总括为“隐蔽精神”技术的特异功能电子武器可以影响战场上炮手的耐久力和行为：

这个领域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诸如在感应、通信、思维、学习、紧张情绪降低等方面的未被探索或未被开发的人类技术。有关这一领域的讨论就象在一个神秘王国中进行短期旅行那样，这里所显示的一切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应用价值。

在《火力支援任务的地区分析》的文献中，给特异功能电子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心灵与物质之间的一种接合——一种能量形式，对此尽管目前美国所知甚少，但是它已经显示了重要的军事应用的意义和价值，”其中包括特异功能电子的“心理干扰作用”：

在考虑特异功能电子学的问题时，最基本的是，人们不应怀有任何偏见；并承认这个问题中所包括的物理学、数学和技术都是真实的，而不是神秘的和超越自然的东西。特异功能电子学的精细研究，提出了一种“玄学物理学”——一种获得充分发展的关于物理学和

心理学相互结合的超自然现象的理论

.....

那些异常的事件都源于这些心灵活动的规律以及诸如特殊感应机能（ESP）和信息传感的现象，而后者并不是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超越常规，不可思议。

报告认为，“这个领域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军方或政府对研究特异功能电子学在进攻和防御中的潜力明显缺乏热情。同苏联在特异功能电子战领域中所做的研究相比，这个缺点就显得特别的严重。”亚历山大中校在《军事评论》上发表的特异功能战一文被这篇报告收为附录。

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武僧们认为，“某种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陆军应站在新时代的前沿，这是一个特异功能电子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常人和武僧们都将大有用武之地。军队的上层人物应做好接受新的黄教僧、新的兵力、新的能量的准备。

当然，在军队中并非人人都赞成这种理论，

在军队上层人物一次聚会上，就有一位元老说，这些“无精打采的星相士兵们也说不出地狱是什么样子。”

狂言不可信、研究仍要搞

我曾对该书的出版商许诺，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要写几个重要问题。它们包括有关如何辨别骗术和骗子的“基本常识”；对心灵学研究的作用给予最后的评价；请求国会召开关于特异功能战的听证会。

从我作出决定的那个时候起，国会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我对另外两个问题的实施，则没有多大把握。

我愿意和那些想要证明他们立场的心灵学研究人员赌个输

赢。但当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发现我赌赢的希望不大。只要政府持慎重态度，我再不反对政府对这项研究的投资了。如果我输了，他们赢了，那种知识有可能促使一场科学的革命。

就我的辨别骗术的“基本常识”而言，我认识到，我的辨明骗术和骗子的方法并不象我不加思索所说的那样完全决定于我的才智。实际上，用一句话即可说明这种方法——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就以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反之，就是骗术和骗子。

至少，我还没有发现比这更好的方法。调查记者需要有一种明辨是非的本能，或者需要相信自己的才能，或至少需要懂得如何迫使反对者保持沉默。我相信我自己是有才能的，因此，我知道该怎样去压制对手。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晓得，人们乐于相信那些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不相信那些使其令人厌烦的东西。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唯一的吸引力就是金钱。特异功能者讨厌我，我也不相信他们。今天，他们不怎么讨厌我了，而我却似乎被那些怀疑论者弄迷糊了。

到现在为止，我并不是第一个有这样教训的人。当拉迪亚德·基普林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访问美国时，他会见了伟大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当时，马克·吐温刚刚写完一篇有关数学的文章，尽管他不理解这篇文章上的每一个字，但他感觉该文很有趣。马克·吐温说，事实能够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所以，它们使人们感兴趣。马克·吐温向基普林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首先要掌握事实，尔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渲染这些事实。”

现在，特异功能研究领域内就存在着一种倾向，他们还没有得到确凿事实之前，仅凭从那些令人怀疑的试验中挑出好的试验结果以及不可靠的传闻，就恣意加以渲染。心灵学家经常把那些已经完成的试验看得很神秘，并将这些新的试验与大量的事实相比较；但是那些如奇闻逸事式的特异功能奇迹的报告，都是很不严谨且没有什么科学价值。最后的结果，事实被人们忽略了，甚至那些有意义的事实也被那些大量的奇闻逸事式的传闻给淹没了。当然，这种倾向不仅仅存在于特异功能研究领域，但目前这种倾向在这个领域里显得特别严重。

确实，如果没有那些无休止的、令人怀疑的、奇闻逸事式的报告的话，迄今为止经过严密控制的特异功能研究记录，足以证明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我并不认为，心灵学家消除了人们对特异功能现象真正作为一个事物所持的合情合理的怀疑态度；我自己的有些怀疑看起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也认为，有些东西是值得去研究的，尽管到最后，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蹩脚的心理学实验而已。

我的疑问不在于心灵学家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与军事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上，而是在于一些更重要、更严肃的问题上，但在这里我不准备涉及它。

正象上面我所说的那样，我的异议与通常的对军事应用研究抱有偏见的观点不同。我本人也在海军服役了5年。

军队需要迅速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而心灵学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目前对所谓实用特异功能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实验室试验不成功所致。

记录表明，在军事试验中特异功能战计划的

夭折，常常是由于最不负责任的试验并加以报道造成的：如为死去的苏联间谍举行降神会；多谱段图像分析仪通过一张像片即可探明潜艇活动；超空间核榴弹炮和北极的反导时间弯曲等等。这里列举的事例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太富于现实主义了，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人打算申请政府补助金，即使有某个研究机构资金紧缺，那它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申请资金。不过我仍然坚信，如果没有其它什么原因，那就是出于安全保密的原因，促使心灵学家悄悄地从事与军事应用有关的研究。

如果斯卡奈特试验报告不划成绝密级，我们或许能够解决有关这项试验的确实性的一些问题。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来看，这项试验计划听起来是不错的，但是人们能相信吗？我无法证明与之有关的一切：目标是怎样选择的？用什么方法来判断试验结果？采取什么措施将受试者与外界隔离？以及其它上百个的问题，这些问题详细地刊登在一份定期的、公开的研究报告中。

另外，如果将时间弯曲反导系统和同类研究项目的失败情况公诸于众，任凭公众询问的话，那么，这些研究人员以及雇佣他们的那些政府官

员就应考虑（我认为）解雇他们的问题了。

这种可怕的笑柄会促使心灵学研究转入地下，用保密系统掩盖起来。据白宫前任助理巴巴拉·霍尼格说，在中央情报局内，心灵学的真正的词是保密的，并且只能在安全（密码）电话线上用。在中央情报局，任何涉及特异功能的报告都被自动的列为机密或绝密文件。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海军在很长时间内隐藏着他们的研究活动，尽管他们支持了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包括斯卡奈特试验计划在内。甚至连那些消息灵通的国会议员也无法探知这些秘密。1980年5月，国会议员鲍勃·卡斯頓迈耶询问五角大楼是否支持过斯坦福研究所或其它单位进行过特异功能研究。从卡斯頓迈耶写给一名感兴趣的选民的报告中判断，除了有关海军在过去8年里支持过这项研究外，其余的内容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份报告说：

关于斯坦福研究所对心灵学或特异功能现象的研究，我们一无所知。据说，这些研究合同根本没有通过全国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

国家科学院等单位。尽管如此，每个被询问到的人都说，他们的外部合同缺乏详细说明书，无法告知这些研究究竟是什么内容。

据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位官员透露，可能这类研究是保密的，一般不可能公布于众。

就我个人来说，我有幸搞到了一部五角大楼记录的计算机检索表。我是通过国防技术情报中心弄到这个检索表的，国防技术情报中心计算机里储存的记录分三级：普通、秘密、机密。绝密的记录不输入这一系统。检索表使用的关键词有：探矿魔杖、特殊感应机能（ESP）、超空间、测绘魔杖、心灵学、特异功能电子学、意念致动、遥远致动（telekinesis）和信息传感等。

发现大约只有50篇报告是非保密的。然而，未公布的那些报告才正是人们感兴趣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合同没有一份被输入这一系统，非保密的合同只有很少几份。根据新闻自由法已经公布的关于苏联研究的情报报告也没有输入这一系

统。据此完全可以推测，象斯卡奈特试验这样有意义的报告肯定被列为绝密级，当然不会输入这一系统。

我们的立足点应放在哪里？存在一场特异功能冷战吗？斯卡奈特试验中的主要受试者，据推测也是一名重要的武僧，英戈·斯旺在1979年陆军作战学术讨论会上讲到这些问题。他说：

我认为，特异功能战已经迫在眉睫。我想诸位一定注意到了《星球大战》这部电影里所描绘的军队。尽管这部影片中对它没有作透彻的解释，然而，同我交谈过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且同意这样的事实，在将来，完美无缺的高尚博爱主义者的精神力量将被那些寻求利用特异功能才能来增加他们战斗力的人们所包围，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全人类。

斯旺认为，在西方心灵学研究的宣传是“三阶段特异功能战的第一阶段”。宣传内容中部分是假情报，部分是固执己见的言论。“我毫不怀疑

地相信，苏联人在特异功能的研究上要远远领先于美国。”

我认为，斯旺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已经掌握了苏联的研究情况，那么我们就应该懂得，苏联的研究状况与本书介绍的一些计划一样，也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

据斯旺讲，目前特异功能冷战的第二阶段是“利用已经知道的许多外部控制方式来改变男人或女人体内的特异功能的结构……这些技术中最普通的要算是早期的洗脑方法了，那是通过微妙的诱导强加和灌输进行的，当然也伴随有痛苦和残忍的肉体创伤。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精巧的技术，如潜在的劝导式行为诱发变异技术和各种各样隐秘的精神控制技术。”

斯旺大概是故意轻描淡写地谈到了后一类技术。我对这些技术也不想多加探讨，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全是电子学方面的内容，而不是通常理解的“特异功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可用的有关资料极少。最后的原因是保密。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在电子控制人类精神活动上确实存在着某种威胁。这种可能性来源于试图用电磁理论解释信息传感功能的研究。当研

究 人员研究利用思维影响远距离的电磁辐射时，尽管很遗憾，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却发现了远距离电磁辐射可以影响人的精神活动。

据巴巴拉·霍尼格说，人们对特异功能战的“兴趣越来越浓”以及五角大楼每年为特异功能或有关的研究项目投资大约 6 百万美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实验室获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在脑电波频率范围内，一定的外部电磁辐射的振幅与频率的组合即能通过生物体（包括人类）外部的敏感器官，直接刺激大脑内部较高级的神经元结构。这种电子刺激可以在一定距离内使人的精神发生变异，包括在各种感觉通道上产生幻觉，特别是听觉方面。”

据兰利 - 波特的艾伦·盖文斯说，他对有关特异功能的说法一般是很谨慎而且是抱怀疑态度的，事实上可能比这更糟。所谓极低频辐射（E L F），原本是海军提出的一种潜艇通信系统，因为这种上千英里波长的电磁波在水里会畅通无阻。但它也可以中断大脑活动，杀伤 1 万平方英里或更大目标区域内的每一个人。盖文斯说：“在过去几年里，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极低频辐射对生物的影响，因为它的功率很小。后来我们认识

到，正是由于这种功率极低的电磁辐射，人脑可能会把外面的信号误以为是它本身的，从而模仿它（类似于生物电子卷吸的一种过程），并且按着它的变化而变化。”

苏联有可能已经实际试验过这种技术。如向美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射微波可能就是这类试验之一。美国海军仍在调查一次可怕事件发生的原因——在1980~1981年间，一艘大型航空母舰上发生的碰撞事故，可能是尾随美国舰队的苏联间谍船向正在降落的飞机驾驶员发射电磁波引起的，在一架飞机降落于航空母舰的纵摇甲板上以前的最后关键的一瞬间，电气系统哪怕产生一点点偏差，就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结果和推测都并不是肯定的，我们没有必要惊慌失措，美国已经投入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来调查这一事件。无需从事一项特异功能曼哈顿计划。

据英戈·斯旺介绍，特异功能战的第三阶段，就是谍报活动或战争中实际使用特异功能者。就我而言，我倒不致于为它的前景担惊受怕、彻夜不眠。

我更关心的是，由于人们对心灵学的兴趣与

日俱增，将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一般的研究转移到那些根本没有指望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呈现出什么显著前景的研究上去。当我听说有一份500页关于未来研究的国会报告中只有3页谈到心灵学的研究，并且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诸如兰利－波特所作的普通大脑研究时，我倒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但我也愿意听到那些疯子们有关中央情报局用特异功能子弹杀人的传说。乘本书结束之际，我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话，奉献给这帮疯子们。

在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国防部的一位通信问题专家在征求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异功能者的意见，并且用他们的可怕的预言提请罗伯特·肯尼迪注意。他们说，苏联人是不会屈服于封锁行动的，总统应该命令美国空军对苏联的导弹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当罗伯特用嘲笑般的口吻将特异功能者的预言告诉他的哥哥时，总统则说：“不要为此烦恼。”

假使我从来没听到过有关生物电子卷吸的情况，我也会说那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

作者的话

当 我离开私人工厂以后，在杰克·安德森的工作班子中做一名不领薪水的实习生时，原来并没有写一本关于心灵学方面的书的打算。我的“游猎区域”是国务院和中东地区，偶尔写一些有关核武器或五角大楼的经费泛滥成灾的情况方面的文章。在我的游猎区域内，我经常漫步在去大使馆的道路上；有时在地铁内搜寻军方官员们；有时则看看一些专业军事杂志，它们既枯燥，又无销路很广的广告，但我却能

从中发现我所热衷的东西。

心灵学 (Parapsychology)、特异功能 (psychics)、神秘学 (occult) 可以作为畅销的广告, 然而我从未把它们当作什么“严肃”的主题, 并为之做出牺牲。但是, 我还是决定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征途。我并不相信守卫森严的五角大楼地下室里有什么绝密的“特异功能特种部队” (psychic task force) 的谣传。当有些材料谈到特异功能武僧 (warrior monk) 的“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军事概念时, 我曾改变过我的课题。但坦克、导弹、庞大的军费预算毕竟对我更有吸引力, 而特异功能、武僧和其它的高奇幻想则对我没有什么兴趣。

1980年12月有一件事使我改变了想法。那个月的美国陆军专业刊物《军事评论》月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新型精神战场——超越斯波克^①向我射来》的文章, 该文作者是陆军中校约翰 B·亚历山大。文中透露了在掩蔽状态下由人体发出的“辉光” (aura) 的科林像片。就象通常诸如

① 斯波克 (Spock) 系美国儿科专家, 曾以《婴幼儿保健常识》(1946) 一书而闻名, 书中极力要求父母对婴幼儿要有理解和灵活性。60年代后期致力于反战运动。——译注。

《潘兴Ⅱ导弹部署到欧洲——给人们的某些暗示》以及《战争准备——行政后勤系统计划》等文章一样，一些人对亚历山大的下述讲法感到吃惊，他说：

有些武器系统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能力，它们的致命杀伤力已经得到证明。

这种医治疾病或造成疾病的能力可以超越空间距离进行传播，并且造成的疾病或死亡都没有明显的症状。这种能力在诸如苍蝇和青蛙之类的较低级生物体上已经得到证实，至于目前是否能达到致人死命的能力，还存在争议。

信息传感^①的催眠术的应用也具有巨大的军事应用潜力。它可以使敌人的间谍完全忘掉他们的行动计划。

很显然，特异功能武器确已存在，但是人们对于它们的能力还有怀疑。

① 信息传感（telepathy）——人体特异功能的一种。系指一种超感官知觉，即思想不凭借正常感觉渠道从另一个人传给距若干距离处另一个人。有人称“传心术”、“思维通信”等。——译注。

我把亚历山大的这篇文章给戴尔·范·阿塔看了。他是安德森的合伙人之一，并且经常采访情报机构。过去，他也听说过有关特异功能特种部队的传说。以前有一份值得信赖的中央情报局的资料，曾介绍过这类情况。他还读过退役军人托马斯·E·比尔登中校写的另一篇文章。

比尔登的文章题为《苏联的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亚历山大阅读此文时简直象一个讲经传道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虔诚。他坚信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就是苏联制造的“光子势垒调制器”（*photonic barrier modulator*）造成的；另一种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超空间放大器”（*hyperspace amplifier*），在1963年击沉了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它是利用在这艘核潜艇的像片上集中心灵感应能量的方法进行的。

当时我根本没有准备把根据传闻和杂志上的两篇文章上作出的这类荒诞无稽的说法提供给杰克·安德森。可是，我看的越多，我得到的证据就越多，这些证据均证明美国和苏联都曾在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即建立在人体特异功能能力基础上的武器方面作过严肃认真的较量。在军队

中，确实存在着关于武僧的特殊综合地面大队的说法，并且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是吉姆·克阿纳中校，他鼓励新兵“加入这个部队并且学习掌握特殊感应机能^①”。美国海军曾租用“看手相者”跟踪苏联潜艇。国家安全局已经使用特异功能来破译计算机产生的密码。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则提出报告警告说，一旦苏联在特异功能研究上有所突破，将会产生出一种“谍报原子弹”（atom bomb of espionage）。据我所知，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很多著名的实验室，以及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大学，如斯坦福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都参与了特异功能研究。

当我最后把我的关于特异功能战的第一篇文章草稿送给杰克时，他最初的反应和我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哀叹地说：“你是指‘武僧’吗？”

我希望有关特异功能战的专访文章不要在我经常去的地方——中东地区引起不愉快的争论。任何一篇有关世界上那个混乱地区的文章都会招

① 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在心理学上称“超感知觉”，即指知识或影响能直接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或物体而无需感觉的媒介。实际上是人体特异功能的泛称，有人叫它为“人体超级能力”、“人体潜在功能”等。——译注。

来各个小集团的恐吓，人们都知道，任何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在那个地区都可能引起混乱、偏见，甚至更坏，对此我早有认识。

自从在杰克·安德森专栏发表第一篇有关特异功能战的文章以后，读者来了很多信。尽管这篇专栏文章是以《巫术战》和《五角大楼地下室里的魔力队》为蓝本，然而，还有那么几个人反对在特异功能电子学武器上投资6百万美元的报道。一位胆战心惊的浸礼会牧师这样写道：“如果苏联正在从事这项研究，那么我们也应跟上。”这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者们则指责安德森先生和我本人都是苏联人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的、不知不觉的受害者。他们说，我们是在信息传感术的指令下的行动，目的在于损害美国研究机构的声誉。《命运》杂志提出，我们的分析认为：“当苏联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要求美国人停止特异功能电子学研究的动机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特异功能研究的批评者，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是抱讥讽态度的。《发现》杂志宣称：“丝毫没有合法的证据来证明心灵学的存在，”并且极力主张，“宁愿为国防投资几百万美元，也不要

为这种胡言乱语花一分钱。”魔术师与特异功能的揭穿人詹姆斯·兰德（被人们称作为“神奇人”）公然提出，相信超自然能力就是鼓励法西斯主义，甚至把在圭亚那琼斯敦丛林中“人民圣殿”的大规模集体自杀的责任推到特异功能身上。他说：“正是这种丧失理性的观念使这些受害者失去了理智，损失了钱财，损害了健康，甚至葬送了生命。”

双方各执一词，均不乏凭证。在这种混乱争吵的情况下，对哪怕是最简单的一篇报道要弄清其事实真相，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亚历山大中校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例。他认为，利用显微镜检测以色列特异功能者尤旦·盖勒折弯的叉和匙，已经显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以自然力折断金属制品实验所产生的那种断裂的样子，并且亚历山大写那篇文章也参考了1975年出版的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泰勒的著作《超心理现象》（**superminds**）。泰勒本人就引证了由肯特郡大学物理学家魏尔波·福兰克林利用电子显微镜所做的检测。

在亚历山大的文章发表以前，泰勒和福兰克林早已宣布放弃他们原来的看法，泰勒在刚刚出

版的一部著作《科学与超自然现象》里强烈谴责说，所有超越自然现象的证据都是谎言；而1979年福兰克林在他去世之前也承认，他的显微镜观测研究是错误的。

我认为，福兰克林纯属自然死亡。可是，那些关于特异功能战的造谣惑众者们却非要我们相信他是死于以下几个原因之一不可：

1. 怀疑论者们一直认为，他死于自杀。由于他曾对巫师蛇油的供应商提供了支助和安抚而深感内疚。

2. 特异功能研究者们则一直认为，他死于苏联人的特异功能的袭击，目的在于阻止美国人在心灵学上的进一步发展。

3. 有些人却认为，他死于美国人的特异功能的袭击，而这些美国人是受设在阿富汗苏菲教派①寺院内西藏纳粹分子总部的秘密组织领导的。（这种说法无法得到核实，尽管在阿富汗苏菲教派寺院确实存在一个阿根廷纳粹分子的秘

① 苏菲教派，伊斯兰泛神论神秘主义者。——译注。

密组织。)

在此期间，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的J. B. 海斯特德博士接过了这个特异功能折弯机的火炬。海斯特德的实验“再次证实了”富兰克林的最初发现。

对一个记者来说，要想了解谁、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什么相信，都是很困难的。准确无误的文件记载看来是不存在的。在政府里、甚至在一些特殊部门里，已开始为特异功能研究投资了，并且尝试秘密搜寻巫师的工作。例如，海军已经对一些最感兴趣的研究投资了。华盛顿海军电子系统司令部的前任司令乔尔·S·劳森承认说，我认为，“特殊感应机能(ESP)是20年内与潜艇作斗争的发展途径，”并且政府的代表已同斯坦福研究所签订了两项进行有关的可行性实验的合同。但目前，劳森未接受采访，根据官方发言人的说法，海军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也不会进行特异功能的潜艇跟踪试验。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与世隔绝的组织看来都象海军那样庞大而坚如磐石，象卡菲卡(Kafka)公牛那样神秘地控制地华盛顿。人们通过邻近的

一些组织、地方教育委员会或特纳瓦德 (Tona-wanda) 市政府，认识到政治的复杂性。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倾向，由于这些复杂问题与己无关而不愿多加考虑；并且把这种复杂性归结于那些组织的动机，而后者更确切地说是隶属于某个宗派或者甚至是某个组织内部的个别人。当问题涉及到心灵学的时候，那种倾向可能会滋长偏执狂者的恐惧和强迫感。我收过许多据称是受害于中央情报局“特异功能子弹”的人的来信，由此可证明这一点。

由于存在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使得这种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一些属于美国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 (U.S. Psychotronics Association) 的著名特异功能研究者，对于发展象“电子放射屏” (radionic shield) 之类的特异功能装置感兴趣，据说这种“电子放射屏”可以用来保护受力体免受特异功能的袭击。最初，我根本没有重视电子放射屏的受力体这个问题。这种电子放射屏的受力体（当使用者将一根头发或一滴血放入受力体内，就能使他得到能量）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象对待疯子或异想天

开的人一样，而根本不屑一顾。实际上，一些特异功能电子学联合公司的成员已经同五角大楼签订了合同，甚至早在1977年，五角大楼就购买了一台电子放射式“多谱段图像分析仪”，试图来跟踪苏联的潜艇。其中有几位公司成员都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们主张不要公布于众。

我用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有争议的报告，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以及特异功能研究者的猜测，但我仍不能确切地说，我的结论就真正提出了背后是谁、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怎么样制造这些传闻和论断的。然而，我能保证，本书所写的内容都是有关这些神奇计划的最真实的描写和最准确的记录。

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要想使人们相信是谁、是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或为什么等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所面临的读者往往不同于日报新闻的一般读者或晚间新闻的收看者，后者看到的是现实的东西。公众是看不到围绕某个新闻所产生的很多争论的。你看到的和读到的常常是记者们所具有的一般常识，当然，这种常识与专家们的严谨推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实上，作为记者，我的第一信条就是任何一件事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应都是新闻。)当然,对于一般常识性的东西也有例外,如象杰克·安德森这样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但任何人都可以宣传他自己的观点。象威廉·F·巴克利和威廉·萨菲尔这样的权威常常在半庄半谐的包装纸上发表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这样的宣传无需过分严肃认真。

记者们常常隐藏在所谓“客观性”的后面,而这些客观事物确是存在的;但心灵学就大不一样,心灵学不存在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合理的证据。采访得到的事情真相无论怎样不带感情色彩,但仍然要按着主观决定把它放在这个故事的首页或末尾30页上。

调查记者往往按照他们主观意志决定采访什么以及怎么采访。但绝没有一名记者会在下列问题上花费同等的时间和精力,如天然气价格、我们赖以生存的外国石油、核废物的危害、石油公司的利益、海岸区的污染等等;但在能源危机问题上,则全都必须“客观地”报道。我采访什么决定于我的兴趣所在,因此,我的记述反应了我对我所感兴趣事情的见解。

完全的客观报道是不可能有的,当然,这句话不应该作为全盘摒弃事实的藉口。一名记者可

以记下他的真实的观点。如果记者和他的读者双方都认识到了报道人的见解，那么，记者就会写得更真实些。以下是我的见解：

目前，尽管我发现特异功能研究还远未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但我现在认为，特异功能现象可能会变成现实。如果特异功能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在科学界将会引起一场革命，因此，我支持现政府对此项研究的投资。

我尽量避免按科学上的是非曲直来判断这些特殊的研究计划。我没有能力来评价科学。有些研究计划已经很明显是骗人的，但也只有当一特定的未经证实的理论出现明显的假证时，我才能对它们进行评论。

我也尽量要避免陷进那些有阴谋的理论里。作为一名调查记者，经验告诉我，有很多人在协力促成此事，而搞阴谋的是极少数。

我竭尽全力将这些证据公布于众，并要这些研究者们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非常乐于谈论此事。有时候要对一个证据作出判断是很难的。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使我了解到，要掌握一个人的意念的证据是多么地困难。

由于我本人的结论难免有错，因此，我列出

了我的采访中的一些特点，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并提出修改的意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接收了那些修改意见。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帮助，在此不便一一列举。当然，最主要的是杰克·安德森教授和杰克专栏编辑乔·斯皮尔，还有杰克的合伙人戴尔·范·阿塔，他教我懂得很多有关调查报道的知识。这里，我也应该感谢玛塞罗·特鲁兹、斯坦利·迪安博士、“阿波罗14号”宇航员埃德加D·米切尔、（“神奇人”）詹姆斯·兰德、兰迪·菲茨杰拉德、约翰·威廉、艾拉·格文斯、杰克·萨菲特、安尼塔和菲利波·泰里兹，还有爱德华特·帕内克和很有影响的休·梅罗。

罗纳德姆·麦克罗尹

译者的话

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研究，历来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国内外都是如此。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应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伪科学”、“神秘主义”。钱学森同志说：“我相信，气功和我国传统医学以及人体特异功能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一旦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就一定会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就是真正的科学，同时在结合的过程中它还会改造现代的科学，使现代的科学再提高一

步，这也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做好了，必然导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光明日报》1986年5月12日。）目前，国内系统介绍国外有关这类研究的书不多，而涉及它的军事应用的书尤为罕见。美国圣马丁公司1984年出版了《特异功能与战争》（原名《心灵战》）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把特异功能用于军事方面的研究情况，特别有意义的是，还详细介绍了支持与反对的双方争论的情况，并作了一定分析。这对我们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从本书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花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在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同时也越来越注意了它的军事应用潜力的研究。从目前看来，在情报获取上有可能首先得到一定应用。这对我们倒不无启发作用。当然，书中也介绍了美国有些特异功能研究人员的奇思妄想，还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需要我们阅读时加以批判。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涉及很多专有名词和概念，译文不免会有错误和不妥，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